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1953-1968） =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yang University and
Singapore government (1953-1968)

周兆呈 Zhou, Zhao Cheng

2006

Zhou, Z. C. (2006). 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1953-1968） =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yang University and Singapore government (1953-1968). Doctoral thesi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ttps://hdl.handle.net/10356/36159>

<https://doi.org/10.32657/10356/36159>

第五节 魏雅聆报告书开始控制权之争

连陈六使也认为“比白里斯葛报告书公允”¹⁵⁹的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出台之后，基本符合行动党政府的期望。尤其“检讨委员会的判定——在政府的支持下实行改组”，更是符合政府的基本目标。教育部长杨玉麟在立法议院就南大问题发表的政策演说中表示，“新加坡政府现在发现它要负担起南洋大学的整个财政责任，同时还要付出补助马来亚大学的份额。新加坡政府将尽它的能力在符合本邦的人民和教育利益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¹⁶⁰

在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之外，行动党政府对南大的学术水准提出另外的批评。杨玉麟的演说批评南大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来维持它的学术水准”，没有实行校外考试制度，而这一制度却是“南大行政委员会在 1956 年 7 月 3 日所通过的南洋大学学则里所规定的”。杨玉麟也委婉地批评政府对南大无法了解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据我们所知，南大并没有委任校外考官，并且根据报章的报道，而报章是我们有关这一方面的唯一消息来源，南大设立了一个三人的考试委员会来主持这次的考试”。¹⁶¹ 关于校外考官的这一点，正是在张天泽致杨玉麟的检举信中所提及的，成为政府批评南大的证据。

对南大学术水准的另外一个批评是关于 1959 年度的南大毕业生。杨玉麟指责“直到现在，南大对于参加毕业考试的 471 名学生、而从中毕业出来的 437 名学生的名表¹⁶²，从来没有作正式的公布”。因此连“雇用南大毕业生最多”的教育部，也没有收到过一份毕业生的正式名表。毕业生的正式名单并不是学术水准问题的核心，而是政府认为南大学生的毕业率太高，“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 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还有一点不平常的现象就是，及格的学生并没有等级之分”，杨玉麟批评“南大当局如此处

¹⁵⁹ “陈六使致魏雅聆信函”，《南洋商报》，1962 年 2 月 3 日。

¹⁶⁰ 《新加坡教育部长对南大问题发表政策演说》，1960 年 2 月 10 日。

¹⁶¹ 同上。

¹⁶² 南大对外公布的毕业人数为 439 名，南洋商报，1960 年 1 月 12 日。

理毕业考试，对于那些历年来节衣缩食，供给他们的儿女到南大受高级教育的家长们来说，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打击”。¹⁶³

对于检讨委员会提出南大“商人办校”在行政上存在的问题，行动党政府深以为是。行动党政府也借指责成立白里斯葛委员会的前任政府来批评南大当局，一举两得：“如果前政府对于问题的看法是现实的话，那么在南大创办后不久，他们就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如果前政府是比较肯负责任的话，南大就不致有今天的不幸”。

与白里斯葛报告书一样，杨玉麟也再次抨击任南大秘书长的潘国渠，“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虽然认为南大还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对于新成立的行动党政府来说，要解决的不仅是南大内部的问题，还包括南大所牵涉的华文教育和华社对新政府的看法问题，因此必须在南大问题上采取与前政府有所不同的策略。杨玉麟在部长声明中表示，“新加坡政府已经决定聘请南大毕业生，并且承认南大学位与一间被承认的大学的及格学位相等”，但杨玉麟也提出警告，埋下伏笔，“如果下一次的毕业考试还是这样马马虎虎的话，那么新加坡政府为着照顾公众的利益，就要重新考虑这种情形”。

行动党政府另外一个友善的表示就是在财政上支持南大与马大待遇平等。政府准备按照它支持马来亚大学的同样基础来支持南洋大学，但是条件是“政府应该得到相同的保障，以维持适当的学术水准以及对于公款有适当的管理和记账”。杨玉麟特意提及教育部曾催促南大呈交 1958 年度经查核的账目，但“南大当局需要 13 个月的时间方能提呈经查核的账目，是一项使新加坡人民关注的事情”。

¹⁶³ 《新加坡教育部长对南大问题发表政策演说》，1960 年 2 月 10 日。

对于敏感的教学媒介语问题，杨玉麟的声明十分技巧而含蓄，为避免南大有过度的反应，杨玉麟将马大与南大放在一起谈论，“新加坡马大分校的建立是符合英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既然我们希望它打开大门，容纳非英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同样对于南大，一所建立来符合华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的大学，我们也希望它向同样的方式发展，吸收非华文中学校源流的学生入学。这两间大学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¹⁶⁴

这段声明内含玄机，对于南大来说，是为未来的改革埋下伏笔。南大是华文源流的大学，吸收非华文中学校源流的学生入学，按照逻辑是非华文中学校源流的学生在南大以华文源流进行学习。但是目前的华语教学媒介语，只是“保留目前的状况”，以后会如何演变，并没有一个定论。

杨玉麟在立法议院公布的政策声明，是行动党政府首次就南大问题发表正式的立场，具有特别的意义。行动党政府在南大问题上表现出的善意和预留的空间，既可以争取民众的支持，也为未来的政策奠定基础。因此被认为是“历来各方面对南大问题的声明中最明确、最看待、最果断，而且还应该说是最慷慨的一次”。¹⁶⁵

但其后，南大与行动党政府间开始发生第一次的交锋，焦点即在于南大“华文大学的本质”和教学媒介语的问题。这也正是杨玉麟声明中隐而未发的部分。事缘南大学生会针对杨玉麟政策声明之后的南大改革进展发表了《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首先针对政府批评南大的核心问题是商人治校，指出“这是不客观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南大创办的历史，以及她在成长中所遭遇的挫折和患难，而一味去把南大缺点归罪于热心办学的南大执委身上”。

学生会的声明要求“南大改革必须基于不破坏南大创办宗旨的原则”，并且提出了“庄严态度：南大应该不断地革新机构，加强效率，提高学术水准，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却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学生会的声明也再次强调了南大民族大

¹⁶⁴ 同上。

¹⁶⁵ 李明仕〈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哪里？〉，刊《大学论坛》第14期。1960年3月10日。

学性质，“南大的教学媒介与整个民族教育系统血肉相关，除非我们要压制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在南大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¹⁶⁶

学生会的这段声明将南大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与民族教育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允许南大使用民族语言，则是压制民族教育。学生会维护南大华文大学的地位和华语媒介语的用心十分明显。但是在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政治形势发生改变之后，新加坡要“马来亚化”与南大作为民族大学还是国家大学的矛盾必然会成为困扰南大与政府的最大问题，也是双方冲突与矛盾的来源。

学生会还“对所谓政府资助南大，就应该控制南大的看法，表示异议”。学生会认为“政府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对于一间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符合民族教育政策的大学，它根本没有理由应用巨量的金钱，加以控制。相反，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它应该不会把双手伸进旧政府的肮脏的手套里，像旧政府那样对待南大，经常破坏大学自治，干涉学术自由”。学生会还巧妙地说，“我们相信一个事事以民意作为依归的政府，大概不至于采取那么错误的行动吧”？

对于杨玉麟政策声明中提到，“对于南大，一所建立来符合华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的大学，我们也希望它向同样的方式发展，吸收非华文中来源流的学生入学”，学生会声明认为，南大要成为马来亚化的大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南大是不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子弟，问题是南大的存在是不是对马来亚建国事业有真正的利益”。学生会的看法是只要南大学生具有马来亚化的精神、愿意为马来亚奉献，即使是华族大学，也不存在问题。因此“只在外表上装作马来亚化，在大门口高挂‘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招牌，而实质上却倒行逆施，成为殖民地型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我们的建国事业里不但是多余的，而且简直是一种障碍”。

学生会的声明还指出，“我们反对只在形式上包括各民族子弟，以骗取‘马来亚化’美名的做法，但我们完全支持吸收各民族学生进入南大的建议。可是这样做，必须基于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绝不能损害或违反南大创办宗

¹⁶⁶ <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南洋大学学生会，1960年3月10日。《大学论坛》第14期。

旨，不能因此而改变了南大的民族大学的特质”。那么不改变华语媒介语，其他民族学生如何进入南大呢？学生会认为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不难解决，比如可以为他们办预备班，提高他们的华文程度，使衔接南大的语言水准。

针对政府声明中将限制联合邦学生名额的说法，学生会也表示反对，“南大是星马人民共建共有的大学，任何改革都不应该影响南大的泛马性大学的品质。根据南大的创办宗旨，任何形式的限制联合邦学生入学都是不合理的”。

167

学生会“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虽然对行动党政府的南大政策表示一定的支持，但是也提出诸多批评。而在南大“民族大学”、华语为教学媒介语、政府控制南大与否等敏感而根本性的问题上措辞严厉而坚定，为行动党政府进一步影响南大、改变南大以符合政府目标和建国目标制造了不少障碍。因此，南大学生会的这份声明，很快成为南大与行动党政府间的第一次交锋。

与批评白里斯葛或是魏雅聆报告书不同的是，学生会的这一声明已经与学术水准、教师水平等学术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焦点反而集中在大学的定位、在国家中的地位、与政府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这体现出在自治的形势下，南大学生会与政府对国家建构目标的期许产生差异，成为冲突的来源，使得南大与行动党政府的矛盾由学术、学位承认问题转为政治定位和华语定位的敏感问题。

不久后，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邀请，到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发表“语言和政治”的演讲，对南大学生会声明作出反应，批驳学生会的观点。李光耀将学生会坚持华语为南大教学媒介语的问题上升至语言政治的高度。饶有意味的是，在谈到南大的语言问题时，李光耀先对新加坡的华人、华语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警告”：马来亚的华裔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些语言文化的原始的情绪吸引，必须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加以缓和。那些忘记了我们是处身在主要是说马来语的东南亚，而不是中国的人，在他们被强迫送上一艘遣送船回返汕头时，只能够怪他们自己。华语本身在中国正受着革命力量的影响。那些通过无线电、报纸和杂志，听到和感觉到它的变迁的人，必须永远记住，也是带

¹⁶⁷ 同上。

有革命性质的不同力量正在马来亚和东南亚发生作用。卑屈地模仿中国的形式，正是自寻灾难”。¹⁶⁸

在谈完华语、中国与马来亚华人的关系之后，李光耀批评“以南洋大学学生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是“不明智之举”。李光耀认为“这一类的话，是会刺激和鼓励像泛马回教党最近向拉查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提呈的备忘录里所提出的一类意见”。李光耀要求“南大必须是个马来亚大学，在眼前的将来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但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因为这只会加强马来人中间的种族主义事业的刺激”。李光耀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也认为，“在某一定的环境内，如果只采用一种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使到其他的民族不能同窗共读，那么，我认为，不管内容如何，从外表看来是有种族色彩。而且，你也不能怪其他民族不相信这是一所国家大学”。

李光耀虽然认同南大为华人受高等教育的努力，容纳人口当中受华文教育的部分。但是“最终的宗旨，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容纳所有马来亚人，不论是华人或非华人”，而“单单采用华语为媒介语，即使是怎样地向学生灌输马来亚意识，也还是会被非华人看成是一所种族大学”。

对于学生会声明中使用的强烈语气，李光耀颇不以为然，指出在 1959 年大选之前“为应付当时的威胁而在不同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适用的”。李光耀承诺自己的政府“处理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方式，与旧殖民主义政府基本上压根地不相同。在新加坡，华校教育、语言或文化根本没有被妨碍或压制的危险。没有人存心使南大与马大合并，或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而摧毁南大”。李光耀警告南大学生注意对马来种族的影响，“假如用来对付殖民地时代威胁的有关维护华族文化、语言与文明的旧口号，在今日的新加坡喊出，那么，种族主义的马来势力从而威胁到将来的华语学习，可能不受控制”。¹⁶⁹

¹⁶⁸ 李光耀在南大的演讲<语言与政治>，*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0年3月31日。

¹⁶⁹ 同上。

从政治策略上讲，李光耀采取的是转移焦点的方法。南大学生会的声明主要是针对检讨委员会报告中重视英文、要求南大增加英文教学部分，担心英文成为主要教学媒介会让南大华文大学的特性变质。但李光耀对学生会声明的批评则认为南大应该在马来语成为国语的时候，使用国语为主要语言，这就避免了将南大变成“殖民地大学”的批评。在“马来亚化”的旗帜下，新加坡政府认为南大教学媒介语的改变其实是势在必行，只是改为英语或是马来语的区别。

因此，李光耀认为，“只要南大一日只受到华人群众的支持，它在马来语的前途便一日不会光明。任何指南大为华人大學的论调都不致会吸引马来人或马来亚的华人的支持”。换言之，如果南大坚持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的特质，在马来亚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出现困难和问题，李光耀暗示，“让我们认真地考虑及马来亚人民的前途，它的国语以及华语其地位的问题。让我们创造新的口号，使人民有效地响应今日我们所处的新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修改我们的技巧和方法，以适应已改变的局势，那么，南大的前途应该是光明的”。¹⁷⁰

后来李光耀在马来亚大学发表演说《马来亚大学过去的贡献以及在今日民族形成中的任务》，则赞扬“马大的毕业生是最接近马来亚人的标准”，马大学生“可以声言是最可能最终成为马来亚人的人民”。而南洋大学的毕业生“没有超越马来亚民族的藩篱”，“华文教育中主流的南大生将怎样呢？是不是他们依旧被分离，从华校出来，他们进入一所华文大学，于是乎，又在这社会里别树一帜？这危险真多”。¹⁷¹

对南大学生会声明，行动党政府作出了十分强烈的反应。除李光耀亲自出面进行批评之外，在李演讲前两天，人民行动党的机关报《行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沙文主义与自杀”的文章，强烈指责声明中“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却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这句话，是意味着“南大学生会要求南大应当永远是一间华文大

¹⁷⁰同上。

¹⁷¹《星洲日报》，1960年7月3日。

学”，也是“沙文主义者要求各族分离”，“沙文主义者要求自杀”，要求“南大应该永远处在单一的国家教育系统之外”。¹⁷²

南大学生会与行动党政府的首次交锋，拖延了解决南大问题的步伐，让社会各界感到困惑。因为在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发表之后，“大家本来都希望南大问题可以因此早一点获得解决，可是事实的发展情形恰好与此相反”，在教育部长杨玉麟的政策声明后，“不知为什么，南大问题却似乎反而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僵局，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¹⁷³

南大问题为何就这样被耽搁下来？当时有舆论从公开可见的材料认为主要是政府和南大存在三个误会：一是南大必须并入马大的谣传。二是关于南大教学用语的问题。最后一个是联合邦学生的入学问题。¹⁷⁴ 1960年6月1日，李光耀在记者会上重申“在马来亚大学新马分家之后，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¹⁷⁵ 第一个误会已经消除，但第二个误会却正是政府与学生会声明争论的焦点，涉及到对国家观念和南洋大学方向的看法分歧，其实并未消除，并使南大由学术水准问题转为政治认同问题。第三个误会涉及到新加坡政府对联合邦学生的看法，在新马将合并的目标之下，其实也并不是大问题。因此，此时最直接困扰南大与政府关系的正是“第二个误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角力和斗争，就直接体现在其后政府的南大联络委员会与南大当局会谈时针对南大控制权的矛盾上。

虽然此时南大与政府之间的焦点似乎都集中在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来回争议上，但南大内部的“颠覆”活动一直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密切关注的，并影响到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政策。南大学生对政治保持热切的关注，带有时代的特征，国家意识萌芽以及国际政治运动蓬勃的外部背景，都使大学校园的学生们热切关心政治，南大则似乎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兴趣和热情。在1959年11月2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的南大政治学会就宣称遵循鲜明的宗旨：“激发同学对政治的志趣，提高同学们对政治的认识”。政治学会认为，

¹⁷² 《星洲日报》，1960年3月27日。

¹⁷³ <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星洲日报》社论，1960年6月2日。

¹⁷⁴ 同上。

¹⁷⁵ 《星洲日报》，1960年6月2日。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效忠本邦的南大同学，关心本邦政治就是我们基本的应有的态度”，“对政治也应是敏感”的南大同学应该对于“本邦的经济、失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艺术问题等”加以研究与讨论。政治学会提出，“关心本邦政治就是南大同学效忠本邦的具体表现”。¹⁷⁶

南大学生热心政治，政府对此喜忧参半，甚至于更多的担忧。建国之初，政府需要群众的政治热情参与国家建构的进程，但是政治热情也可能转化为政治压力和政治对立，尤其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不断渗透”的区域背景之下。因此，新加坡政府和联邦政府都对南大内的政治活动保持密切的关注和监视。

1959年12月16日上午，新加坡警察当局派出一队警探，进入南大校园，逮捕理学院物理系的两名学生。一名为三年级的凌绪和，另一名为四年级即将毕业的胡水，这两名学生都来自吉隆坡。根据当晚新加坡政府发出的文告，被捕的两名南大学生，是应联合邦政府的请求而进行拘捕，并已经解交联合邦警察。联合邦政府是在数天前就提出此请求，但新加坡政府延缓行动，直至这两名学生完成考试才执行。¹⁷⁷

此项行动，其实应该是新加坡政府与联合邦政府双方密切磋商的结果。1959年10月8日，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在英国专员公署召开第三次会议，出席者包括英国专员顾德、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联合邦内政部长苏来曼、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内政部长王邦文、新加坡军区司令李察逊少将、英国副专员布迪伦等，会后只对外发表了一项简短公报，其中除参加会议者名单及下次会期外，并未提及有关会议的其他事项。¹⁷⁸ 但根据英国殖民部的档案资料，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联邦提议开会“讨论南大内的教育和颠覆方面的问题”，联邦政府除认为联邦国防部长也应出席会议外，还要求新加坡政府事先准备一份文件，对南大学生活动进行安全评估，注明联邦学生在南大就学期间在哪些方面暴露出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及新加坡政府准备采取何种措施来减少南大内的共产主义影响。联邦政府也保证联邦政治部将毫无

¹⁷⁶ 《南洋商报》，1959年11月3日。

¹⁷⁷ 《南洋商报》，*The Straits Times*，1959年12月17日。

¹⁷⁸ 《星洲日报》，1959年10月9日。

保留地与新加坡政治部合作，让新加坡能够获得联邦政府政治部所掌握的情报。¹⁷⁹

此次会议确定了在 11 月 6 日举行下一次内部安全理事会会议，再讨论“南大内的教育和颠覆问题”。其后联合邦政府在 11 月 24 日发出对胡水和凌绪和的拘捕令，¹⁸⁰ 到了 12 月 16 日，“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直接解决这一问题”¹⁸¹的行动在南大校园展开，首次在紧急法令下进行抓捕学生。第二天早上就移交给联合邦当局，押至吉隆坡百拉福律联合邦政治部总部，录取口供。¹⁸²

这一首次在南大校园进行的抓捕行动引起南大学生和舆论的骚动，而凌绪和被捕时被带上手铐，也引起议论纷纷。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严词批评警方的行动，对逮捕行动“表示不满”。学生会的声明认为“在和平而非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任何警方人员若要进入大学内部执行任务，必须征得校方负责人的同意”，警方的行动“则有公然蔑视校方尊严之嫌”。声明指出大学“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一个政治行动的场所”，要求政府对此次行动提出解释。学生会也要求联合邦政府对两学生及时提出法庭审讯，如系无罪则早日释放。学生会更要求当局保证“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¹⁸³

新加坡政府很快作出回应，由文化部发表文告，称凌绪和被带手铐是因为他“曾激烈的反抗”，“将两名探员踢倒沟中，并没有像报章上所报道般，跌入沟中”。

文告并称，当时，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奕欢正陪同槟城闻侨刘玉水参观南大，经过该处，即将事实情形向群集一堆的学生们加以解释。学生们表示满意。在胡水也被逮捕后不久，在黄奕欢的请求之下，南大秘书长潘国渠、教务长陈宗南和南大学生会主席黄金汉与警方人员开了一次会议，黄奕欢和刘玉水

¹⁷⁹ 联邦政府副秘书长（安全与情报）拿督 Nik Daud 致英国最高专员办公室的信函，1959 年 10 月 9 日，CO1030/567。

¹⁸⁰ 新加坡文化部文告，《南洋商报》，1959 年 12 月 19 日。

¹⁸¹ 英国最高专员办公室 E.M. West 致新加坡政府大厦 Wong Chooi Sen 的信函。1959 年 10 月 13 日，CO1030/567。

¹⁸² 《南洋商报》，1959 年 12 月 18 日。

¹⁸³ 南大学生会声明，《南洋商报》，1959 年 12 月 18 日。

在场参加。黄金汉对拘捕事宜向警方提出抗议，但警方人员向他解释说明警方乃援引公共安全法令拘捕时，他才表示满意。

对于学生会批评警方没有通知南大当局，就进校园抓人，新加坡政府的解释是“执行类似任务时，是必须保守相当程度的秘密的，预先通知时，将使到警方蒙受危险而无法达致他们的目的”。¹⁸⁴

南大校园内的“颠覆活动”，对行动党政府来说，正是一种“华语本身在中国正受着革命力量的影响”、“带有革命性质的不同力量正在马来亚和东南亚发生作用”¹⁸⁵的一种证明。南大对华文大学的坚持与行动党政府试图渐进改变教学用语的努力始终无法交集，阻碍了南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其后双方通过政府南大委员会与南大代表的谈判，就成了一场拉锯战。

改组南洋大学，对行动党政府来说，不管是要取得控制权也好，让南大成为纯学术机构也好，首先就需要削弱或是去除南大赞助人对大学的绝对控制。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正切合政府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点，谈判时政府所拥有的筹码就是津贴南大的数额，南大则需要上大学控制权上有所让步。

在政府南大联络委员会与南大代表正式谈判之前，教育部长杨玉麟在南大首届毕业典礼上主动谈及将给予南大“数以百万计”的津贴，同时对“‘政府将以经济援助，为取得南大控制权的代价’的这种歪曲事实的传说，加以驳斥”。他说，“去年五月所批准的南洋大学法令中，政府代表在整个 28 人的理事会中，只有三人。如今，在新加坡，马大理事会的 20 名理事中，政府代表占四席。而魏雅聆报告书，也建议政府在重新组成的南大 21 人理事会中占四席。政府在理事会中的席位，是非常少，是不可能控制整个理事会，或整间大学的”。杨玉麟没有指出的是，如果南大理事会按照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组成，虽然政府不可能控制整个理事会，但是南大赞助人同样无法控制理事会，这首先就是政府的初步胜利。而且杨玉麟其后又意有所指地强调，即使政府没有控

¹⁸⁴新加坡文化部文告，《南洋商报》，1959 年 12 月 19 日。

¹⁸⁵李光耀在南大的演讲《语言与政治》。

制权，“我们也要同时加以指出，在有关连到重要的政策的时候，这少数人的意见是不能被轻易忽略的”。¹⁸⁶

南大联络委员会与南大代表的第一次会谈在“南大绝不并入马大”的明确宣示一个月后，于1960年7月8日在新加坡总理公署举行。南大理事会六名代表与政府四名代表从上午十时半到下午二时，进行了“三句半钟连续不停的秘密会谈”，据文化次长李炯才会后告诉记者“会谈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¹⁸⁷南大的六名代表为李延年、刘伯群、刘玉水、陈期岳、黄奕欢及符致逢。政府的四名代表为总理公署政务次长陈新嵘，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¹⁸⁸，教育部政务次长梁景胜，文化部政务次长李炯才。

比较特别的是，此次会谈解决南大问题，双方的谈商基础并不是以白里斯葛报告书或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为依据或基础，而是按照人民行动党中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语言与政治》的手册。其中收录了三篇重要文章，包括李光耀总理的《政治与语言》，教育部长杨玉麟的《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政策声明》和副总理杜进才博士的《中国的果树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上成长》。根据陈六使向南洋大学星马十二州代表会议报告，称“政府现要南大研究该手册，政府且表示，今后政府与南大当局会谈有关南大问题将以该手册内容为根据。过去的白里斯葛五人报告书及魏雅聆七人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政府将不再提出”。¹⁸⁹

行动党政府与南大商谈南大问题，按照自身出版的手册、不再根据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标志着独立南大政策的形成，政府不关注学术性的技术细节，而要彻底解决政府与南大关系的原则问题。这使南大与政府形成了谈判的对立角色。

虽然魏雅聆委员会由行动党政府委任，但其内容是依据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检讨，完全依据魏雅聆报告书，仍然摆脱不了过去旧政府时代的痕

¹⁸⁶ 《南洋商报》，1960年4月3日。

¹⁸⁷ 《南洋商报》，1960年7月8日。

¹⁸⁸ 易润堂受华文教育出身，原任《新报》记者，曾帮助李光耀起草华文文件，担任其政治秘书。作为受华文教育社群的代表，代表行动党参加大选，出任文化部长、劳工部长，领导政府与南洋大学的多次谈商。

¹⁸⁹ 《南洋商报》，1960年7月7日。

迹。而根据行动党三名要员的谈话，体现行动党政府要求南大按照政府的建国发展方向进行调整。由于三人的谈话仅仅是政策性的宣示和表述，并不能成为具体事务的指导措施。因此，在其后的商谈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魏雅聆报告书的蓝本和设计，对行动党政府而言，可说是进退自如。

第二次会谈则在 10 月 18 日举行。在第二次会谈中，双方针对南大理事会组成问题各执一词，不欢而散。有关南大临时理事会的组成，南大当局要求理事会的组成应包括南大赞助人代表 12 人、政府代表 6 人。政府方面反对南大的提议，认为这样南大的控制权还是照旧操在现在的南大执行委员会的手上，而不是由拥有更高学术资格的人改组和管理南大。政府认为如果南大赞助人代表的名额从魏雅聆报告书所建议的四名增加到 12 名，那么新加坡政府在理事会里的代表名额也应由四名增加到 12 名，这样才能“符合魏雅聆报告书所建议的精神，使南大的改组和未来行政的最后决定权得以落在包括教授会、毕业同学会、社会贤达及教育界领袖在内的 12 名代表的肩上”。¹⁹⁰

为表示对解决南大问题采取更现实的态度，新加坡政府作出让步，表示“愿意更改资助南大的方式”，即不再计较南大招收联合邦学生的人数（“第三个误会”消除），只对南大财政常年预算中的经费负担五十五巴仙，其余四十五巴仙，则由南大赞助人负责。政府也准备接受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提供助学金给贫寒而品学优良的学生，及发出奖学金给成绩优良的毕业生深造。

在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致陈六使的信中作出以上让步表示时，政府代表也提出“为了南大毕业生的利益，南大问题有需要及时解决，因此我们建议南大代表应该在这个月内和我们继续进一步谈商未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希望早日得到台端的覆信”。¹⁹¹

但两天后的陈六使回信却让政府代表颇为不满。陈六使在极为简短的信函中只有两句话：“收到本月十一日来函，谢谢。来函全文，已交由中华总商会

¹⁹⁰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致陈六使的信，1960 年 11 月 11 日。

¹⁹¹ 同上。

内南大秘书处照印若干份，分寄给南大各区委员会以及南大的六名联络代表”¹⁹²。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看出陈六使的复函中，完全没有表示举行另一次谈商的意思，“鉴于南大学生刊物不断反映出他们希望南大问题应该及早解决的情绪，以及为了使关心南大改革前途的广大社会人士得以了解南大联络委员会的工作进展，以及政府及南大面对改革南大所持的态度和意见”，¹⁹³ 决定公开发表双方的来往信件。

其后双方一直僵持不下，陈六使在 1961 年 10 月 23 日，发表对谈判的意见，认为“南大与政府之间，只是相成，断不是相反。如有任何问题存在，只要双方代表真正推诚相见，当不难迎刃而解”。陈六使并发表类似最后通牒的意见，“希望这一次的谈判是最坦白、最彻底、最圆满的一次，因此，也就是最后一次”。¹⁹⁴

即便如此，南大与政府间的谈判始终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61 年 11 月 27 日，陈六使设宴款待南大第三届毕业考试校外考试委员、魏雅聆与南大教授以及各中学校长等人，公开表示对政府的失望之情，称“本邦政府去年曾宣布一年要津贴南大数百万元，即每名文商学院学生的津贴金三千元，理学院学生六千元，若付诸实施，南大一年可领取政府津贴五六百万元，去年和今年两年可获一千多万元，但迟至今日，南大仍未领到半分津贴”，陈六使继而表示，“我们不敢对政府的资助抱很大的希望，而应依照原有南大建设计划进行发展”，显示陈六使决定将与政府谈判的南大改组计划搁浅。陈六使转而批评“自从政府宣布要津贴南大后，反而影响南大所收的捐款沉寂下来”。¹⁹⁵ 这一场景与当年批评林有福政府不履行津贴承诺而致使南大捐款下降基本相同，南大在政府津贴的问题上无法摆脱两难境地，既迫切需要政府的津贴，又不愿在校政管理和学术上让政府控制。

¹⁹² 陈六使给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的复函，1960 年 11 月 13 日。

¹⁹³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主席梁景胜致陈六使的信函，1960 年 11 月 18 日。

¹⁹⁴ 《南洋商报》，1961 年 10 月 24 日。

¹⁹⁵ 《南洋商报》，1961 年 11 月 28 日。

陈六使对政府控制华校乃至南大保有很强的戒心。他说，“过去华文中小学都是靠董教及各界人士苦心经营起来，两年前（1959 年），这些办教育的热心人士却被人家讽刺为土头土脑的商人”，陈六使也不同意所谓“专家办学”的观点，“目前华校被政府管辖后，派专家监督，办学情形不见得比以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对南大的未来管理，陈六使希望“有一天管理华校中小学及南大责任能落在南大自己的校友身上，而不是受那些另有企图的人所控制”。¹⁹⁶

陈六使指责行动党政府至今未给予津贴，称“去年曾宣布一年要津贴南大数百万元”，应是指教育部长杨玉麟 1960 年 4 月在南大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词，杨玉麟当时称“南大不再为新加坡政府所忽视了，相反地，它将得到像马来亚大学一样的照顾，财政的援助，将不再是零零星星的，而是数一百万计的津贴”。¹⁹⁷

南大与行动党关于控制权之争，除了校政和学术问题之外，教学语言也是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行动党政府执政之初，虽然碍于政治实力和政治基础不够强大、南大一旦成为公开的政治问题必将十分棘手等原因，对南大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并未强硬干涉南大问题，但是南大的教学用语和南大强调华文、并以华文成为民族主义的口号和精神力量来源，为共产中国通过华人和华语影响新加坡以及加深区域对新加坡华人赤化或亲中的担忧提供基础，对行动党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国家建国目标造成一定的威胁，从而使得语言问题成为南大与政府间的政治问题。

在南大强调华文、保持民族特色的校园内部，学习英文是否面对压力？英文是“殖民地语言”的意识形态看法，在南大内部显然有着一定的市场。对于坚持以英文为政府行政语言的行动党政府来说，无疑需要面对未来语言分化的压力。南大教学用语的问题曾让政府解决南大问题被耽搁下来，李光耀和行动党甚至对南大学生会的声明作出强烈的反击，指责为“沙文主义”。政府与学

¹⁹⁶ 《南洋商报》，1961 年 11 月 28 日。

¹⁹⁷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0 年 4 月 3 日。

生会声明争论的焦点，涉及到对国家观念和南洋大学方向的看法分歧，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消除。

事实上，南大当局也曾意识到强化华文特色对大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林语堂当年的离职让一些华侨领袖感到困窘，而在开学以后，南大的部分支持者试图弱化南大的华文特性，这当然就引起了怨恨，尤其是在那些好战的学生中间”。¹⁹⁸ 教学语言也决定了南大的办学方向，“南大是一所华文大学还是国际的或是马来亚的高等学府这一问题，在新加坡随后多年的反共政治运动发展中，激起了不断增长的激烈情绪，而成立马来亚联邦作为防止北京膨胀主义的壁垒的想法也获得了基础”。¹⁹⁹ 而英语在南大教学结构的位置，在 1963 年之前“仍没有正确的决定”。²⁰⁰

¹⁹⁸ Justus M. Van Der Kroe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ilemmas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02.

¹⁹⁹ *Ibid*, 102, 103.

²⁰⁰ *Ibid*, 103.

第六节 小结

在行动党自 1959 年执政到 1963 年新马合并期间，新加坡基本还是处于“不确定的国家建设时期，对国家本身的争夺与控制成为该阶段的主旋律”，²⁰¹ 南大也是被政治争夺与控制的对象和工具，面临的政治环境经历了一些改变。

首先是心理落差，在林有福政府时期尤其是后期 1958 年，由于政治需要和选举的要求，南大成为各个政党和利益团体争取的对象，林有福政府先后通过《南洋大学法》和津贴南大，并给予陈六使公民权等方式，向南大示好，希望争取华人社会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工人党等反对党也纷纷表示对南大的支持，一时间南大迎来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白里斯葛评议会的任命也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之中，没有成为南大当局担忧的问题。白里斯葛评议会作出对南大不利的报告书之后，林有福出于政治需要和选举压力，不愿公开发表。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之后，反而不存在政治包袱，可以以报告书为工具和契机，促进南大的改组。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背后，还折射出当时在英国殖民地势力日益弱化的情况下，围绕南洋大学而产生的英美教育制度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白里斯葛报告书发挥了作为维护英国教育制度的护法使者的作用，突显了英美制度之争以及制度背后牵涉的华文教育、与中国关系以及新加坡马来亚关系等复杂因素。

对南大当局而言，当时并未将学制差异视为南大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却不幸地成英美制度之争的牺牲品，陷入学位不受承认的困境，彻底改变发展道路。虽然南大一直关心的是学位承认和政府资助两大问题，但在人民行动党政府 1963 年大选获胜后吊销陈六使公民权、南大与政府关系趋向对立后，1965 年的改制就浮上水面，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显然在历史场景发生改变后，学制之争反而被南大视为生死之争。

²⁰¹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6。

南大与新加坡政府在这一阶段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行动党政治理念的背景之下考察。与马绍尔政府、林有福政府阶段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的行动党政府，表现出强烈的自治和国家意识，对于南大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一环的要求和希望也就越高。在行动党执政不久，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效忠周”活动，工会、报馆、学校、政府部门、文化团体、警察等制服单位以及商行、交通业者等各行各业，都以舞蹈、歌唱、集会、游行等方式展现对新加坡的效忠。“效忠周本身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场合，就是庆祝由一位马来亚出生人士为元首的新加坡邦之成立”。这项活动“激发了一种本邦前此未见的很自然流露出来的热忱及自豪的感觉，我们第一次经验到一种属于一个国家，跟我们的前途和幸福及新加坡的前途和幸福打成一片的感觉”。²⁰²

行动党执政之后到 1963 年大选之前，政府一直试图使用温和的手段与南大谈判、协商，对南大进行一些改造，使政府可以真正发挥影响力，符合政府的愿望并消除潜在的不安。但是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愈演愈烈，直到 1963 年，行动党政府看到陈六使支持南大毕业生“参与反对政府的阵营，进行竞选”。而就南大内部来说，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以及政府与南大委员会进行的数次谈判、建立南大理事会等措施，并没有使南大向政府希望的方向取得进展。到 1963 年底，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里的“观察仍然保持了很多的有效性”。²⁰³

因此，整体来看，南大内部存在的让政府为之不安的因素包括：

- 1, 对华文作为教学用语的坚持。
- 2, 政府对南大事务仍没有绝对的控制和影响，也无法作出最后的决定。
- 3, 南大学生会的实力越来越强，甚至影响到政府与南大当局的谈判，成为政府解决南大问题需要面对的另外一股力量，政府无法直接与之谈判，却也无法忽略这一力量。
- 4, 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势力对南大事务“渗透与干预”，使得南大问题的解决更为棘手。

²⁰²新加坡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广播讲话，《南洋商报》，1959 年 12 月 17 日。

²⁰³ Justus M. Van Der Kroe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ilemmas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5, 由于南大长期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原因, 其毕业生开始成为反政府、反行动党力量的重要来源, 这一趋势更令行动党政府担忧。

另外从区域的层次看, 此时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是追求新马合并, 为争取新马华人的支持, 需要南大保持一定的华文大学的特色, 无法彻底改变为英语大学或马来文大学, 但是又需要南大加强马来亚的地方色彩, 避免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在联合邦政治和种族斗争中处于舆论上不利的地位, 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强对南大的管理和控制。

正是在这样看似矛盾的政治理念下, 南大与行动党政府进入了磨合阶段。

第五章 南洋大学与人民行动党政府关系

（1963—1965）

第一节 南大毕业生形成政治力量

1960 年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进入社会之后，南洋大学对新马的影响力开始与以前大不相同。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吸引中学生就读的高等教育场所，更由于开始每年数百名毕业生带着南洋大学毕业生的标签在社会的不同领域组成一个群体，而成为与社会更紧密联系的社会机构。1960 年应运而生、开始筹备设立的毕业生同学会，主动干预校内事务，与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校内组织学生会一起，成为南洋大学影响社会的两股主要力量，更有舆论认为学生领导层与南大理事会是南大的权力核心之一，¹ 由于后来南大毕业同学会派代表加入南大理事会，更在理事会里成为南大学生会的代表声音。²

比如，在第四届南大毕业同学会理事会理事选举完毕后，对上一年的工作报告包括五个方面，依次为“同学的福利、对母校的责任、关怀当地教育、尽公民的责任和助学贷金的设立”，³ 显示同学会关注校园、关注社会，以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南大生影响力为己任。

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对南大毕业生寄予厚望。虽然他希望“学生在校内不应有太多活动”，但是他主张“南大毕业校友，在社会上应积极展开活动，对政治更应努力争取”，南大校友也应该“负起推动南大及华文教育发展”的责任，陈六使甚至希望“有一天管理华校中小学及南大的责任能落在南大自己的校友身上，而不是受那些另有企图的人所控制”。

本论文在第一章就专门论述南大的成立是迁民社会意欲突破殖民歧视、提升社群话语实力的努力表现。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本社群的“精英”，为进入未来自主的政治权力中心奠定基础，是陈六使为代表的迁民社会的一种现实选择。

¹ Justus M. Van Der Kroe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ilemmas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 1964, 108.

² Ibid p110.

³ 南大毕业同学会工作报告，《星洲日报》，1963 年。

通过华文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进入新马政治体制，显然将有利于迁民社会提升整体地位，在未来的国家政治版图中更有效地保护自身社群的利益。这也是陈六使希望南大校友“对政治更应努力争取”、“负起推动南大及华文教育发展责任”的初衷。

1960年代初期，新加坡面临新马合并、1963年大选等重大事件，政党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为南洋大学毕业生以及学生参与新加坡政治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新马合并课题，成为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导火线，也是南大与行动党政府关系的转折点。行动党政府开始切实感受到南大学生以及南大这面旗帜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在新马合并课题以及随之而来的1963年大选中，南大学生和毕业生产生的能量，体现出南大作为华社鲜明的象征符号，其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与执政党的差异，将为行动党政府制造不少麻烦，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生质的改变，南大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学术水准问题，也不是马来亚学生过多的比例失衡问题，而是行动党政府能否容忍作为高等学府、培养社会精英的南洋大学，成为制造政治对立、培养反对力量的场所甚至中心。

针对新马合并议题，南大学生会先后发表了六篇声明，立场与行动党政府完全相左，对于行动党政府采取的将空白票算为支持政府的合并方式，南大学生会批评为“不民主”，要求放弃不合理和不民主的条文，“否则将会导致人民更大的不满，尤其难脱独裁者的罪名”。⁴

南大其他学生团体也参与新马合并课题的讨论中，并制造不利于执政党政策的舆论。南大政治学会与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1962年7月和1962年8月分别联合展开两次“民意测验”，数百名南大学生参与。一次在总理李光耀的选区丹戎巴葛区，让选民选择赞成或反对合并白皮书，结果为89.51%反对，第二次则是在财政部长吴庆瑞的选区牛车水，依照合并白皮书的选择让选民投票，结果有97.13%投空白票。⁵虽然民意测验打着政治参与的口号，并有政治科学研究的意义，但出现与行动党政府政策如此大相径庭的结果，难免不被认为是政治力量操纵的宣传和玩弄政治的手段。南大

⁴ <南大学生会全民投票声明一>，1962年7月5日，《第6届执委会报告》，页46。

⁵ 南洋大学政治学会《政治学报》，1962年8月，第13期。

《政治学报》同时批评行动党政府，“我们看不到政府当局对主办团体有过什么善意的协助。相反的，我们却看到有关当局动员大批特务人员，乔装成形形色色的人物，沿街逐户向各该区居民施以恐吓；警方人员荷枪实弹在街头巡逻，制造紧张空气。据牛车水区的居民反映：总理、财长、内长，还亲自去选区，‘拜访选民’；副劳长更是三更半夜率领一批人马到该区张贴反标语”。⁶

根据马来西亚内政部 1964 年发表的《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社会知识》在第一期就“攻击马来西亚计划中的公民权条文”，1962 年 5 月出版的第二期，把 1959 年 6 月 3 日欢呼为反殖斗争胜利的日子，并“进而攻击马来西亚计划，说它不履行诺言”。⁷ 而被指为“奴颜婢膝地遵循共党统一战线的路线”的南大政治学会的《政治学报》，在“第九期到第十三期刊载反全民投票的宣传文章”。⁸

在公民投票成绩于 1962 年 9 月揭晓后，南大学生会拒绝接受，并指责行动党“随时随地可以通过其所控制的电台、报纸等工具进行宣传，但是，反对党的宣传只能偶然地在报章的角落出现。这是制造舆论的做法，重复 100 次的谎言，总会有人相信吧！”⁹

《社会知识》在其第三期也是该季刊的最后一期，“随着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因反国家活动而被禁止入境，大事发挥华文教育的问题，把严博士称为一个为华文教育牺牲者。另一篇文章却拒绝接受全民投票的结果，畅论共产主义的间歇性的威胁，认为要是他们不能和平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将被迫采取暴力行动，而这将归咎于那些阻挠他们争取‘真正统一独立自由’的人们”。¹⁰

1963 年 9 月 21 日的新加坡大选，是新马合并后的新加坡首次大选，也是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摊牌的决斗选战。南洋大学从理事会到毕业生到南大学生，不论政治立场如何，都直接而全面深入地参与新加坡政治活动、参与决定国家的进程和方向。对理事会主席陈六使来说，更是南大毕业生有可

⁶ <两次民意测验的政治意义>，《政治学报》，1962 年 8 月，第 13 期。

⁷ 《南洋大学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吉隆坡：政府出版局，1964），页 12。

⁸ 同上。

⁹ <南大学生会全民投票声明三>，1962 年 9 月 3 日，《第 6 届执委会报告》，页 48。

¹⁰ 《南洋大学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页 12。

能在政治上进入权力中心、改变南大与政府僵局、改善南大地位的很好机会。

1963年9月3日，新加坡元首尤索夫根据1958年新加坡宪法规定宣布立法议院解散，规定9月12日为立法议院51区席位候选人提名日，新加坡“政坛动态，突呈活跃。各政党均纷纷积极展开工作，准备在行将来临的大选中进行角逐”。¹¹ 选举前的形势显示，执政的行动党，社会主义阵线和受到马来亚联邦支持的新加坡联盟实力比较强。李光耀也认为，“此次大选，只有三个政党可以执政，第一是行动党，第二是社阵，第三是新加坡联盟”。李光耀指责社阵与“印尼共产党勾结，出卖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如果社阵万一执政，中央政府一定干涉”。¹²

李光耀并且指出，“这次选举，不是选候选人，而是要选政党了。因为，法律已经改变，即凡是离开党的议员，同时要离开议院。我认为，这样对新加坡比较有利。我们过去有过经验，王永元与社阵的议员，如果没有行动党，他们都不会做议员”。¹³ 由于行动党面对的竞争对手——社阵、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等都是自行动党分裂，因此，行动党在这次选举中强调的就是“选政党而不是选候选人”，以把分裂造成的不利影响从选举中尽可能降低。

不过，陈六使却采取与行动党相反的策略，呼吁选民选候选人，而不是政党。只要是南大毕业生，不管是什么政党，陈六使都希望选民支持，南大陷入选战的漩涡在所难免。

社会主义阵线在9月11日公布了十八点竞选宣言，其中第六条为“承认南洋大学学位”。¹⁴ 社阵批评“行动党的现行教育政策，有如以往的殖民地政府教育政策，并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我们应纠正这个错误。我们承认马来语为国语，并尽力促进马来中学教育，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放弃目前行动党敌视母语教育的态度”，对于南洋大学，社阵“强调技术教育以适应社会的需求，适当的资助南洋大学，并承认其学位”。¹⁵

¹¹ 《南洋商报》，1963年9月5日。

¹² 《南洋商报》，1963年9月7日。

¹³ 同上。

¹⁴ <社阵竞选宣言>，刊《南洋商报》，1963年9月12日。

¹⁵ 同上。

跟其他政党比起来，社阵的态度最有利于解决南大问题。新加坡联盟所公布的竞选宣言中，只是提到“尽力维护华文教育，增加对华文高等教育之协助，包括南洋大学”。¹⁶ 行动党的竞选宣言则笼统强调过去四年的成就，并未特别强调或突出教育、就业等课题，更未提到南洋大学。¹⁷ 另外一个政党工人党则在修正政纲后宣布，在教育方面，“真正实行各民族教育平等，需要加速增建初级学校，扩展工艺学院，扶助刚成立不久的义安学院，平等对待及资助新大及南大，并承认其学位”。¹⁸

社阵公开将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问题列入竞选宣言，将南洋大学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成为选举的课题之一。

必须看到，社阵的其中两名候选人陈新嵘和梁景胜，曾是行动党党员，在行动党内阁任职，并担任过与南大谈判的政府代表。期待社阵执政就能一劳永逸解决南大问题，是不现实的，南大课题只是各政党用来争取最大利益的工具。在 1959 年大选时，林有福政府为避免南洋大学成为选举中难缠的课题，而不公开白里斯葛报告书。四年之后，南洋大学还是成为选举课题，也为陈六使寻求解决与政府间的僵局和着眼南洋大学发展制造了新的机会和期望，促使陈六使选择介入选举、表态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

参加该届大选的候选人有 15 名南大毕业生，他们分别属于社阵、行动党、人民统一党，其中 10 人是社阵的候选人，占的比重最大，行动党 2 人，人民统一党 2 人（另外还有一个在南大兼读，尚未毕业），无党派候选人 1 个（黄贵友）。另一位与南大有关联的则是大巴窑民主联合党候选人陈祖荣，他是“南大学生会与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的法律顾问”。¹⁹

行动党的两位南大生候选人是王书泉和何振春。王书泉出生于新加坡，当年 25 岁，“初就读于本坡莱佛士学院，后转攻南洋大学政治经济系获得学士学位，1962 年毕业后于中学执教”。王书泉在“1958 年就参加人民行动党，曾任 1959 年大选武吉知马区选举委员会秘书。现任人民行动党武吉知马

¹⁶ <新加坡联盟竞选宣言>，刊《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¹⁷ <人民行动党竞选宣言>，刊《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¹⁸ <工人党修正政纲>，刊《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6 日。

¹⁹ “独立候选人略历”，《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分部秘书。能读写中文、巫文、英文；通晓潮洲、福建方言。为了参加本届竞选而辞卸建屋发展局移植官职位”。²⁰

何振春也是出生在新加坡，当年 27 岁，“南洋大学政经系首届毕业生。为南大政治学会的创始之一，并被选为该学会之委员。1960 年任职于建屋发展局，后来辞职专心从事行动党工作。为行动报（中文版）编辑委员，及行动党第二区秘书，并为行动党例打合洛支部助理秘书，通晓华英巫文”。²¹

社阵的 10 名候选人则包括张庆禄、黄慧心、梁关飞、王发祥、蓝炽理、林焕文、林健生、谢太宝、傅孙力和谢醒民。

其中，张庆禄（阿裕尼区）当年 32 岁，“已婚，竞选前任职于新加坡福利部，1959 年获南大文学士，1961 年获取助学金进入新加坡大学攻读社会科学研究。他曾就读于爱同学校、中正中学及维多利亚英校。毕业后任职于崇福女校多年，曾任职前小学教师联谊会大坡区区委，华校英文教师公会助理秘书，赤道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及南大学生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张庆禄自南大毕业后，“就职于本坡育英中学及本邦教育部，嗣被调至人民协会任外勤部主任，本年三月间返回福利部缓刑组及儿童、青年组工作，已于 8 月 27 日被令停职”。²²

黄慧心（实龙岗花园区）当年 22 岁，“1962 年毕业于南大理学院生物学系，现任南洋大学女生舍监，曾就读本邦育英中学，求学期间即积极参加校内的活动，为当时学生界的活跃领袖之一。1959 年继续进入南洋大学深造，辛勤攻读，学有专长，获得全校师生的普遍赞许。黄君在校期间，曾任南大生物学会秘书一职，1962 年毕业前夕，黄君曾联合同学编写学术著作《新加坡野生种子植物》，毕业后担任南洋大学毕业同学会理事，黄君工作踏实，极富责任感，诚为不可多得的人材”。²³

傅孙力（淡滨尼区）当年 26 岁，未婚，福建人，“于 1958 年毕业于本邦中正中学高中三年级，为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于 1954 年五一三事件被捕，傅氏于高中毕业后即转入南洋大学深造，1962 年修完大学课程，傅氏在大学深造时曾任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理事，南大史地学会秘书长职。并历任

²⁰ “行动党候选人略历”，《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²¹ 同上。

²² “社阵候选人略历”，《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²³ 同上。

平议校友会理事及担任新加坡乡村人民联合会文教工作，为农运的积极分子。傅氏精通华文及能操英语、闽语等方言，是一名杰出的演讲者”。²⁴

谢醒民（樟宜区）当年 28 岁，已婚，有一子。他是“南洋大学中文系学士，曾在师训学院大学毕业生教育文凭班毕业。谢君热心群众运动，无论在中学或大学，都是一名积极分子。他曾担任三山校友会会长（1955-57），副会长（1958-60），南大教育学会主席（1958-59）。全星华文校友会联合总会主席团之一。他也积极参加南大学生会和毕业同学会的活动。去年，他在平议中学担任高级教师，至今年五月初，竟被教育部无理开除职位”。²⁵

谢太宝（裕廊区）当年 22 岁，南大第三届理学士。谢太宝“年青有为，在学时学业成绩优异，中学时为华中高材生，每试皆名列前茅，十六岁即毕业高中，在南大时期积极为学生福利工作，曾连任学生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会副主席和出席全马学术研讨会议。毕业后，亦担任南大毕业同学会理事。南大毕业后一度执教于中正中学，旋被行动党政府无理停职，后以其在大学成绩优良乃受聘为南大物理系助教”。²⁶

蓝炽理（直落亚逸）当年 32 岁，已婚，“现任南洋大学膳食委员会主席兼执行秘书。他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文学士（经济政治系），是南洋大学政治学会的发起人，曾任南大政治学会首届主席，政治学报创办人，1961 年曾担任人民协会外勤督导，派往以色列参加国际青年领袖训练，同年行动党政府采取专横无理的独裁手段，无理开除人协职员，他被选为人民协会全体职员维护工作权利行动委员会主席，为争取职工的工人权利保障，坚决地领导罢工，他为正义为保卫工人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精神，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爱戴，他曾经在直落亚逸区福建会馆属下崇福女学校担任教职员六年，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具有高度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之精神”。²⁷

梁关飞（勿拉士峇沙区）当年 30 岁，已婚。“南大第一届文学士，离校之后在文化部新闻组工作，嗣后被调至财政部经济发展组。此次为争取一个更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乃毅然辞去工作，参加竞选”。梁关飞“出生联邦，1949 年来星中正就读高中。在班上成绩优异，三年每试皆名列前茅。高

²⁴ “社阵候选人略历”，《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²⁵ 同上。

²⁶ 同上。

²⁷ 同上。

中毕业后，曾任教师三年，后领得全马琼联会奖学金入南大深造。他在学生时期为一活跃分子，56 年曾出席亚非第一届学生会议。1958 年出任南大学生会主席，1959 年全马高等学府在新加坡大学举行会议，他因会议拒绝接受华语为会议语言时，率领南大代表团退出代表会议，轰动一时，然他一贯主张各民族及不同语言学生团结合作，后乃改以观察者身份出席，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亦曾代表新加坡学生出席在南美秘鲁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学生会议，会后并访问欧洲许多国家，环绕世界一周。在南大毕业后，他连任南大毕业同学会第一及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对促进民族教育平等不遗余力，颇受南大董事器重，为人温和可亲”。²⁸

王发祥（丹戎巴葛）当年 29 岁，已婚。“南大第一届毕业生，成绩优良，获经济学士学位，曾在同学拥戴下，出任南大学生会第二任秘书长，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主编，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大毕业同学会第一任秘书长。王大学毕业后，受公务员委员会聘请任职本邦财政部内陆税务局近一年。后转新闻界，任南洋商报外勤记者，为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协会机关报《新闻春秋》主要撰稿人之一。此次为不负师长同学及星马各界之厚望，毅然挺身而出，决以多年所学，诚恳为人群服务”。²⁹

王发祥所竞选的丹戎巴葛区，其对手是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

林健生（芳林选区）当年 30 岁，已婚。“南洋大学理学院生物系第一届毕业生，在大学期间是极能干的活动家，卓越的学生领袖，为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二届福利部部长，第一届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总务。毕业后任南大毕业同学会第一、第二届秘书，由于工作积极，领导力强，继续连任毕业同学会第三、四届秘书长。他深切关怀民族教育的生存，日夜为民族教育生存发展奔波努力，被社会人士所器重，现被选为中正中学董事会副秘书长，南洋大学最高决策机关——以陈六使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大学理事会常务理事。他曾任小学教师，新加坡育英中学训育主任，现为育英中学中学教师。他是苦学成功的人，小时候做过小贩，种过菜，卖过报，当过烟厂学徒，杂货店员，深知

²⁸ 同上。

²⁹ 同上。

人民的苦痛，决心为大众奋斗，为社会作更大的贡献。精通华文，识英文、马来语”。³⁰

林焕文（红山区）当年 33 岁，已婚，“子女成群，毕业于南洋大学化学系，为英国工程技术学院联合会员。在学期间曾出席万隆亚非学生会议，为马来亚代表团团长³¹，并担任第一届南大学生会主席及第一、二届南大毕业同学会理事，擅于语文，精通马、华、英、日等国文字，著述颇丰，其中以《简明马华辞典》（Kamus Bahasa Melaya Tionghoa）及国语课程（Kursns Bahasa Kebangsaan）最富盛名，学誉马来语人士，无不闻名，以此专材，现任于南大现代语文系，教授马来语及南洋商报国语周刊主编，得到广大读者及同学们的爱戴。工余课余时间积极准备英国伦敦大学马来语的荣誉学位。做事认真，为人谦虚和蔼，以此学历及为人态度，诚为人民心目中的公仆也”。³²

王永元领导的人民统一党则有三名南大生候选人，分别为庄迪福、沈职业、吴尔金。庄迪福（武吉班让区）当年 28 岁，“人民统一党武吉班让支部秘书。1962 年南大文学士。能说华语、客语、闽语、国语、英语、粤语、海南话”。³³

沈职业（蔡厝港区）当年 27 岁，“统一报发行部主任，统一党蔡厝港支部秘书，兼本党中教组副主席，目前在南大兼读会计，能说闽语、华语、国语及英语，沈同志前为行动党乌鲁班丹秘书，芳林提案时退出行动党参加统一党”。³⁴

吴尔金（大巴窑区）当年 26 岁，“南大文学士，前任南大政治学会委员，建华校友会委员”。³⁵

南大毕业生首次参加立法议会竞选，人数虽然不多，但已经在新加坡“极受社会人士注意”。³⁶ 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之所以出现，既是因为南大生作为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在新加坡建设国家的道路上，必然

³⁰ 同上。

³¹ 据中学联前主席孙罗文回忆，当时孙以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作者与孙罗文的访谈，2005 年 3 月 12 日。

³² “社阵候选人略历”，《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³³ “统一党候选人略历”，《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3 日。

³⁴ 同上。

³⁵ 同上。

³⁶ 陈六使谈话，《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4 日。

将形成规模，占据一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南大所承载的华文教育壁垒的形象，在新加坡华人占多数、受华文教育者为数众多的社会结构中，促使它成为其中的代表。

陈六使对十多位南大生参加竞选“感到非常高兴”，他直接“呼吁民众全力支持参加此届立会大选的南大毕业生，希望他们能够参加政权”。他在提名日的第二天就对外发表谈话，称曾在1963年三月间的欢送南大毕业生的宴会上说过，“南大在籍学生在校内必须勤奋读书，出校后必须参加竞选，为社会人群服务”。对于为数10多位的候选人，陈六使不无遗憾地说，“这一次，参加立会大选的南大学生有十多名，如果不是时间上过于迫促的话，必定会有更多的南大学生出来，参加竞选的”。³⁷

陈六使认为南大毕业生候选人表现出政治立场的多元性，“这一次参加本邦大选的南大毕业生，各党各派都有，也有独立身份的”；“一些人常说南大是左倾是什么倾，这次的提名可以证明南大是个尊严的学府，并没什么倾”，³⁸ 南大毕业生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广泛性，对于南大扩大对社会和新加坡政治的影响力，起着重要的作用。1963年大选是南大毕业生首次参加选举，已经展现出一定的参与度和号召力，以及对于政党的吸引力。陈六使对南大生的未来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当时的“南大离校毕业生已有一千多人，在籍学生有两千多人，到下届大选时，离校南大生将有逾四千人，届时，必定会有很多人出来参加竞选”，因此他希望“南大毕业生的候选人在中选以后，担负人民的寄托，应该好好地做事，给人民看看南大毕业生的办事能力，这样才会使南大毕业生更受到尊重，为未来南大毕业生铺平道路”。

为避免外界的疑虑，陈六使也宣称“南大毕业生得到政权，并不是要他们‘多隆’（帮助）我陈六使，也不是要他们多隆华校，也不是要他们多隆南大，而他们能给予南大以津贴外国大学的全部预算的二十五巴仙款项，那我就高兴了”。³⁹

³⁷ 陈六使谈话，《南洋商报》，1963年9月14日。

³⁸ 《星洲日报》，1963年9月14日。

³⁹ 陈六使谈话，见《星洲日报》，1963年9月14日。

陈六使称“南大作育的英才已有立志服务社会的表现，作为南大的支持者，大家是要拥护和支持南大生的候选人”。⁴⁰ 他呼吁民众支持南大毕业生，与行动党和李光耀在大选伊始强调选民“选政党而不是选候选人”的呼吁相反，社阵候选人中南大毕业生人数最多，陈六使的立场显然对社阵有利。在陈六使做出呼吁的同一天，李光耀就将社阵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与共产党之间划上等号，以在政治上击垮对手。

李光耀 1963 年 9 月 13 日在浮尔顿广场的群众大会上演讲时说，“这一次的竞选的斗争是在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之间，共产党已经组织了社阵与人民党的联合阵线在竞选上进行斗争”，李光耀说，“在马来人的地区里，共产党是通过人民党提出马来候选人，共产党也牺牲他们认为没有用处的公开阵线的人员，如李绍祖医生，并提出南洋大学毕业生和华文中学学生煽动者，在他们较为安全的席位上竞选”。李光耀称他在研究过社阵的提名和最新的治安报告书后，发现“新的一批共产党员目前正在取代社阵，他们是来自大学和华文中学，比以前那一批更有纪律和聪明。他们在南大赌法上耍得很高明，他们派出无用的家伙来被杀，如梁景胜在裕切区，裕切区的选民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对共产党主义是没有用处的。他们也派出方韵琴到蒙巴登区去牺牲，甚至社阵主席李绍祖医生也是可预备牺牲的人，使到他可以光荣地死去，因为他斗争的是一个大人物，如杜进才博士这样的人；但是共产党将来自南大与华文中学的家伙安置于郊外地区”，由于“在全民投票时，这些郊外地区的空白票多到四十与四十五巴仙”，也就是反对行动党政策的人，因此在这些地区竞选，社阵可能获胜，“这些人中有一些将会选到立法议院”。⁴¹

陈六使和李光耀在同一天发表的言论如此南辕北辙，立场对立，南洋大学无可避免地卷入大选的政治斗争之中。出于竞选策略的政治考虑，行动党开始将矛头和火力转向陈六使，双方展开了一场论战。

在陈六使发表谈话的第二天，行动党甘榜格南候选人、时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在美芝群众大会上抨击陈六使的“种族主义集团主义”。他说：

⁴⁰ 陈六使谈话，见《星洲日报》，1963 年 9 月 14 日。

⁴¹ 《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4 日。

有些思想愚昧不清的人正在这个大选中到处哄骗人民，把一些重要问题歪曲宣传，以图混乱人民，还有些是种族主义者和集团主义者，他们公开地或秘密地散布谣言，说这个大选是一个不同种族之间或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说法不但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是极富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引起各种族间或集团的互相仇视，使彼此当作敌人看待，很容易导致种族间冲突。⁴²

拉惹勒南直接警告陈六使：

同样的，有些所谓领袖们曾经促使人民去投票支持南洋大学的毕业生，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南大毕业生，所以就应该受人支持，这也是危险和不智的。因为假如新加坡大学或剑桥大学也同样叫人们只去支持他们的毕业生，或者某一种族的领袖唆使人们只去支持他们同种族的人，这岂不是形成集团性和种族性的斗争吗？又假如有人说，律师是好的，所以大家都应该投票支持律师，不论他们的立场如何，也应该投他们的票，这岂不是无稽之谈？

拉惹勒南指出，“大家必须认清楚，这场竞选并不是南大毕业生和其他政党或种族间的斗争，它是一场不分种族或集团界线的政治思想斗争。这也是人民行动党一向的看法”，拉惹勒南称行动党在五十一区的候选人中，“是没有种族色彩的，这也是和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行动党的候选人包括“南大毕业生，也有其他大学出身的毕业生，有律师，有医生、教师、商人和职工领袖、政党工作者、书记及工友，他们代表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我们也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锡兰人及混种人，这些人都能讲几种语言和应用几种文字”。⁴³

针对陈六使要人们投票支持南大毕业生，而大选中有十几个候选人是南大毕业生，他们分别以人民行动党、社阵和人民统一党的身份参加竞选，拉惹勒南认为，“假如单凭他们是南大毕业生，就应投他们一票，结果就是投选几个政见不同的人，这岂不是毫无原则的盲目投票？”拉惹勒南继续推演，“纵使是由这些政见不同的人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吧，他们也是不可能合力而有效为人民服务的，因为他们之间政见的不同，随时随地都可以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局势，使到国家不能安定”。⁴⁴

⁴² 拉惹勒南演讲全文，见《南洋商报》，1963年9月15日。

⁴³ 同上。

⁴⁴ 同上。

拉惹勒南警告支持南大毕业生的宣传会招致种族冲突的后果，“更可惜的是，这样的主张投选南大毕业生，不但不能提高他们的身价与地位，相反地，人民的脑海中可能产生出一种不良的印象，认为这次大选是南大毕业生为着要争夺政权才出来竞选，和其他的人民争权”。拉惹勒南担心其他种族对南大毕业生全面参与竞选产生怀疑，“仅替南大毕业生作竞选的捧场，这未免要惹起种族歧视和带有暴烈性不良的后果。简直是在各种族间散布不良的种子，为一些种族主义者火上加油”。⁴⁵

拉惹勒南借此宣传行动党的种族理念，“我们的候选人，虽然在种族上、语言上、社会地位上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上，团结在党的周遭，为着完成党的纲领而奋斗。人民行动党四年来之所以能够为人民做了很多的事情，维持社会安宁和种族间和平共处，正是因为我们主张不分种族的国家观念和政策”。⁴⁶

拉惹勒南因此呼吁：

希望大家不要以个人或种族为投选的对象，也不要以这间大学出身的毕业生或那间大选出身的毕业生为对象。请你们投选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选党不选人，先看看哪个党才有良好政策和政纲，并且认清楚哪一个政党是诚实可靠的，是可为人民服务的，然后才去投下你们神圣的一票。大家千万不要听从那些种族主义者的花言巧语，否则只会带来祸患。因为，假使本邦的种族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乱子，他们是逃之夭夭的，种族间相互屠杀起来了，有钱的人还可以关上大门，雇佣武装保镖保卫，什么也不害怕，吃亏的还是——一般穷苦的人民。⁴⁷

拉惹勒南同时为行动党拉票，称“我们的主张是组成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欢迎所有人士，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也不管他们是哪间大学出身，社会地位怎样，只要他们乐于接受我们的政治信仰那就好了。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一个人种复杂的马来西亚国度里争取永久的和平和繁荣”。⁴⁸

⁴⁵同上。

⁴⁶同上。

⁴⁷同上。

⁴⁸同上。

拉惹勒南对陈六使的批评尚属温和，因为并未直接点名。但几天后，陈六使开始反驳，并“三度呼吁人民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并且“认为此举不是种族主义”。⁴⁹

虽然陈六使只是号召人民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哪一个政党，但陈六使的谈话对行动党政府语文政策进行抨击，对社会主义阵线非常有利。由于陈六使在华社和民间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此举令行动党十分不满，加上行动党将社阵一直批判为共产党的代理人，陈六使此举也为行动党将他与共产党之间联系起来制造了理由。

陈六使支持南大毕业生参选的第一个原因是维护华族语文教育。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政府一路来声言平等对待四源流语文教育，这当然十分正确，但假如要兄弟民族间有一源流语文教育，眼看逐渐衰弱下去，逐渐有站不住的危机，那么这一民族为了自身的前途，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起来自图挽救，好与其他健康的兄弟民族看齐，从而各尽所能，共同效劳国家，试问，这是不是应该？这是不是种族主义？”，陈六使为了挽救“逐渐衰弱下去”的华文教育，希望南大毕业生候选人有人获选，就是因为“南大的毕业生，是首先有机会在本国接受最完全的华族语文教育，他们对当前本国华族语文教育危机也了解得最深切，他们有责任起来挽救华族语文教育，好让华族语文教育这一股力量，继续贡献国家”。陈六使也猛烈抨击南大没有得到政府的合理对待，他说，“南大是本国最高学府之一，获得本国各种族人民上中下各阶层最普遍的支持，南大的毕业生分别到世界各国深造的，都有良好的成绩，这证明南大的水准是令人满意的，但南大受到本国政府的公平待遇没有？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南大的学位受到本国政府的承认没有？这又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看看今天的情势，作为本国公民一分子的南大毕业生，不出来替南大争，不出来替南大说句公道话，南大的处境将会一天难似一天了”。陈六使并表示，“为南大争，便是为国家争”。⁵⁰

陈六使的上述表态，为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带上一个政治标签，即南大毕业生候选人是捍卫华文教育和华族文化的象征。这在某种意义上使虽然属于不同政党的南大毕业生，成为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具备明确的政治追求。

⁴⁹ 陈六使谈话，《南洋商报》，1963年9月19日。

⁵⁰ 同上。

虽然陈六使呼吁“人民如果欢迎南大毕业生一显身手，为国家效劳，尽可随所拥护的政党，投其南大候选人一票，我为初献身身手的南大毕业生呼吁，不为一政党呼吁”，但由于他的谈话带有明显的批评行动党政府的内容，甚至称“哪一个政党的话不说得好听，但往往是上台前的诺言是一套，上台后的事实又是一套”，⁵¹ 因此从选举的效果考量，显然对反对阵营有利。

巧合的是，陈六使三度发出呼吁支持南大生的同一天，李光耀也再度针对南大问题和陈六使的呼吁发表演说，而且是一天两次谈话。在9月18日行动党在浮尔顿广场的竞选群众大会上，他警告说，“倘使社会主义阵线这次大选中意外地当选执政，那么本邦教育、劳工与财政等自主权一定被撤消”。对南大问题，李光耀说“我要坦白地告诉陈六使，他讲我不要帮助南大和支持南大，其实我们是要给南大与新大同样的条件，我们要看津贴的钱是怎样用，我们要核查这笔津贴款项，但是共产党不要我们给钱南大，他不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要利用华文教育来作宣传材料。在合并之后，共产主义份子与南大问题将由中央政府来解决”。

李光耀认为大选中新加坡联盟不值一提，“大多数华人都知道联盟是贪污与无能的”，所要注意的是社阵，“他们说我们要消灭华文教育，不承认南大，不要帮助南大，我请我的政务次长陈新嵘去谈商解决南大问题，我们是要南大与新大同样条件，我们要检查给南大的钱是怎样被使用的，1961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对待华文教育的态度是公平的，华文、英文、巫文与印文教育都受到平等待遇，没有人会说我消灭华文教育，我所有的孩子都是读华校，李绍祖的孩子则读英校，这是事实，没有欺骗人民，李绍祖说要保护新加坡特别利益，承认南大，他们却主张完全合并，假使是完全合并，那么要怎样去承认南大呢？南大甚至可能被封掉”。⁵²

在当晚行动党在义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李光耀再度说，“关于南大问题，陈六使已经发表两次谈话，这是不聪明的。他给共产党利用，我们要给南大跟新大一样的平等条件，每个月给南大的数目几万元，我们要检查这些钱是怎样使用，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怎么能够给他们这些钱去乱乱做事呢？

⁵¹ 《南洋商报》，1963年9月19日。

⁵² 李光耀在行动党浮尔顿广场竞选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南洋商报》，1963年9月19日。

陈新嵘是代表我去谈商南大问题，这是事实。共产党是不要南大有所发展，因为有发展对他们不利，在大选时陈六使必须小心，我们保护教育问题，在这方面有自主权，但共产党问题，则由中央政府控制，我说话一句算一句，如果经常改变，人民就不会相信”。⁵³

既然南大问题已经浮现，在其后的竞选宣传中，行动党就一直集中力量，通过群众大会、政党广播等多种方式，努力辩护和化解南大问题的冲击。仅 1963 年 9 月 19 日一天，行动党就在三个场合，分别由李光耀、教育次长李炯才、李光耀政治秘书易润堂发表针对南洋大学问题的谈话，显示行动党对南大课题影响选情的重视。

按照选举规定，投票日前两日的晚上，每个政党可以有广播演讲的机会。社阵、人民统一党、新加坡联盟都是派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进行广播讲话，行动党则派出曾经担任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的易润堂进行广播讲话，主要解释南大问题，这种处理方式显示行动党担忧陈六使公开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和对政府南大政策的批评，会影响选举结果，造成对社阵有利的局面。

易润堂在电台讲话中说，“最近新加坡的一位百万富翁陈六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连串的谈话，叫人投票支持南大学生。他本身是南大理事会的主席，叫人投票支持南大，当然是有他个人的理由。但这是不是符合全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呢？我认为，他做生意很聪明，赚了大钱，那是他的事情，政府只要抽他一点税来替新加坡人民进行建设的工作”。易润堂批评陈六使“在选举的时候，把南大卷入政治的漩涡，那是很愚蠢的，在 9 月 22 日的早上，他就会知道他做了对不住南大的事情”。⁵⁴

易润堂警告陈六使不要将南洋大学当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南洋大学是谁的呢？南洋大学是属于全马来西亚的人民的。它不是陈六使的财产。它是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建设起来的。陈六使只不过是理事会的主席而已。他在把南大卷入政治漩涡之前，有没有征求过各个理事的同意呢？有没有征求过为南大出钱出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同意呢？”⁵⁵

⁵³李光耀在行动党义顺竞选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9 日。

⁵⁴易润堂电台广播全文，《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0 日。

⁵⁵同上。

易润堂接着批评“陈六使要做南大的太上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南大问题到现在不能解决，他跟学生会里的一些亲共份子要负全部的责任。我们人民行动党在 1959 年执政之后，就立刻设法要解决南大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要得到平等的待遇。换句话说，政府是要按照新加坡大学的同样的比例来津贴南洋大学。不过政府有一个要求，就是津贴给南大的钱，记账方法和查账手续也要跟新加坡大学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津贴出去的钱都是公款，每一分都要有交代，我们要保证提高学术水准，同时必要保证公款不会被滥用”，易润堂指责“陈六使在极端份子控制下的学生会的支持下，拒绝接受政府这种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接受了政府的津贴，设立了一个健全的理事会，和实行了严格的查账制度，南大就会成为一个有高度水准的学术机关，不会给陈六使使用作沽名钓誉的场所，也不会给极端份子利用作为训练干部的机关”。⁵⁶

易润堂的这段话，其实点出了政府与南大谈判一直僵持不下的问题症结所在。即政府要求在津贴南大的同时，拥有对南大事务的管理权限，而陈六使则拒绝政府权力的进入，不愿津贴成为政府干预的手段。

易润堂又回顾了与南大谈判的过程，“人民行动党一开始执政的时候，李光耀总理为着要合理和迅速解决南大问题，就立刻委任了陈新嵘、梁景胜、李炯才和我易润堂成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专门负责谈判解决南大问题，我们跟陈六使他们举行了多次会议，社阵的候选人梁关飞他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他担任我们会议记录员，我们向陈六使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目的无非是要使南大走上稳健的道路，提高学术水准，可是陈六使他们一条都不接受。所有会谈的经过，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由梁关飞执笔，虽然他跟陈新嵘和梁景胜现在跑到社阵那边去，可是记录还在我们的手上，他们是不能够随便歪曲的”。

易润堂警告陈六使“这次把南洋大学卷入政治的漩涡，是对南大非常不利的，因为南大是一个学术机关，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星马人民捐钱出来建设南大，是要南大训练建国人材，不是要南大训练政治干部。陈六使如果对政治有兴趣，他尽可以直接加入政治，他甚至可以做一个候选人。但是他不应该把南大当作他的私有品，把南大拿出来作孤注一掷。他要赌博他可以去

⁵⁶同上。

赌树胶、赌麻将，赌注一百万、一千万都可以，但是他不能把南大拿出来作政治的赌本。如果他赌得对，南大当然声誉会很高，可是万一他赌错了对象，南大作为一个学术机关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⁵⁷

易润堂的这段谈话，实际上在指陈六使将南大的前途赌在社阵可以获胜上，才会公开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这段话也暗示一旦行动党获胜，陈六使和南大将面对行动党的对付。

易润堂说，“我自己经济不够，没有进过南大念书。可是我是受华文教育的人，我知道，要维护南大不是这样维护的。陈六使这种做法只有断送南大和断送新加坡，即使南大生中选，所能解决的问题，顶多也不过是一个南大问题。但是新加坡人民有许多更重要更艰巨的工作要去解决。一个政党组织政府不是要单单照顾一间学校的利益而已，一个好的政府是要照顾全新加坡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一个政府的任务是要领导人民建设整个国家，而不是单单建设一间大学而已。当然，南大也是会受到照顾的，政府过去对于凡是新加坡公民的南大学生，只要他们不是在校内搞政治，只要他们在校内用功读书，政府都有给他们奖学金”。⁵⁸

行动党对南大问题对社阵有利的担忧是明显的。在易润堂的广播讲话中，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谈南大问题，最后部分则呼吁选民投票给人民行动党，因为根据行动党“自己所有的情报资料”，如果“让社阵意外地执政，那么，目前的宪制就会被取消”，“中央政府当然不会坐视社阵执政，来实行印尼的反马来西亚和反华的政策”。⁵⁹

李光耀也在同天的群众大会上再次强调，“如果社阵在本月 21 日意外中选执政，23 日中央政府将会立刻采取行动，军队开进来，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将告消失，新加坡所辛辛苦苦争取得来的教育、劳工、财政、卫生、社会福利等自主权，也将一旦付诸流水”。李光耀指社阵“现在设法利用陈六使。陈六使不大了解，以为是玩耍的。但这并不是玩耍。星期六大选结果很重要，它将影响到整个马来西亚。陈六使每晚在丹戎禺喝酒，南大学生便替他写声明。所以他发表的声明，词句美丽，都是社阵候选人写出来，然后给

⁵⁷同上。

⁵⁸同上。

⁵⁹同上。

他签名。但是如果社阵中选，南大将会关门，中央政府会立刻采取行动，那时候，劳工、教育与财政自主权都将丧失”。⁶⁰

行动党将陈六使支持南大生与支持社阵等同看待，从而在竞选策略上宣传社阵执政的后果是导致中央政府的干预。但当时东姑阿都拉曼首相领导的中央政府却支持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联盟，他甚至专程以大马联盟主席的身份到新加坡，出席新加坡联盟欢迎大马成立茶会，并表示“希望联盟会在这场选举中胜利”。他同时指出，“新加坡是大马的一部分，希望来届的新加坡政府能与大马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只要是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服务，无论是右派，左派或中立派执政，都可以与中央合作”。⁶¹

当时任教育次长的李炯才也在 19 日当天的裕廊群众大会上发表针对南洋大学问题的演讲，基本语调与易润堂的广播演讲一致，认为只有行动党继续执政，才能搞好南大问题，但在语调中保留了对陈六使的一些尊重。他说“陈六使先生于过去一周来，接二连三地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兼理事会主席的名义及身份发表政治言论，并公开批评政府的教育政策。本来，我认为陈六使先生的论点不值一驳，可是因为事关南大的整个前途，所以不得不开口。陈先生这次所发表的言论，尤其是以南大执委会主席的身份发言，已把整个南大拉入政治漩涡里。南大是马来西亚各民族以及各阶层人士共同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最高学府，它不是陈六使先生私人的财产，照道理，他若要将南大拉入政治漩涡，应该先征求全体理事会的意见，不应一意孤行地把南大的前途拿来作自己的政治资本”。⁶²

李炯才接着批驳陈六使的言论，“明眼人都知道，陈先生的论调是富有偏见的，他虽然呼吁选民要投南大毕业生候选人一票，但稍为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他们指要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是属于何党何派”。李炯才认为假如陈六使真有诚意要呼吁选民投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应该在提名以前发表谈话，而不是在提名以后。李炯才透露社阵候选人与陈六使关系密切，“其实大家都知道梁关飞等候选人几乎每夜都在丹戎禺俱乐部跟陈六使先生商量事情，

⁶⁰李光耀在行动党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0 日。

⁶¹东姑阿都拉曼谈话，《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0 日。

⁶²李炯才群众大会演说全文，《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0 日。

我们不反对南大毕业生参加竞选，可是我们不应该把一个堂堂的学府拉入政治漩涡里”。

行动党对陈六使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给南大在籍学生造成的政治冲击、激发他们的参政热情也耿耿于怀。李炯才称，“陈六使先生曾经再三敦促南大在籍学生不应该参加政治，但日夜一批一批南大生下坡为社阵拉票，他都不曾劝他们不要这样做”。

对于政府与南大进行的谈判，李炯才也表明立场，批评南大方面，“谈到解决南大的问题，想来也痛心，我已经屡次说过，谈判要成功，双方一定要有诚意，我是被委为政府南大谈判委员会之其中一政府代表，所以很清楚谁不愿意解决南大问题，我曾经被委托向南大当局接洽如何打破南大谈判的僵局，作为谈判委员会记录员的梁关飞也很明了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南大当局提出的要求是南大理事里，政府代表应只有六名，南大代表十二名，教授及毕业同学会代表及中立人士十二名，这一建议经政府慎重考虑后认为可以考虑接受，我奉令发表声明表示政府愿意考虑接受南大的上述建议，并私下与南大有关人士接洽，可是，结果南大当局却又再改变态度，不肯接受自己所提出的原有建议，事情因此没有下文”。

李炯才表示，“政府已再三声明，愿意平等对待南大与新大，只要南大当局肯接受自己原来的建议，谈判就可圆满结束。新理事会成立后即可先拨出两百万元（当时跟新大一样）去改革及提高南大的教学水准。可惜，因为对方无诚意解决问题，事情因此拖延到现在”。

李炯才也批驳陈六使关于政府没有资助南大的说法，“陈六使先生口口声声说，南大未收到政府一分钱的利益，我相信他不会不知道在南大读书的新加坡出生学生，半数是由政府津贴的。政府并不是不愿意资助南大，而是有政治阴谋不愿意跟政府合作来发展南大，他们继续操纵南大，使它成为个人的政治武器”。

李炯才再次批评陈六使的言论使南大面对严重危机，“他自作主意把南大拖入政治漩涡，大家都知道它已经不是一个能安心研究学问的最高学府，而是某党培养干部的场所，假如行动党继续执政，时局尚可挽救，因为我们决心把南大搞好，我们将以已争取到的教育自主权去维护南大，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机构”，李炯才警告说，“万一亲共社阵胜利（这可能性甚

微），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宪法将被取消，联合邦说不会让一个勾结印尼破坏马来西亚的政党在星执政，届时，我们所争取到的一些自主权，将付诸东流，南大因已被陈六使先生染上颜色，所以前途系不堪设想。这将辜负了热心出钱出力支持南大的广大群众”。李炯才将南大问题与支持行动党结合在一起，呼吁“凡是真正爱护南大的选民，应该警惕，为了南大的前途，为了本邦人民的前途，大家应该投行动党一票”。⁶³

南大问题 1963 年大选中无可避免地成为选举的主要战场，执政党、反对党互相抨击，社阵候选人也多次以此为批评行动党执政的依据。在竞选期间的群众大会上，社阵丹戎巴葛区候选人、南大毕业生王发祥就批评行动党对待南大的方式，“它不断宣传要资助南大，在人们脑海里，南大大概多少已经受其津贴了，然而在实际上南洋大学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得到行动党一分钱的拨款，比林有福政权还要可恶得多（林有福政府曾拨款数十万元津贴南大赤字）”。王发祥称，“我们的宣传工具有限，要有效和广泛地揭发行动党的政治谎言，就必须出动大批工作人员，沿门逐户进行访问”。王发祥表示已经发动了南洋大学的学生参与反对行动党的阵营，“丹戎巴葛区是李光耀的老巢，痛恨李光耀的南大学生已有近千人报名参加该区工作了。他们将联合社阵该区支持者日夜拜访各户居民，把真理传达给他们”，王发祥也将 1962 年全民投票期间南大与新大联手进行的调查作为反对行动党的工具，“这一区的民意，在去年南大政治学会和新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调查中已经明白反映出来，有九十巴仙受调查者，恨透李光耀出卖人民政治权益的合并白皮书，在这浩浩的声势下，我跟各位一样确信在这场战斗中绝对能把李光耀打得落花流水”。⁶⁴

按王发祥所说，“近千名南大学生”参加丹戎巴葛区的选举工作，大概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南大学生直接参与选战，支持社阵、反对行动党却是确有其人。在社阵 9 月 14 日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南大学生陈华忠就在大会上发言，称“今日行动党在作临死之挣扎，我们必须团结所有的人民打倒李光

⁶³ 李炯才群众大会演说全文，《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0 日。

⁶⁴ 王发祥演讲词，《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4 日。

耀，李光耀的毒辣手段与林有福没有两样，但不管他以何种毒辣手段与高压手段来对付我们社阵和真正爱国之士，我们必定会胜利的”。⁶⁵

在同一场群众大会上，社阵候选人李诗东则猛烈抨击行动党的教育政策“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实际上是大力扶助英校，压制华文教育。华校新生锐减，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有的华校，正闹着拍卖校产，关闭的问题”。李诗东许诺“我们社阵执政了，掌握了教育部，我们将彻底改革这种腐败教育政策，大力发展巫、华、印三大民族教育”，并且“保证南大学位一定被承认，而且在财政上支助南大”。⁶⁶

在选战中成为漩涡中心的南大，犹如参加一场政治豪赌，不论何党执政，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南大必然会产生根本性变化。结果在 51 个选区的选举中，行动党赢得 37 个议席，继续执政，社会主义阵线赢得 13 席。选举过后，陈六使本人也开始面对行动党政府的强烈反击。

⁶⁵ 陈华忠发言词，《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6 日。

⁶⁶ 李诗东发言词，《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16 日。

第二节 政府清除障碍重启谈判

9月21日的大选，行动党取得胜利，“决定对一批知名人士采取行动，以期收惩一警百之效”，在行动党政府的名单上，“陈六使名列榜首”，名单上的都“曾替共产党人做事，他们以为凭着自身的财富和他们在说华语或方言群中的地位，就可以免受惩罚”。⁶⁷ 在大选结束之后的第二天，行动党政府即发表文告，“现已开始依法进行取消新加坡胶界巨子陈六使先生的新加坡公民权。所据理由是他曾经积极与坚持地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的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煽动份子，他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发由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抨击政府，以他的所谓保护华文、文化和教育当藉口”。⁶⁸

对于南大，行动党政府重申“新加坡政府的意图，一路来以及到现在，仍然给南大享受新加坡大学同等的待遇，政府将重新开始和南大当局谈判。这个前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少数共党队伍，向大部分南大学生及该校教职员，施行静寂的威吓与肉体上的恐怖手段，大部分师生们是很盼望南大发展成为一个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最高学府”。

声明也警告，“新加坡政府促进马来西亚意识下的华文，教育与文化健全发展目标，如果共产党能够利用好像陈六使这种人，当作他们反国家的活动的掩护，那么这目标将永远受到挫折”。

对于陈六使与共产党的合作，声明指出，“陈六使给这些亲共队伍的适时合作，是很久的，他曾经故意地，继续给这些危险颠覆性的反国家份子掩护，使他们通过种族社会跟种族偏见来引起灾祸。陈六使先生曾以为，他的财力跟共产党力量，对于他和共产党的轻率与危险性的合作会得到豁免权利。本政府已决定，不管一个人的财富和社会的地位如何，都不能够让他泰然地成为共产党的傀儡，危害新加坡的安宁与繁荣，以及马来西亚的和谐与团结”。⁶⁹

⁶⁷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568。

⁶⁸ 新加坡政府声明，*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3年9月23日。

⁶⁹ 同上。

陈六使被冠以与共产党力量合作的“罪名”，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到底如何？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资本家，陈六使曾经吃过共产党的苦头。据马共前总书记陈平透露，马共曾经破坏陈六使的橡胶厂。从这一点，也许可以显示陈六使和马共的关系，并非李光耀想像中的“同一条路”。据陈平所言，陈六使曾经和工人产生问题，而让私会党介入。结果，他的树胶厂被马共烧掉。“之后，陈六使在工人的要求问题上，态度有所改变”。⁷⁰

陈平认为，陈六使在马来亚历史上的功绩还是很大，并为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抱不平。“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没有陈六使就没有南大。南大获得群众积极支持，是因为陈六使起带头作用。他为这个问题付出很大代价，可惜还没有人为他建一个纪念碑”。“陈六使要平反，要等到新加坡政局有变化才行。要建纪念碑，要建在新加坡才好”。⁷¹

陈六使的政治立场与共产中国乃至马来亚的共产力量是否有相合之处？或是行动党政府所指责的成为共产党的傀儡？过去殖民政府或马来亚联邦政府对受华文教育者的政治指责，可以集中在他们心向中国、对当地认同不够等方面。但新加坡自治之后，作为自治政府，虽然仍心有存疑，在华人转向落地生根、认同马来亚的背景之下，为避免引起众怒，已经很难直接指责。

陈六使对于中国的态度，应该主要是作为商人的现实选择。在 1956 年 7 月赴中国的工商贸易考察团，就是一个例子。⁷² 该团缘起 1956 年 2 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庄电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筹组“返国工商考察团”，嘱托总商会特别董事陈六使、李光前等六人，代为转达总商会前任会长高德根和副会长叶平玉，组团赴中国大陆观光考察，“这项邀请随即引起陈六使和高德根两人的高度兴趣”。陈六使之所以有兴趣，据说是因为可以借此向中国出售树胶。其后 6 月时英国取消树胶禁运的规定，允许出售树胶给中国，更是直接解决了总商会为组团与否引发的争议，促使考察团顺利成行。考察团甚至希望此行以能与中国订立每年五亿新元合同为目标，而当时中新贸易额每年仅有 1.2 亿新元。为避免带有政治色彩，考察团制定章程，要求团员

⁷⁰ 郑丁贤《陈六使未平反是历史的遗憾》，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8 年 9 月 26 日。

⁷¹ 同上。

⁷² 台湾学者郭俊麟《战后新马华人与台海两岸（1956-1957）之互动——以新加坡民间自组访华工商考察团为例》一文对该考察团的活动和背景有深入的介绍分析，见李元瑾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页 259—294。

决不容有政治色彩、或藉考察工作进行政治活动，或发表政治性言论。考察团在中国进行了九周的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接见。中华总商会认为考察团取得成功，获得大量合同，包括从新加坡出口 7000 吨橡胶。⁷³ 然而根据台湾驻新加坡人员的分析，认为考察团“完全失败”，第一个原因就是叶平玉临行之前曾扬言新马与中国间贸易将达 5 亿新元，但回来证明仅有 1 亿元，中国对树胶采购量为数甚少，“使幕后主持人陈六使对中共大失所望”。⁷⁴ 台湾外交情报人员的判断固然可能有报喜不报忧的初衷，但在某种程度上显示陈六使与中国交往的商业因素考量。

新马商业考察团为陈六使更多地认识和了解共产党，增添了一些素材。中国十九路军蔡廷锴“三十年前就被海内外目为共产党”，但据曾与蔡廷锴同席过的考察团成员回新加坡后告诉陈六使，蔡廷锴申请入党已六年，迄今仍未及格做共产”，陈六使认为从蔡廷锴一例足证“共产并非随便人可做，并非要即来不要即去者”。⁷⁵

陈六使是一个大资本家，为什么却去支持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社阵呢？根据行动党政府内部的分析，是“受中共的摆布。因为中共是韩战参战国之一，也是战略原料树胶的大买家，其订单可以左右树胶的市价，而陈六使就以支持社阵和打击行动党来讨好中共”，这其中的证据“很难找，因为当时新加坡是在英国统治下的西方阵营，西方阵营对中国禁运，中共就不能公开从新加坡输入树胶。一切的贸易都是通过第三者或第四五六者来进行的，所以很难取得线索。不过，后来这种贸易变成半公开，就证实了我们的推断”。⁷⁶

行动党政府褫夺陈六使公民权的消息在南洋大学内引起了激烈反应，一些南大学生 10 月初发动罢课，甚至在后来辱骂高德根出卖南大，导致高德根愤而辞职。陈六使以个人名义发表“告南大同学书”，对学生“误信流言，竟对德根先生大公无私之任事精神加以责难，本人对此深表遗憾”。对于公民权被剥夺一事，陈六使表示，“至于我个人毁誉得失，我愿求诸社会的评

⁷³ 参见沈子周《一九五六年东南亚经济年鉴》（新加坡：东南亚经济导报出版公司，1957），页 253—300。

⁷⁴ 郭俊麟《战后新马华人与台海两岸（1956-1957）之互动——以新加坡民间自组访华工商考察团为例》。

⁷⁵ 《南洋商报》，1962 年 4 月 16 日。

⁷⁶ 行动党政府前官员与作者的电邮，2005 年 3 月 18 日。

判，亦企求不要因为诸同学的关怀，而至增加我的麻烦，这是我衷心所祈求的”。⁷⁷ 陈六使这份声明既要安抚那些为他感到不平的学生，也可以撇清自己与学生运动的界线，避免被套上“幕后黑手”或是借学生运动来向政府施压的帽子。

新加坡政府 9 月 22 日发表声明，第二天陈六使接到正式通知，并给予他一个星期时间，出示其公民权为何不应该被取消的理由。陈六使在接到通知的三天后，就聘请律师，依法向政府当局提出上诉，政府于是设立调查庭，于 1963 年 11 月 1 日开始聆讯。

按新加坡宪法，政府收到有关褫夺公民权上诉信后，将设立一个三人调查庭，以一名司法经验人士为主席，及两名政府委任的委员。调查庭根据政府的指示予以调查，然后向政府提出报告，政府决定是否下令褫夺时，将会考虑调查庭的报告。

就制度而言，这种程序并未为政府褫夺某一人物的公民权设置合理公平的独立评判功能。陈六使公民权的调查委员会以法律援助局主任迪那都为主席，二委员为蔡善进律师⁷⁸及黄麟根（新加坡大学历史系）。

在调查庭开始审理之前，政府代表律师和陈六使的代表律师就针对是否应该公开进行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政府代表律师首先要求在未正式予以调查之前，“要求调查委员会准许秘密进行调查此事，因为政府方面所将供述的证据中，有一部分是属政治部方面的情报，必须保守秘密”。陈六使律师表示反对，所持理由为两点：一是有前例可循，“最近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二宗类似的事，一宗是前公务员克鲁山克被褫夺公民权问题，另一宗是前本邦人民党主席阿都华哈沙被褫夺公民权问题，都是公开的”，其二是陈六使的社会影响，他将被褫夺公民权一事，“报纸上曾经发表甚多的消息，陈氏在此间居留逾四十年之久，在社会上有其地位，应该让他有均等的发表消息才公平，应该让社会人士知道”。⁷⁹ 经过双方交锋以及最终调查庭的裁定，最终不予公开，只允许陈永裕（陈六使的侄子）留在庭内担任陈六使的翻译。

⁷⁷ 《南洋商报》，1963 年 10 月 7 日。

⁷⁸ 蔡善进后来曾担任反对学生会的南大学生联谊会法律顾问，并出任内政部长。

⁷⁹ 《南洋商报》，1963 年 11 月 2 日。

调查庭随后即进入长达八个月的聆讯，最终在 1964 年 6 月 27 日向政府提交报告。政府在 1964 年 7 月 18 日发表文告，表示“已决定褫夺陈六使先生之新加坡公民权。政府采取此项行动乃系遵循一调查委员会所提出之一致建议”。⁸⁰

根据政府的文告，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称：“鉴于在本项目下（南洋大学之管理）所提出之一切供证，本委员会认为陈六使先生虽未亲自发起任何行动，但由于彼之许可，及对南大在籍学生与南大职员中之若干毕业成员有碍国家安全之行动未加制止，因此在该种程度上，陈先生对于南洋大学在彼辞去南大主席职位时所处情况，即南大在治安上成为马来亚之严重问题，应负其责”。⁸¹

政府文告说，“关于陈六使先生之政治行动，委员会称，有关主要者，系社会主义阵线之候选人乃为陈六使先生所认识，而其中十有八九为有碍安全人物。更重要者，系前为南洋大学学生会之中坚成员，现因共党活动而被拘留之社会主义阵线之一位毕业生候选人王发祥，曾向政治部供认，谓彼系陈先生以其本人名义所发表之一篇声明之执笔人。该声明曾于去年九月间刊载于所有华文报章，声明中宣称：‘参加此次竞选的梁关飞、林焕文、王发祥、林健生、蓝炽理等却是我本人非常熟悉。南大学生会过去常被当政者诬指为共产党，我以为做人最重要的是有主见，只要我们人认为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做，对于那些恶毒的指责，尽可以置之不理。作为长辈我应该勉励他们如果登台执政的话，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凡事秉公处理。南大问题亦只宜视为国家当前的许多问题之一’”。

报告书指“陈先生明知故犯将其在华人商界中所拥有之名望借人利用以掩护共产党候选人及南大中之共产党活动。在上述五位被提出姓名之人士中，二位因共产党活动现被拘留，另一位蓝炽理则已潜入地下。于聆讯时所举出之一项有关事实，乃为其他政党虽有南大毕业生作为候选人，但陈六使先生仅协助社阵中之此批亲共集团”。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称，“聆毕双方所提出之供证及双方律师之致词并经缜密考虑之后，本委员会确认陈六使先生曾在极大之程度上与南大在籍学

⁸⁰ 新加坡政府文告全文，《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18 日。

⁸¹ 同上。

生及毕业生联络，而该辈之目的及目标显然不特以一切可能办法对政府为国家创立一项共同国家意识，从而为所有民族谋求最高利益之政策加以反对，而且利用华文教育及华族文化以促进共产党在马来亚之目的。委员会认为陈六使先生出于极端种族主义情感，曾故意任人将彼利用以促进共产党在马来亚之目的”。报告书的结论称，“本委员会一致认为陈六使先生曾从事于妨碍马来亚安全及妨碍维持马来亚公共秩序之活动”。⁸²

陈六使被褫夺新加坡公民权，并不意味着他不可以在新加坡居住。根据有关法律，陈六使在 1955 年获得英国公民权，1958 年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后，若并未放弃英籍身份，即便新加坡公民权被褫夺，英籍身份不受影响⁸³，在新马已经合并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内政部长拿督伊斯迈在 1964 年 11 月 20 日于下议院回答询问时也说，“政府已根据新加坡副总理的决定，吊销了新加坡富翁陈六使的公民权。不过此举并不意味着陈氏不能够继续居留在本邦”。⁸⁴

居留没有问题，陈六使在 1966 年 8 月开始还赴中国检查身体，观光考察 50 多天后再回新加坡。

行动党政府决定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一方面是因为在大选中，陈六使“将南大拖入政治漩涡”，造成对社阵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解决南大问题“清除障碍”。之前关于南大的谈判，之所以拖延时日，据行动党内部的想法，“完全在于学校的控制权问题。政府出钱资助，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各方行政的控制权，如拟定课程内容、选取学生以及聘请教职员等。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南大成为培养共产党份子的温床。陈六使所代表的校方，在校内左派学生领袖的支持下，当然不容政府达到这些目的，而另一方面，左派学生也知道无法逼使政府放弃立场，况且达成谈判完满解决对他们完全没有好处，反倒促成行动党取得政治资本，所以就决定继续拖下去。还有南大校方的某些现存势力和既得利益的保持者，如潘国渠之流，也不想政府插手和接管南大，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饭碗和委任及聘请亲友的权力被打碎”。⁸⁵

⁸² 《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18 日。

⁸³ 《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19 日。

⁸⁴ 《南洋商报》，1964 年 11 月 21 日。

⁸⁵ 行动党政府前官员与作者的电邮，2005 年 3 月 19 日。

因此，宣布开始褫夺陈六使公民权，是开始着手解决南大问题的先行程序，这样政府才能够逐渐获得对南大的控制权。

大选刚刚结束，教育部长杨玉麟在 9 月 23 日约见南大理事会代表，表示“政府希望能从速地解决南洋大学的问题，使南洋大学能够得到健全的发展”，杨玉麟也强调，“南洋大学的问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南大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不能被人利用为政治工具”。⁸⁶ 陪同杨玉麟会见的政府代表包括在大选期间针对南大问题发表谈话的教育次长李炯才及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南大方面的新加坡理事有十人未出席会见，只有高德根、黄奕欢、黄开禄以及理事会的两名政府代表陈晋与孙一尘参加。陈六使也没有出席，副校长庄竹林迟到半小时到场，表示没有办法联络到陈六使。显示南大理事会对政府方面存在的抗拒心理和不信任，以及对政府褫夺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公民权的不满。

即便如此凝重的气氛不适合谈判，政府方面的目的仍主要在于宣示立场。杨玉麟指出，“现在大选已经过去，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我们已明白表示，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是拥有教育自主权，因此希望赶快解决南大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全民投票以前，政府就在努力解决它，可是始终不能解决，实在令人遗憾”。

杨玉麟继续批评陈六使，“在上星期，陈六使发表的声明，把南大卷入政治漩涡，这是不应该的，南大是一个教育机关，不应该卷入政治，在上星期，一辆又一辆的巴士车把整批南大学生载下来替社阵做宣传，虽然陈六使不止一次声称，不给南大学生搞政治，可是在这次大选，南大学生已卷入政治”。

杨玉麟表示“政府是真心诚意要解决南大问题，而且认为越快解决越好，使到南大不会再让人利用来作政治宣传”，这番话显示行动党政府对南大毕业生和在籍学生在大选中的表现和号召力十分在意。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看，担心南大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还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担心南大成为反对党的训练营，都促使行动党政府下决心采取强力措施，及早解决南大问题，使政府可以发挥对大学的主导作用，让南大遵循政府的轨道发展。

⁸⁶ 杨玉麟谈话，《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4 日。

因此，行动党政府采取主动，敦促南大理事会尽快与政府谈判，“政府将给南大及新大同等的待遇，这是配合平等对待各源流教育的政策，政府将根据公平合理的条件，解决南大问题，因此，希望南大方面能赶快派代表和政府联络，政府方面的代表将是李炯才与易润堂二人，至于南大方面要派多少名代表，自己可以决定”。⁸⁷

政府代表之一的易润堂表示，“在大选期间，陈六使公开表示支持南大学生竞选，他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任何政党，但明眼人不难看出，社阵在竞选广播中，说有一千余名南大学生支持他们，这简直是把所有南大学生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易润堂批评社阵“利用南大名义进行政治斗争，其实南大应该在健全的基础上发展，不能什么事情都在丹戎禺决定，要南大成为一个高等教育机关，这样做是不健全的，政府愿意帮助南大，与新大一样，南大所得的是人民公款，不能拿来乱用，否则就对不起社会与人民”。⁸⁸

易润堂也点明南大问题不解决对政治的影响，“一日不解决，就一日存有被人用为政治资本的可能性”，以前之所以无法解决，“是因为南大学生会、毕业同学会以及陈六使，都不愿接受政府的条件，希望这一次双方能派代表解决”。为避免选举胜利、褫夺陈六使公民权后就着手解决南大问题给人制造报复的印象，易润堂解释称“政府这次会见南大代表，并不是因为大选胜利，就要对付与控制南大，其实政府一路来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公平及合理地使南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等学术机构，得到最好的发展，而不致被人利用为政治工具，政府绝对没有意思对付南大及华文教育”。⁸⁹

宣示立场之后，杨玉麟便确定八天之后的 10 月 2 日为“恢复谈商的日期”，“再派代表至教育部会商”，与大选前的多次谈判相比，显示政府处理与南大协商手法趋向强硬和果断。

李光耀同一天也在另一场合强调“南洋大学的事件是一项教育问题，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划分为两点，即华文教育问题和共产党的颠覆活动问题，上述两点是不能混为一谈，不然一定会上共产党的当”。⁹⁰

⁸⁷ 杨玉麟谈话，《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4 日。

⁸⁸ 易润堂谈话，《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4 日。

⁸⁹ 同上。

⁹⁰ 李光耀谈话，《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4 日。

陈六使在南洋大学中的地位十分特殊，既是创办人，又掌管校政大权。而他在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都担任重要职务，是华人社会的领袖人物。因此，行动党政府的南大政策，要想行之有效，必须获得陈六使的合作，否则就如同六十年代初的谈判一样，无疾而终。行动党执政之初时，杨玉麟曾建议制定法令让陈六使无法管理南大，引起内阁哄堂大笑，⁹¹ 就说明了行动党政府对陈六使的影响力不敢小觑。在行动党 1963 年蝉联执政后，从选举的压力感觉到解决南大问题的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蝉联执政、获得立法议会中的控制权也赋予行动党政府更大的自信和权力，因此首先采取措施，将陈六使在南大中的影响力去除。

在大选结束之后，针对陈六使事件，舆论就放出风声，据“接近政府方面有关人士透露，政府此次准备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目的便是要将陈六使问题与南大问题分开，使南大不受陈六使影响，从而使南大问题能早日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南大也得永久存在”。⁹²

有关政府对南大的态度，报纸“从有关各方面探悉，本邦政府对南大的态度，是尽力维护南大，对南大问题的见解，认为是学术与教育问题，政府当局也以为单只新加坡政府方面承认南大地位，还是不够的，政府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南大得到整个马来西亚地区的承认，这样，南大毕业生在马来西亚整个地区才能有出路。目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对南大的看法，则是将南大问题与陈六使问题并为一谈，中央政府认为陈六使比林连玉更加危险。他们不愿看到南大成为反对马来西亚的大本营，因此，准备要采取行动来摧毁南大”。

但是新加坡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坚持教育自主权乃属于新加坡，有关教育问题，必须由新加坡政府处理，新加坡政府认为，陈六使问题是属于陈六使问题，南大问题是南大问题，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对于政府补助南大问题，据称“政府将根据一向来对南大既定政策，即是对南大给予新加坡大学同样的待遇，这即是说，政府准备给南大最高补助额每年八百万元，得到这笔巨款的补助，南大当局对学生的学费，应该可以重新调整，而减至最低数目。同时，也可以提高教授的待遇，并可以从世界各地聘

⁹¹ 《李光耀回忆录》，页 383。

⁹² 《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5 日。

请更多有资望的教授来校任教，这样，将可以使南大成为在这地区内，为各方所承认的最高学府”。⁹³

政府一方面着手进行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一方面杨玉麟会见南大理事代表、确定与南大重新谈判的日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方面再通过媒体非正式地发布有关南大问题和未来前景的信息，主要目的应该还是缓和社会上存在的不满情绪，为将举行的谈判和南大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外公布重新谈判的消息见诸于新加坡的各大报章，被誉为“大选给星加坡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久悬未决的南洋大学问题现在开始有了眉目”。而且对于政府的决心表示赞赏，“现在机会来了，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决定不负人民的委托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李光耀总理已经有明白的表示。这个机会不容错过，政府与南大当局都应该紧紧的抓住它，争取这个久悬未决的问题的迅速解决”。⁹⁴

“需要将南大问题的两个方面：华文教育问题与共产党颠覆问题分开处理”⁹⁵很快落实到行动上，1963年9月26日凌晨二时起，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援引公安法令，“在新加坡逮捕12名负责策动南大和华文中学学生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7名南洋大学毕业生及5名在籍学生”。被逮捕的包括：王发祥，前南大毕业同学会秘书长，社阵丹戎巴葛区候选人；林世昌，现任南大毕业同学会主席，南大理事会理事；林健生，现任南大毕业同学会秘书长，南大理事会理事，社阵芳林区候选人；谢醒民，南大毕业生，社阵樟宜区候选人；陈文藩，南大毕业同学会理事；林源德，南大毕业生；施义开，南大毕业生；李腾禧，经济系四年级，前任秘书部主任；欧笑作，经济系三年级（大学论坛摄影员）；周增禧，经济系三年级，南大（学生会）外交部主任；颜致今，化学系四年级，前任学生会副主席；黄乙新，中文系三年级，南大中文学会会长”。⁹⁶

根据马来西亚内部安全部长拿督伊斯迈在逮捕当天发表声明，称“共产党在9月21日企图通过选举夺取新加坡政权的行动宣告失败，已挫折了他们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度的阴谋。不过，他们将重新巩固和组织自己的

⁹³ 《南洋商报》，1963年9月25日。

⁹⁴ <南大问题现在有希望解决了吗？>，《星洲日报》社论，1963年9月26日。

⁹⁵ 李光耀谈话，《南洋商报》，1963年9月24日。

⁹⁶ 《南洋商报》，1963年9月27日。

力量，并将通过对民主程序的颠覆活动，来进行另一次夺取控制权的努力。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可以明显看到，一小部分的南大和华中学生的亲共份子曾对共产党运动起大大的刺激作用，通过他们的战术和行为来恐吓其他学生积极支持共产党统一阵线在新加坡的活动”。⁹⁷

声明还说，“这个小集团继续进行学生所不应为的事。如果再让他们自由干下去而不加制止，则将给共产党扩展他们在对新加坡学生和青年的控制势力。这小集团亦协助共产党统一阵线利用幻想中的华文教育问题作为破坏马来西亚治安的工具，同时推进他们夺取新加坡政治权力的目的。因此，现在为扫除共产党指挥的颠覆活动得要采取行动，逮捕和拘禁约十二名负责策动南大和华中学生学生的领袖人物”。⁹⁸

针对南大学生被捕的事件，新加坡政府也发表声明，“数月前，我们曾经指出，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将接管内部治安权，那时，亲共组织的组织人、煽动者以及外围组织领袖等，将遭遇一段困难的时间。现在，当局已采取了行动，共产党外围组织无疑地将如联合邦的情形一样，势力转弱；而共产党则更进一步转入地下”。⁹⁹

声明指“当局已对知识分子阶级采取了第一次保安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南洋大学的共产党与南大本身分开。前中学联的共产党煽动份子，已把持了南大学生会以及南大其他学生政治机构中的要职，但这项事实并不等于说明南大就是共产党。本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有自治权，因此，我们有责任协助中央政府，把共产主义与华文教育分开，使我们能依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有效地处理华文教育”。该声明重申，“新加坡政府在星期一所发表的声明，已明白表示，新加坡政府希望解决南大问题，其解决方式应先满足新加坡的人民，其次是满足华人社会领袖，第三是满足那些希望提高南大水准，并盼望南大学位在马来西亚各地获得承认之员生。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把共产主义与华文教育分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上面所说的一点”。

⁹⁷ 马来西亚内部安全部长拿督伊斯迈声明，《南洋商报》，1963年9月27日。

⁹⁸ 同上。

⁹⁹ 新加坡政府声明，《南洋商报》，1963年9月27日。

声明指出，“只要这种保安行动是用来对付那些利用华文教育以达到共产党目的之共产党，及对付那些危害南大前途之人士，那么，我们认为政府的这项行动是有正当理由的。新加坡政府将如过去一样，维护华文教育，并将以对新大同样的条件，予以财政上的援助。新加坡人民，尤其是华人，应采取步骤，确保南大不会变成共产党的政治工具，也不会成为其他左翼冒险份子政治集团的政治工具”。¹⁰⁰

警方在南大的逮捕行动受到了南大学生的反抗。根据皇家马来西亚警察总署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在9月26日凌晨二时十五分左右，警方人员往新加坡南洋大学逮捕亲共学生。正当最后四辆满载警员的汽车行将驶离该校时，数百名学生即上前将他们包围，这些学生早将该校大门加链上锁，并将一座守门人的木屋推至警员前面，挡住汽车去路，接着，学生们即投掷玻璃瓶及石块，结果两名司机受重伤，汽车亦破坏，他们亦将汽车的轮胎气放掉。至此，当局不得不召派警方增援部队，驱散学生，使警车及车上人员得离开该校场地，在这场混战之中，有数名學生受轻伤”。¹⁰¹

南大学生方面的说法则是在拘捕行动开始后，“当时有些学生上前干预，要求警方在押人离去前，通知副校长、院长或有关教授”，而警方没有接受此要求，“有一些学生即去把校门关起，继续向四辆尚未离去的警车人员要求将情转达学校当局”，镇暴车不久就赶来，“警方和学生曾经三度对峙”。南大学生被捕后，聚集在宿舍外的“千余名学生，纷纷自动提出罢课抗议，五时许，示威标语、布条开始书写，至大约七时，云南园里已张挂起各种罢课的标贴”。后经副校长庄竹林劝告，“上午十一时，南大校园内的各种抗议布条与标语，已全部除下，秩序恢复，下午照常上课”。¹⁰²

在这次抗拒逮捕的行动中，两名南大学生翁隆胜和李怡书被指在南大校门参加非法集会，欲夺回二位遭警方逮捕之同学，“触犯暴动罪嫌”，也被控。

社会主义阵线迅速发表声明，“极力谴责此种镇压人民的行为，并要求将所有无辜人士立即无条件释放。内部安全委员会在今年二月间逮捕了 130

¹⁰⁰新加坡政府声明，《南洋商报》，1963年9月27日。

¹⁰¹皇家马来西亚警察总署发言人声明，《南洋商报》，1963年9月27日。

¹⁰²《南洋商报》，1963年9月27日。

多名无辜人士，理由是指这些人将诉诸武力，反对马来西亚。现在马来西亚已经成立，并无暴行发生。然而，中央政府不仅不把那些未经审讯即加以扣留的无辜人士释放，反而对更多的人采取镇压行动”。¹⁰³

大选中惨败的人民统一党也发表声明，严词指责社阵将南大带入困境，该党称“南大的前途是未可确定的。随着吊销陈六使先生公民权的行动，南洋大学被强迫接受政府的条件，现在，我们看到学生领袖被逮捕。这种情形是非常严重的。在新加坡的政党中，几乎都有采取违反南大利益的行动，南大的恶劣情况，应归咎于社阵。社阵曾在大选中，利用南大以期夺取政权。竞选期间，我们发觉社阵，准备利用各种行动，包括散播恶意的谣言，以便达到其目的。他所通过宣传人员、群众大会以及机关报，尤其是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三天，散播谣言说，人民统一党接受美金，这纯粹是荒谬的。他们不敢接受我们重复的挑战，共同调查我们的账目，他们带来了行动党胜利。社阵使亲殖民主义的人民行动党的胜利，比民族主义的人民统一党的胜利更加容易”。¹⁰⁴

人民统一党批评，“利用南大的结果，社阵的领袖已为行动党打开了进一步压制南大的大门。如果社阵领袖真心诚意照顾南大的利益，纵使忘记当他们为行动党的次长时所做对南大不利的事情，他们必须让南大听其自然，而不是带领它到目前的恶劣情况”。¹⁰⁵

在 1962 年 7 月 14 日依照南大法令成立的南大理事会中，政府没有绝对的发言权。陈六使任理事会主席，刘玉水为副主席，财政为高德根，秘书为南大教授代表谢哲声，并组成十名常务理事会，以理事会正副主席、副校长、财政及秘书为当然委员，另选五名委员，政府代表只有一名，其余为林健生、黄开禄、傅文楷及黄奕欢。正因为此，在南大理事会于 1963 年 10 月 1 日召开会议讨论与政府谈商的问题时，通过决议“请陈六使先生仍旧担任理事会主席一职”，政府代表不具有绝对影响力，只能在会后发表声明澄清在讨论陈六使辞职案时，“曾代表政府向会议建议应接受陈六使的辞职”，

¹⁰³ 社阵声明，《南洋商报》，1963 年 9 月 27 日。

¹⁰⁴ 人民统一党声明，《星洲日报》，1963 年 9 月 28 日。

¹⁰⁵ 同上。

但付诸表决时，多数理事表决通过挽留，他们“曾当场要求将他们的反对意见记录在案”。¹⁰⁶

经过一些政治事件之后，政府与南大代表开始进行“融洽气氛中”¹⁰⁷的商谈。教育部政务次长李炯才再度重申政府的南大政策，“真心诚意解决南大问题，这不只是为了华文教育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是为了南大学生及社会的利益着想”。李炯才也强调“必须把教育和政治分开，政府真心地要使南大成为一个最高学府，使南大学生能够专心求学，同时，希望南大学位不只是受到新加坡政府的承认，也受到整个马来西亚的承认，我们一路来的政策是要给南大平等的待遇，与新大所得的待遇一样”，但是条件是“南大也必须适当地改组”。李炯才也代表政府向南大理事会代表“郑重提出保证：政府无意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大家知道南大是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¹⁰⁸

行动党政府将“教育和政治分开”的做法，通过褫夺陈六使公民权、中央政府逮捕南大毕业生和在籍学生、逮捕部分南大理事会理事，为政府与南大理事会之间的谈商清除了不少政治障碍。虽然如此，政府与南大理事会之间的谈商仍须面对不少压力。被捕的两位南大理事会理事林健生和林世昌都是南大毕业同学会在理事会中的代表，但在南大理事会开会，讨论与政府谈商事宜时，毕业同学会又派出两名代表出席，包括社阵裕廊区议员谢太宝（chia thye poh）以及郭任水（Ker Jim Swee），尽管政府代表“当场质询该二人的出席资格”，“反对该二人出席会议，但理事会对此并无任何明确的决定”。¹⁰⁹ 其后毕业同学会又发表声明表示“谢太宝和郭任水二名代表是经本会理事会讨论所议决者，在致于为南大理事会所接受函件中，已清楚列明”，并讽刺政府“逮捕了我们二名南大理事会理事和本会的二名理事，以为本会便无法推选另二名代表出席十月一日假怡和轩召开的南大理事会会议”，声明也批评理事会中的“政府代表对本会的出席资格问题，提出无理的质问，企图取消我们在南大法令下的合法地位”。¹¹⁰

¹⁰⁶ 《南洋商报》，1963年10月3日。

¹⁰⁷ 李炯才谈话，《星洲日报》，1963年10月3日。

¹⁰⁸ 《星洲日报》，1963年10月3日。

¹⁰⁹ 南大理事会政府代表联合声明，《星洲日报》，1963年10月3日。

¹¹⁰ 《南大毕业同学会声明》，《星洲日报》，1963年10月4日。

与政府谈商的南大理事会五人代表，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政府强势的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则是大学内部学生会等组织以及外部毕业同学会和其他舆论的压力。10月3日，南大学生会召开两个小时的“紧急大会”，通过包括“号召罢课三天在内”的四项议决案：“一，大会重申南大同学对政府所提的合理要求：1，放弃褫夺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2，保证不得修改南洋大学法，及不得利用任何谈判企图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之性质。3，释放二名南大理事会理事及被捕同学。4，保证不再动用军警，以破坏大学的自主权及安宁的学习气氛。5，无条件资助南大。6，承认南大学位。二，大会诚恳地呼吁董事、教职员，以及各阶层社会人士密切关注政府迫害南大的发展，团结一致，对南大同学的正义斗争，给予有力的支援。三，际此南大对彻底迫害的紧要关头，大会呼吁全体同学团结起来，坚持正义，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四，本大会号召全体同学罢课三天，强烈抗议政府毫无诚意解决南大问题，漠视学生会所提四项先决条件，并企图通过谈判控制南大，进一步迫害南大”。¹¹¹

南大学生的抗争是以捍卫华文教育、华族文化为旗帜，以引起社会的最大反响，在《103 罢课事件告同学书》中，学生会认为“我们不是成为捍卫南大、捍卫民族教育的英勇战士，我们便堕落为扼杀南大、扼杀民族教育的帮凶或凶手”，因为“南大一经失去，便意味着华文教育从中小学以至大学的全面垮台，便意味着华族文化必惨遭扼杀的厄运。南大的胜利，正象征华教、华族文化的胜利，南大的失败，便是华教、华族文化的失败”。¹¹²

南大学生会的呼吁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响应。包括公教校友会、华侨校友会等在内的全星三十二单位华文校友会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南大学生会的四大要求。¹¹³

就在政府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谈商即将有所结果之际，南大学生会强力介入，从外部表达看法，施加压力，自10月3日起“开始罢课三天，抗议政府无诚意解决南大问题及漠视学生会目前所提四项有关解决南大问题的先决条件”。¹¹⁴ 南大学生会“曾在政府与南大理事会代表开始商谈之前的9月30

¹¹¹ 《南洋商报》，1963年10月4日。

¹¹² <103 罢课事件告同学书>，见南大学生会《第7届执委会报告》，页64。

¹¹³ 《南洋商报》，1963年10月5日。

¹¹⁴ 《星洲日报》，1963年10月4日。

日就致函总理李光耀，提出谈判的四项先决条件，并要求政府于10月2日以前给予答复，但是政府没有给予任何表示”。¹¹⁵ 罢课开始后，虽然庄竹林率大学高层“劝戒学生取消罢课行动，赶快复课，以免违背学校纪律，增加谈判困难”，但是南大学生已经开始“把手第二重校门，除南大师生及职员外，其他人等，不准入校”，而警方亦于裕廊路十三英里警署前设置关卡，检查来往车辆。¹¹⁶

围绕南大问题的谈判或斗争，已经形成包括政府、南大理事会和南大学生及毕业生的三股力量。南大理事会由于成员包括政府代表和南大毕业生代表，因此夹在中间，关系微妙，处境尴尬。

南大学生在抗争的过程中，也将矛头指向理事会，10月3日晚上，南大学生与数工团的工友，在南大校内举行大会，在会上学生代表发言攻击高德根出卖南大，使南大理事会谈判代表高德根颇感“灰心”，提出辞职。高德根认为，自南大开办以来，他一直追随创办人的宗旨，出钱出力，可是到头来却得不到好评。他说对南大问题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有的只是以南大募捐主任身份发言，呼吁各界人士热心捐助南大。他不懂得学生这些话是从何而来，既然学生认为他出卖南大，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只好引退。¹¹⁷

导致高德根被学生批判的导火线就是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谈商中的政府在理事会中代表名额问题。此次谈判经过三次的“友善气氛下会商后，所有原则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据说有关政府代表在南大理事会席位的问题，在会谈中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接受南大理事会在上次会谈中所提出的原来建议，即政府派出六名代表参加理事会。据悉新加坡政府派出原有三位代表外，另外三个席位则将分配给马来西亚各地政府的代表。经过一番讨论后，双方对此已达致协议，可是不知怎的，会议内容被透露出去，给南大学生获悉这项消息，因此南大学生就利用这个问题在学生工友大会上攻击高德根出卖南大”，¹¹⁸ 南大学生对高的谴责也被认为是“反映了理事会内部有相同的观点，一些沙文主义的政治激进者对学生加以默许和纵容”。¹¹⁹

¹¹⁵ 南大学生会发言人谈话，《星洲日报》，1963年10月4日。

¹¹⁶ 《星洲日报》，1963年10月4日。

¹¹⁷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3年10月6日。

¹¹⁸ 同上。

¹¹⁹ Justus M. Van Der Kroe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ilemmas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110.

高德根对消息泄漏的问题十分不满，在 10 月 4 日的南大代表与政府代表谈商会上提出质问，究竟这项消息是如何被透露出去。¹²⁰

无论是被谁有意无意泄漏出去，都显示南大理事会与政府的谈判涉及复杂的幕后斗争，这也是南大问题一波三折的原因所在。

高德根的辞职显然会对南大与政府的谈判以及南大走向带来很大的影响。南大学生会致函高德根，否认曾经指责高“出卖南大”，澄清当晚集会“发言者从未对台端作过任何指责与批评”，学生会也表示“一路来任何集会与会谈从未有指责台端‘出卖南大’”，认为高德根对学生会的“误会乃别有居心者之挑谤所致，当南大面对危机之时，台端之引退辞职对理事会之团结乃不利者”，希望高德根打消辞职之意。¹²¹

南大学生会发动罢课，并在 10 月 7 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带领“约八百名南大男女学生”，列队举标语，集体游行到政府大厦前广场集中，向政府请愿。并派出五名代表蓝炽群、林惠乾、林春顺、刘国生与林春香，前往总理公署，提呈六项要求的请愿书。由副总理杜进才（时任代总理）和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会见学生代表，对学生的请求给予书面答复，其后杜进才举行记者会。南大学生提出六项要求，包括“一，政府必须放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二，政府必须释放被捕之南大理事会理事及同学，三，政府必须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令及不得利用任何谈判企图，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性质，四，政府必须保证今后不得动用军警、特务、建国队以及一切其他方式与行动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和平之学习环境，五，政府必须无条件资助南大，六，政府必须承认南大学位”。¹²²

杜进才对南大学生的请愿做出书面答复，“有关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问题，目前正在公民权委员会的考虑下。有关学生被捕问题，此乃属于中央政府管理，政府将提交与中央政府考虑，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问题应与治安问题分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有关资助南大及承认南大学位问题，目前政府代表正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谈判，相信必将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政府恳切希望南大学位，不但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承认，而且也将得到马来西亚其他地区

¹²⁰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3 年 10 月 6 日。

¹²¹ 南大学生会致高德根信函原文，《南洋商报》，1963 年 10 月 7 日。

¹²² 南大学生致李光耀请愿书全文，《南洋商报》，1963 年 10 月 8 日。

政府的承认，因此南大必须根据魏雅聆报告书，进行改组，以便提高学术水准，使南大成为一间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最高学府，在这同时，政府将继续聘用南大毕业生，只要他们通过公务员委员会的批准”。¹²³

对于南大学生的抗争请愿，新加坡政府将其与“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积极策划暴力斗争”联系起来，专门发表声明，“种种迹象显示：共党份子在这次选举中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权力的企图失败之后，正积极策划进一步的暴力斗争。正如以往一样，他们正在动员职工会，亲共的南大学生以及一些中学生为掩护，从事各式各样的激烈煽动”。¹²⁴

声明指出，“这种煽动是由一群亲共的南大学生，以维护华文教育的名义而开始，现在已扩展到亲共的职工会方面。前天，所谓新加坡职工总会主席的巴尼先生，公开威胁：如果政府不接受沙都属下几个职工会的有关要求，他们将采取‘集体行动’。一些亲共的职工领袖还曾赶去南大，替那些亲共的学生打气，鼓舞他们采取违犯纪律的行动”。政府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共产党人根本没有兴趣解决南大问题，而只是利用南大问题为烟幕，以激起所谓：集体行动”。

政府的声明对巴尼提到政府向南大学生“进攻”的说法加以批驳，认为“这意味着：亲共的职工领袖和学生，非但不肯让南大当局和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南大问题，而且已经决定要把它成为一个政治论争，从而为他们所策划的集体煽动提供燃料”。声明说，“沙都集体职工会的领袖们，正在准备发动几项罢工，同时则使亲共的南大学生以及尽可能的动员中学生互相配合起来，进行游行。他们希望：这种工业行动与学生以及学童的游行相配合，将可引起暴乱的火花。正如以往一样，共产党人是想制造警察和学生以及学童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学生容易激动，所以鼓励学生不遵守法令，在没有得到允许下举行抗议游行，这样，警察将被迫干预，从而发生冲突”，“因此政府特地向工人、学生、学童们呼吁；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共产党人利用的工具。这些共产党的死硬份子，正如林清祥有一次形容他们说：‘认为只有暴力途径才能在政治上收复失地’”。¹²⁵

¹²³ “杜进才对南大学生请愿书的书面答复全文”，《南洋商报》，1963年10月8日。

¹²⁴ 新加坡政府声明，《南洋商报》，1963年10月8日。

¹²⁵ 同上。

政府认为“当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有机会在选举中夺取权力时，他们曾暂时抑制暴力行为。但是当他们在最近的选举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人民委托政府去制止他们的活动时，共产党人对于合法手段再也不感兴趣了。因为全民投票和这次大选的结果，已经清楚地教训了共产党人，他们是没法在合法斗争中得胜的”。

声明批评南大学生混淆和干扰了政府取缔工业行动，“如果一些无知的学童和被误导的大学生，不为共产党人利用为掩护，政府对于他们所策划的集体行动，将可有效地及时地加以制止。所以政府号召工人，不要被共产党人利用为工具，去从事掩护共产党人的暴力斗争。政府也号召所有家长，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充当共产党人的盾牌，他们远离警察，躲在安全的工会内或党部办公室里，却企图指使你们的子女去与警察发生冲突”。声明还指出，“没有工人、学生和学童作他们的掩护，共产党人要想燃起任何动乱的火花，政府是会有效地顺利地去扑灭的。大家也须记住：一些社阵的领袖曾在以前的立法议会里再次警告过：在某种情况下，鲜血将会流遍新加坡。现在，当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之后，正企图实现他们当初的警告。因此，新加坡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坚决不让自己或儿女陷入共产党人所策划的暴行中”。¹²⁶

南大学生、职工运动抗争的原因复杂多样，有其合理因素，也可能有幕后政治力量的鼓动。从政府的角度看，将抗争直接与共产党挂钩，是解决难题、争取民心、制造合理理由的有利途径。

南大学生的抗争和请愿，第一条就是有关陈六使的公民权问题。随着新加坡政府将南大学生的请愿活动与共产党人的煽动联系起来，陈六使的公民权问题亦趋于复杂。鉴于此，陈六使在政府发表声明之后两天，也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此次本人公民权问题，可谓纯系个人事件，既与社会无干，当不便惊动任何方面人士，惟友好关怀之情，本人实深感激”，对于南大学生的请愿，陈六使称“日来若干方面竟利用本人之问题，在报章发表意见，提出要求，甚至张贴标语造成不寻常之气氛，本人对此殊深引为震撼，盖利用私人事件对社会发为言论，固属不当，对公对私俱无善处”，陈六使特别声明，自己的名字“不欲被人利用以达其某种目的”，并希望“各有关方面知

¹²⁶新加坡政府声明，《南洋商报》，1963年10月8日。

所体察”。对于南大问题，陈六使也表态支持南大理事会代表与政府谈商，“本人具有充分信心”，对于“若干”南大学生对理事会代表的批评，陈六使表示不满，认为“殊属不该，盖南大理事会负责策划南大进展事宜，而各同学则宜专心向学，勿为外界所撼，实为重要”，陈六使认为南大学生会应该“对五人谈判代表应公开发表寄予极大信任，使五代表安心与政府妥商处理南大善策，共获协议”。¹²⁷

陈六使发表书面谈话的同一天，高德根也决定收回辞呈，接受南大理事会的挽留，南大常务理事会更发表声明，要求南大学生会在澄清对于高德根批评的“流言”之后，“再度发表声明，表明对于五人代表团与政府谈判改善南大事，表示信任，方为合理”，南大理事会“并希望南大学生会为南大前途计，与本理事会充分合作”。¹²⁸

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谈判中的波折暂时消除之后，会谈“步入决定性阶段”，虽然双方在10月10日进行了“气氛非常融洽”的谈商，“会谈大有进展”，但由于“尚有一些细则问题需要从长计议”，因此决定展期到月底进行，但是直到11月20日刘玉水至槟城到新加坡，仍称“继续会谈日期正待确定”，“双方未有症结问题，可望在继续谈判时，获得解决”，目前情况是“一切很好，解决南大事，仅属时间问题”。¹²⁹

但是双方谈判似乎就此平息下来，再无下文。在12月9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立法议院演说时，透露了谈判僵局所在，“南大理事会迄今一直排拒政府用以协助他们提高水准及整顿组织的拨款，大部分原因在于共产党能操纵华人商界的某些自认为可继承陈嘉庚衣钵的领袖”。¹³⁰

对于行动党政府来说，南大内存在的障碍必须清除，李光耀认为，“在南大，由于他们的财政自主使他们陷于学术困境，发展了一种局势，如果在五年内不加以制止，将变成一间延安大学，由年轻的亲共毕业生及学生领袖，操纵整个南大理事会，那些由理事会每年续聘的教授及讲师，将不会有

¹²⁷陈六使书面谈话，《南洋商报》，1963年10月10日。

¹²⁸南大常务理事会声明，《南洋商报》，1963年10月10日。

¹²⁹《南洋商报》，1963年11月23日。

¹³⁰李光耀在立法议院的演说，《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3年12月10日。

经济安全，更谈不上学术自由了。事实上，除非共产党对它的政治滥用加以暴露及阻止，否则南大问题不能解决”。¹³¹

直到 1964 年 5 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华人教育背景的义安工艺学院建校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透露，南大问题不久可“获得合理解决”。¹³² 其后，便在 1964 年 6 月举行第五次会议，“开诚布公地讨论如何改善南大问题”，双方的原则均是“希望南大问题能早日获得解决，俾使南大学生能在安静及无政治扰乱的环境中研究学问，并于毕业后学位不但能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承认，而且得到马来西亚各邦政府的承认”，最终达成六项协议：第一项就是“应早日进行改善南大，关于改善南大的实际工作细节问题，则交由未来的南大理事会，以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为蓝本，进行讨论改善事宜”¹³³。在 1960 年南大与政府谈判时，曾经取消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南大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为谈判的依据或基础，而是按照人民行动党中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语言与政治》的手册。其中收录了三篇重要文章，包括李光耀总理的《政治与语言》，教育部长杨玉麟的《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政策声明》和副总理杜进才博士的《中国的果树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上成长》。根据陈六使向南洋大学星马十二州代表会议报告，称“政府现要南大研究该手册，政府且表示，今后政府与南大当局会谈有关南大问题将以该手册内容为根据。过去的白里斯葛五人报告书及魏雅聆七人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政府将不再提出”。¹³⁴

如今又回到以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为蓝本，显示双方的关系和地位已经大为不同，行动党政府在 1960 年时的谈判着重在政治导向上占据主导地位，本文曾在上一章指出，这标志着行动党政府独立南大政策的形成，解决南大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谈判根据行动党三名要员的谈话，体现行动党政府要求南大按照行动党政府的建国发展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由于三人的谈话仅仅是政策性的宣示和表述，

¹³¹ 同上。

¹³² 《南洋商报》，1964 年 5 月 25 日。

¹³³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联合声明>，《南洋商报》，1964 年 6 月 6 日。

¹³⁴ 《南洋商报》，1960 年 7 月 7 日。

并不能成为具体事务的指导原则。因此，在其后的商谈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魏雅聆报告书的蓝本和设计，对行动党政府而言，可说是进退自如。¹³⁵

经过数年的形势改变之后，政府已经基本达致目的，消除政治障碍后，可以回归到学术和行政管理的层面解决问题。

协议的第二点是“南大经过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像新加坡大学同样待遇，俾使南大学生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完善”。第三点为“南大经过改善后，必须成为一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应受任何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的左右或影响”，第四点为“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以前已屡次作此保证，在马来西亚的宪法下，新加坡仍保留教育自主权，因此，政府将可继续实施以往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¹³⁶

第五点为“经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政府代表指出，目前南大学位已得到新加坡政府有条件的承认，即凡获得政府补助学校之南大毕业生，所得待遇已与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平等。目前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亦须受公务员委员会批准。政府代表亦指出，目前在各政府部门，政府学校及政府辅助学校任职的南大毕业生已超过六百名，他们的薪金，完全由政府公款支付。）

协议的第六点是双方对南大理事会组成的安排，“南大十二州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政府代表六位（其中三名争取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政府选派），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三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二位，社会贤达五位，总共二十八位”。政府原本建议的政府代表在理事会中的名额为十二位，之所以改变初衷，“是因为要表示政府有诚意解决南大问题。为着争取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及马来西亚各邦政府于南大改善后承认南大学位，新加坡政府表示愿意将政府六名代表名额保留三席，由政府邀请马来亚联合邦，砂劳越及沙巴三邦政府各派一代表出席，以便共商南大的前途及发展”。¹³⁷

¹³⁵ 参见本论文第四章。

¹³⁶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联合声明>，《南洋商报》，1964年6月6日。

¹³⁷ 同上。

对于该协议，谈判代表之一的南大理事、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认为是“南大的一个很好的开端，南大的前途势必光明，这次协议足见政府对解决南大问题具有诚意，这是关怀南大的热心人士的一项喜讯”。¹³⁸

南大联络委员会的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在 1963 年 10 月 2、3、4、10 日经过四次商谈，基本已达致共识，为何中间突然停顿，政府方面似乎有意放缓脚步，直到 1964 年 6 月 5 日才恢复商谈，并达成协议？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李光耀所认为的“南大理事会迄今一直排拒政府用以协助他们提高水准及整顿组织的拨款，大部分原因在于共产党能操纵华人商界的某些自认为可继承陈嘉庚衣钵的领袖”之外，南大内部在自 1963 年 10 月到 1964 年 6 月发生的一些变化，对于政府方面解决南大问题形成了有利的局面。这些变化包括南大毕业同学会的合法性受到会员的质疑、南大学生会的影响受到新成立的南大学生联谊会的削弱，堡垒被从内部攻破，为政府解决南大问题清除或者削减了不少障碍，下一节即探讨南大内部组织在这方面的变化。

¹³⁸ 《南洋商报》，1964 年 6 月 7 日。

第三节 南大学生、毕业生组织的合法性之争

1964年2月，一个新成立的名为“南大毕业同学会革新委员会”的组织发表宣言和告社会人士书，猛烈抨击现有的南大毕业同学会“已被极少数崇尚极权政体的推销员霸占了。他们自认代表全体南大毕业生，任意从事政治活动。前年的全民投票及去年大选，这一小撮不负责任的极端份子，竟敢盗用全体南大毕业生的名义，敌对全星绝大多数选民的一致意志和自由体现；继而极力阻挠马来西亚新国家的形成，顿使全体南大毕业生成为国人的公敌！”

革新委员会批评领导同学会的这批人“完全辜负了星马砂沙各阶层人士创办南大的初衷，扫尽了南大身为高等学术机关的尊严与权益。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出卖我们的南大毕业同学会，将它作为极权政党训练干部的中心”，也使南大毕业同学会成为“一个对我国现实环境有不良影响的组织”。¹³⁹

革新委员会在发表的“告社会人士书”中质疑同学会的合法性，指出“现有的毕业同学会的章程来看，这个会的组织似乎与南洋大学法背道而驰”。首先是名称，按照南洋大学法的规定，这个会的名称应该是“南洋大学毕业生同学会”，现有的同学会章程中，竟少了一个“生”字，变成“南大毕业同学会”。至于同学会章程中的“会长”、“副会长”等字眼，根本是不允许存在的。在南洋大学法第二十五条中载有这样的文字：“毕业生同学会由校长（兼任主席），与本大学全体毕业生共同组成之，拥有法规所规定之权限”。革新委员会质问，“为什么要擅自改头换面？为什么同学会的主席不由南大校长来担任？这种篡改南大法令且不遵照南大法令行事的不法之徒，究竟能为这个组织带来何种利益？”¹⁴⁰

由于革新委员会质疑同学会的合法性，认为同学会不是依照南大法令而成立的法定组织，而是需要向社团注册官注册的普通校友会的组织。因此“是非法的”，¹⁴¹ 并决定与南大当局依照南大法令重新成立毕业生同学会

¹³⁹<南大毕业同学会革新委员会宣言>，《南洋商报》，1964年2月21日。

¹⁴⁰<南大毕业同学会革新委员会告社会人士书>，《南洋商报》，1964年2月21日。

¹⁴¹<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声明>，《南洋商报》，1964年2月27日。

取而代之，革新委员会也更名为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双方之间的笔战和交锋也越来越猛烈，筹委会批评同学会的领导层“明地里将毕业同学会卷入政党斗争的漩涡，暗地里藉南大毕业同学会的名堂，进行破坏国家的工作”，筹委会决心“将政治排除出南大，同时为国家肃清内奸”。¹⁴²

1963年10月1日南大理事会开会讨论与政府谈商事宜时，因毕业同学会派出的两名理事被捕，该会又派出两名代表出席，包括社阵裕廊区议员谢太宝以及郭任水，尽管政府代表“当场质询该二人的出席资格”，“反对该二人出席会议，但理事会对此并无任何明确的决定”。¹⁴³ 南大毕业同学会后来发表声明，批评理事会中的“政府代表对本会的出席资格问题，提出无理质询，企图取消我们在南大法令下的合法地位”。¹⁴⁴

针对此点，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也在多次的声明批驳毕业同学会派出谢太宝和郭任水的资格，“根据南大法令，谢太宝在未辞去南大助教时，根本没有资格当南大理事，郭任水是南大助教，当然也不能例外”，¹⁴⁵ 而且，根据南大法令，南大理事必须是南大会员，“根据1963年9月编印的南洋大学会员名录，谢太宝、郭任水等人的名字，都不在上面。这些人既未曾先成为南大会员，居然自封为南大理事，厚着脸皮出席理事会会议，妄想一手遮天，欺骗所有毕业同学及多数热爱南大支持南大的人士”。¹⁴⁶

同学会另外一点被批评的就是会员组成问题。根据南大法令，所有毕业生都是会员。而筹委会指出，根据现有的毕业同学会的章程第三章会员资格第2条，凡为南洋大学毕业生皆可参加为普通会员，第四章入会手续第1条，参加普通会员者，须填妥申请表格，由该会理事会通过承认之，“他们通过承认的会员实在少得可怜。在章程还没有修改之前，有资格出席的会员，仅仅不过计几位的同路人”。¹⁴⁷

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与现有的毕业同学会针锋相对，质疑同学会的合法性，根本原因在于两方的立场不同，或者说筹委会对同学会的参与政治活动深感不满。通过质疑合法性进而要取而代之，则是进攻的一种策略。筹委会

¹⁴²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书面声明》，《南洋商报》，1964年3月1日。

¹⁴³ 南大理事会政府代表联合声明，《星洲日报》，1963年10月3日。

¹⁴⁴ <南大毕业同学会声明>，《星洲日报》，1963年10月4日。

¹⁴⁵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声明>，《南洋商报》，1964年2月22日。

¹⁴⁶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声明>，《南洋商报》，1964年4月3日。

¹⁴⁷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书面声明>，《南洋商报星期刊》，1964年3月1日。

批评同学会“对外的一举一动，更是令所有的正义人士所不齿”，过去四年的所作所为，“与绝大多数毕业同学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毕业同学的整体利益工作，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情形与南大学生会同出一辙”。筹委会直接点名同学会的主要理事，“如林健生、梁关飞、谢太宝、林焕文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原本就是学生会最活跃的亲共份子，毕业之后又再控制毕业同学会，继续玩弄他们的政治伎俩”。¹⁴⁸

筹委会认为，同学会之所以要违反南大法令，“故意使组织不合法，不过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阴谋罢了”，“其实他们不是不知普通同学会要经过注册官批准注册，可是普通注册团体就不能够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了，他们更知道依南大法成立的毕业生同学会必须以副校长为主席，全体毕业同学必然成为成员，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畅所欲为了。但他们深深企求南大毕业同学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于是他们一方面向注册官交代说是依南大法成立的同学会，以便豁免注册，呈上活动报告，另一方面在毕业同学面前交代说是普通校友会，需申请批准，从而排除异己，得胡为枉法”。¹⁴⁹

筹委会对同学会发起的“进攻”，占有一定的法律优势。对同学会所做所为的批评，也在社会上得到对左派色彩浓厚的同学会不满的舆论支持。时为革新委员会的代表面见南大副校长庄竹林，根据其整理并送呈庄竹林备案的谈话要点，“四年来校长并非‘毕业同学会’之主席，故对该会章程‘不甚了了’，并言‘无权过问’。盖该会之组织不符合南洋大学法，乃属校友会性质。校长主张‘南洋大学毕业生之感情，不应从事于易引起纠葛之活动’”。¹⁵⁰ 正是在面见庄竹林之后，革新委员会决定改名为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

一些团体也表态支持，一个名为新加坡学生家长联合会的组织即支持筹委会的设立，称，“任何大学初创伊始，教务应力求高水准之学术，校政须着重校风严格”，而南大“居然‘昨日要求政府应无条件津贴，今天非议政府不承认学位’，舍本逐末，导致少数政治学生，乘机崛起，兴风作浪，在

¹⁴⁸<南大毕业同学会革新委员会告社会人士书>，《南洋商报》，1964年2月21日。

¹⁴⁹<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书面声明>，《南洋商报》周刊，1964年3月1日。

¹⁵⁰<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致南大庄副校长函>，《南洋商报》，1964年2月22日。

校内殴打异己学生，对校外攻击不同政治思想的社会人士，什么出卖南大啦，某党走卒啦，进而变本加厉，于去年大选期间，大学生满街乱跑，充当拉票人”，该联合会称“我们子女入大学，为的是受高深学问，并不是送入集中营受训”。¹⁵¹

《南洋商报》的一篇署名为“求明”的读者来函是“为响应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而写”，题为“事情该是达到决定的时刻了”，称“南大的缺点是达到了‘百孔千疮’之地步”，“在南大，教授为保存饭碗，皆不敢批评校政。另一方面，教授与教授，勾心斗角，互为敌视。亲共学生利用学生会，故生事端”，而“一小撮不负责任的极端份子，盗用全体南大毕业生的名义，任意从事政治活动，以致成为一个对我国现实环境有不良影响的组织”，因此在此时，要求大马政府承认南大的学位，“何异是痴人梦话”。该文批评“目前的南大学生会及毕业同学会，皆系一丘之貉，都是受亲共份子所把持，而这般人，目的是控制南大，以作反政府的基地”。因此，该文呼吁“南大毕业生踊跃响应筹委会的签名运动”。¹⁵²

筹委会的批评和斗争，确实为毕业同学会带来相当被动的局面。筹委会代表甚至向社团注册官呈递控诉信，要求“对毕业同学会之活动及其地位之是否合法，立即予以调查”。¹⁵³ 虽然同学会秘书李锡楷指筹委会是“存心破坏南大，当他们还在求学的时候，便从事破坏学生会与学校的声誉的活动。其中有数位由于破坏学校的安宁学习环境与校规，而被学校当局记过大过”，李锡楷称“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校内制造混乱，分裂同学的团结，以便与校外破坏南大的势力相配合，来搞垮南大”。但是毕业同学会仍须承认该组织“有不妥”的地方。¹⁵⁴

该会称“会的章程和南大法稍有出入，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背景就是“南大法令在1959年通过后，各有关方面曾一度对此法令有所争执，盖当时政府有意修改之。这问题的争执为时颇久，一直到1962年方告一段落。我

¹⁵¹ 《南洋商报》，1964年2月24日。

¹⁵² 求明〈事情该是达到决定的时刻了〉，《南洋商报》，1964年3月6日。

¹⁵³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致社团注册官函，《南洋商报》，1964年2月25日。

¹⁵⁴ 南大毕业同学会秘书李锡楷谈话，《南洋商报星期刊》，1964年2月23日。

会乃依据南大法令成立于 1960 年，时正值南大法令发生争论，因此，章程与南大该法令有些不符，是可以理解的”。¹⁵⁵

因此，毕业同学会决定在 1964 年 2 月 26 日召开紧急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章程。修改包括同学会名称，定名为“南洋大学毕业生同学会”，加入了“生”字，会员资格修改为“凡南洋大学毕业生，皆为本会普通会员”，另一项修改则是“理事会主席由南洋大学在任校长担任之”。¹⁵⁶

毕业同学会虽然修改章程以符合南大法令，但是斗争显然还没有结束。根据筹委会一个月后所称的“注册官给南大副校长的公函，该南大毕业同学会已经被通知为非法，并被令停止一切活动”。¹⁵⁷

筹委会也面见了“庄竹林副校长，高德根、黄奕欢、傅文楷等理事以及各有关机构”，称他们都认为现有的南大毕业同学会“一来有违南洋大学法，藐视副校长的权威，二来盗用全体南大毕业生的名义，从事不法行为，使南大校誉与毕业同学都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他们也都支持我们认为南大毕业生同学会应当重新合法的组织”。¹⁵⁸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一共为这场有关毕业同学会合法与否的斗争“发表了十三篇声明”，¹⁵⁹ 到 1964 年 6 月暂时告一段落。筹委会在 6 月初的最后一篇声明中说，“南大理事会委托常务理事会，由副校长庄竹林、注册主任谢哲声以及傅文楷教授等人负责拟定章程来组织‘南大毕业生同学会’。依据章程草案规定：由理事会秘书谢哲声主持首届毕业生同学会执委选举，而选举日期则由同学会主席庄副校长指定”，因此，“李锡楷等少数极端份子的盗名妄作、偷天换日的手段”已经失败，原来“非法的组织已经灭亡，合法的将组织起来”，由于“章程已经拟就，有待南大理事会的批准”，选举新执委即将举行，因此筹委会的工作将“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不等于斗争已完全成功”。¹⁶⁰

筹委会后来演变成为在 1964 年成立的南大毕业生协会，“一些有正义感的毕业生毅然组织协会，在可能的范围内照顾毕业同学的利益，协助他们寻找

¹⁵⁵ 南大毕业同学会负责人谈话，《南洋商报》，1964 年 2 月 26 日。

¹⁵⁶ 《南洋商报》，1964 年 3 月 1 日。

¹⁵⁷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发言人谈话，《南洋商报》，1964 年 3 月 23 日。

¹⁵⁸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发表告毕业同学书>，《南洋商报》，1964 年 3 月 30 日。

¹⁵⁹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声明>，《南洋商报》，1964 年 6 月 6 日。

¹⁶⁰ 同上。

职业等”，另一方面，“通过协会引导同学们参与国家的建设工作”。¹⁶¹在 1964 年 12 月第一届理事成立时，毕业生协会的宗旨首先就定为“促进对马来西亚的效忠”。¹⁶²

在南大毕业生组织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南大校内另一场针对南大学生会的斗争也开始上演。1963 年 12 月 19 日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成立的南大学生联谊会，直接针对南大学生会展开批评，称其发起筹组就是因为“学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及支持某些政党的政治立场，把南大同学拖进政治的漩涡中，成为政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有必要澄清这给社会人士的误解”。学生联谊会实际上早在“1961 年年中筹组”，“由于生怕这孱弱的幼苗容易给学生会摧毁，故筹委们只得在暗中进行”。联谊会称其宗旨除了促进同学、教授及毕业同学间的联系外，“最重要的就是把一切的政党政治排出南大校门之外，还复南大原本是研究学术机构的真面目”。¹⁶³

该声明至少说明两点事实，一是早在 1961 年就开始筹组，正是行动党分裂、社阵开始另立山头的时候，学生联谊会的筹组可能受到时局的影响。二，联谊会的筹组一直在暗中进行，其中有成员毕业出去，有新学生加入，其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学生会不断发表支持某些政党的言论，显示 1963 年的大选及政党间的尖锐对立是联谊会加快筹组继而公开活动的导火线，其暗中活动的性质也容易引起外界的疑问。

就有传言称联谊会“曾经接受过马华公会及人民行动党的经费资助”，“学生会的‘激进份子’更指联谊会隶属于马华的，或行动党的”。¹⁶⁴这些都遭到联谊会的否认。

令人费解的是，一周之后，南大学生会联谊会筹委会再次发表声明，称上周以“南大学生联谊会筹委会”发出的声明并不是由他们发出，而是“由不负责任、别有居心的同学发出，我们相信这是另有阴谋的行动”。¹⁶⁵但是并没有指出前份声明有何不妥或谬误之处，显示前份声明的部分内容可能反而会为联谊会带来被动或背后存在联谊会领导层的权力争夺。

¹⁶¹ 南大毕业生协会顾问及发起人庄日昆献词，《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成立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1964-1987）。

¹⁶² 《南洋商报》，1964 年 12 月 4 日。

¹⁶³ <南大学生联谊会告同学及社会人士书>，《南洋商报》，1964 年 2 月 25 日。

¹⁶⁴ 同上。

¹⁶⁵ <南大学生联谊会筹委会书面声明>，《南洋商报》，1964 年 3 月 3 日。

比较前份声明与后来联谊会发表的宣言，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公开以学生会为斗争的对象。声明公开声称成立就是因为学生会将南大学生卷入政治漩涡，宣言则委婉地批评亲共和反国家份子，并未直接与学生会联系起来，彰显前后斗争策略的改变。

宣言欢迎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意识的同学参加，但是“如果那些崇尚暴力的亲共的反国家份子想利用这点来夺取我们的会，那无异是幻想，因为我们的章程会防止他们渗透进来”。联谊会也“强烈谴责那些横行于南大的亲共反国家份子暴力组织‘百人突击队’殴打政治见解不同的同学，反国家份子把全校课室强蛮地霸占起来，不让同学上课，组织贝利亚式的秘密警察封锁全校交通要道，非法地检查路过的同学”。而在大选期间，“明目张胆地每天租借几十辆巴士和罗厘（卡车）侵入南大校园，运载一些受欺骗的同学到坡底替某一政党拉票和宣传，破坏南大学生的名誉和南大校誉，使南大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打滚，给南大同学带来莫大的损失”。¹⁶⁶

联谊会的宣言强调忠于马来西亚的国家意识，也是针对南大学生会的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的立场。宣言“认为马来西亚已不是个政治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谁反对马来西亚，谁就是反叛国家，反叛人民，就是对自己的祖国不效忠而听命于外国的卖国贼，我们谴责校内那些亲共反马来西亚的反国家份子，他们一方面高唱‘把青春献给祖国’，一方面高喊‘反对马来西亚’”，宣言质问“反国家份子”：既然你们要反对马来西亚，不认马来西亚是你们的祖国，那么你们的青春到底是献给哪一个‘祖国’？是北京、莫斯科或椰卡达（雅加达）？”

对与政府的关系，联谊会在宣言中表示，“将以实际行动争取新加坡政府和联邦中央政府的信任，即相信南大绝大多数的学生是效忠马来西亚的，而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国家份子，再进一步争取他们承认我们的学位。我们将与两地的民选政府保持良好关系”。¹⁶⁷

南大学生联谊会的筹组与成立，与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对毕业同学会的冲击一样，对南大学生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影响。南大学生会执委1964年的改选就由五月左右提前到三月，“提名日期在提名前夕才不很明显

¹⁶⁶〈南大学生联谊会宣言〉，《南洋商报》，1964年3月3日。

¹⁶⁷〈南大学生联谊会宣言〉，《南洋商报》，1964年3月3日。

地公布出来”，原因就在于“学生联谊会于今年初成立，可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活动，一些同学还不了解联谊会的真相，于是，学生会乘此时机，来个闪电行动，将学生会执委选举提早举行”。¹⁶⁸

为影响执委选举，也有南大学生在报章上制造对联谊会有利的言论，称“学生会实际上是滥用学术自由权力，做一些与学术无关的活动。因此，社会人士对南大失去信心，政府亦敬而远之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有正义感的学生为了南大学生的前途不能再继续毁在别有居心的学生会手里，于是起来组织学生联谊会”，¹⁶⁹ 而今年学生会执委会候选人名单中，“有学生会的继承人，亦有学生联谊会的代表”，显然双方将有一场争夺学生会和学生代表话语权的斗争。

而对这次南大学生会执委的改选，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在三个月后发表的《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中也专门谈及：“1964年3月20日，当南大学生会选举的时候，如何进行选举的方法在当天早上宣布，而对各出席位的最后分配及每个候选人的号码，也只在那个时候才给大家知道。属于亲共集团的份子则早已知道他们所要选出的候选人的名字及号码，反对派只有很短时间来拟定计划并宣布候选人的姓名，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步骤来监视选举的进行而所投的票也并不代为守密，亲共集团可把所要选的候选人姓名告诉他们的门徒们。因为那四十七候选人的名单早已分派给那班亲共的门徒们。他们的集体选票可确保能够得到所预期的足够席位。在1963年只有八十九巴仙人数参加的投票结果，他们那班候选人得1100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却只得800票，虽然亲共集团得不及六十巴仙的票数，而反对派得到四十巴仙的票数，但所有的席位却被亲共集团占有了”。

根据中央政府的白皮书，南大学生会是被共产党所操纵的组织，“当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进入南大的时候，他们立刻开始创立一个学生会”，“当政府在1956年9月间封闭‘中学联’的时候，控制南大学生会乃为他们更重要的任务。虽然受到中立派学生的反对，但他们总不放手地控制那个学生会”。而选举就是共产党用来排除异己、控制学

¹⁶⁸ 南大一学生<重视南大学生会的选举>，《南洋商报》，1964年3月20日。

¹⁶⁹ 同上。

生会的手段。1960-1961 年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四十七个席位中，“二十三个共产党或亲共份子被选为委员”。¹⁷⁰

控制社会组织或具代表性、行业性的组织，对于影响社会舆论、左右民间情绪的作用显而易见。无论是政府、南大毕业生或是其他社会及政治力量，都希望获得组织的控制权，以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各方也围绕此进行多方面的角力。南大毕业同学会就批评筹委会成立的目的“无非是要破坏毕业同学会，以便在将来发表一些不利于南大的言论”。¹⁷¹ 南大学生联谊会针对南大学生会、筹委会针对毕业同学会都是这种角力的结果，并且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筹委会是针对同学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进而批评其为非法组织，要从根本上取而代之，摧垮同学会的基础和发言空间。学生联谊会则是由于无法渗透至南大学生会或是无法控制学生会，因此另立山头、发出不同声音以分庭抗礼，在南大学生内部形成不同的力量集团。

南大学生会与毕业同学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学生会可说是同学会在校园内维持影响力的管道，同学会则是学生会力量在社会上的延续。同学会的领导成员很多就是原来南大学生会的领袖人物。以参加 1963 年大选社阵候选人的 10 名南大毕业生来说，根据本论文的统计，直接在学生会参与工作的候选人有 7 人，在毕业同学会担任领导职位的也是 7 人，同时曾在学生会和同学会担任过职务的则有 6 人，分别为谢醒民、谢太宝、梁关飞、王发祥、林健生、林焕文。

修改章程后改名的南大毕业生同学会针对筹委会和学生联谊会的成立批评道，“要孤立南大董事，就得先毁掉坚决支持董事保卫南大的毕业生同学会和学生会。这样还不够，他们在进行破坏毕业生同学会和学生会的同时，还会组织类似的组织以作为他们破坏南大的应声虫，而在时机到来的时候，这些应声虫便会被利用来发表声明或通过其他行动支持他们改组或破坏南大的计划，从而在广大的社会人士间制造一种假象：南大董事是孤立无理的，因为南大的毕业生和学生都支持他们的改组（实际上是破坏）南大的计划，

¹⁷⁰ 《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1964 年 6 月。

¹⁷¹ 南大毕业同学会秘书李锡楷谈话，《南洋商报星期刊》，1964 年 2 月 23 日。

这是多么阴险可恶的阴谋啊！”而筹委会这批人“破坏同学会的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是和前述企图改组南大的阴谋分不开的”。¹⁷²

南大学生会也就此批评，称“政府还极力通过其代理人在校内，筹组分裂性组织，来颠覆代表校内学生最高组织的学生会和校外毕业同学代表组织——南大毕业同学会。在这过程中发表危言耸听、不利南大的言论。这些分裂组织是：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南大学生联谊会、南大毕业生协会。真是从事颠覆活动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¹⁷³

无论是哪种方式，无论背后是否有政党力量的支持，甚至行动党政府的支持，前后相隔不久出现的筹委会和学生联谊会客观上都有效地削弱了南大毕业同学会和南大学生会的力量和影响力，筹委会在批评同学会被极端份子“为政治目的把持校政寻事生非”时，就称“南大不但没有为华文教育在建国任务中放出璀璨的光彩，反而成为民选政府的一个忧虑”，¹⁷⁴ 这些都有利于行动党政府解决南大问题。

¹⁷²南大毕业生同学会致南大理事会函件，1964年4月2日。

¹⁷³ 南洋大学学生会《政府控制南大的真相》，油印复印件，1964年7月9日。

¹⁷⁴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发表告毕业同学书>，《南洋商报》，1964年3月30日。

第四节 南大学生政治力量的彻底清除

在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南大学生会、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经常发表意见，影响舆论、谈判进度及结果。李光耀 1963 年 12 月曾在立法议院评论南大学生会对谈判的意见，称“几天前，受共产党控制的南大学生会曾发声明说，大学理事会应停止和政府磋商拨款援助及改组事宜，除非是无条件的财政援助，否则应予以拒绝”。李光耀认为，“我们必须巧妙地、敏感地处理问题。不过，最终必须找出事实，那些情况是，有一批来自华文中学的活跃的华族共产党人利用着一些百万商人的利己主义，自称可以达致荣誉，从而建立了他们对南大的控制”。¹⁷⁵

南大学生的政治力量成为政府与南大理事会达成协议的阻碍，但如前节所述，随着政治活动活跃、积极参与校政和社会事务的南大毕业同学会和南大学生会力量的削弱、合法地位的怀疑，为南大联络委员会的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在 1964 年 6 月达成协议制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最终大规模地将学生政治力量从南大校园里清除，已是势在必行的选择。

南大学生会就谈判问题不断批评政府，应该不出新加坡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意料。但新加坡和中央政府筹划已久的强硬大逮捕行动，南大学生会却没有什么准备。

对政府与南大理事会的协议，南大学生会曾批评政府“巧妙地推卸了它资助和承认南大学位的责任”，对政府再次使用魏雅聆报告书作为南大改善的蓝本，使用“颠覆活动”等字眼，认为“将可能对南大不利”。¹⁷⁶

很快地，中央政府开始对南大校园内的“颠覆活动”采取行动，并同时发布《南洋大学内的共产主义》白皮书，显示这次逮捕行动筹划已久。1964 年 6 月 27 日凌晨三时，“为击破共产份子对南大的控制和恢复南大理事会的教职员的职权”，¹⁷⁷ 中央政府在南洋大学展开行动，拘捕了 41 名南大学生。¹⁷⁸ 内政部长伊斯迈指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文教育经常成为激

¹⁷⁵ 李光耀在立法议院的演说，*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3 年 12 月 10 日。

¹⁷⁶ 社会主义阵线机关报《阵线报》，1964 年 6 月 20 日，第 70 期，第二版。

¹⁷⁷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文告全文，*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周刊，1964 年 6 月 28 日。

¹⁷⁸ 南洋大学学生会的统计是 49 名学生，还有两名南大职工也被捕，共 51 人。《南洋商报》，1964 年 6 月 28 日。

发大部分华人情绪的因素。围绕着这个焦点而产生及发展了其他较重大的政治问题。马来亚共产党是技巧地利用了华人对此问题的沙文主义情绪来吸收并影响一大批华校中学生追随其共产政策。就是通过这种反对所谓‘政府消灭华文教育’的号召，共产党因而能够动员了大批华人来支持其统一战线并攻击政府，以便推进其夺取政权的目的”。¹⁷⁹

大逮捕之后，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所发布的文告，与《南洋大学内的共产主义》白皮书，是中央政府首次系统地阐述南洋大学内的政治运动、政治势力以及与华人社会关系、与马来亚共产党关系、对新加坡及中央政府的影响等重要课题。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如何看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来亚的形势，也体现出中央政府如何看待南洋大学问题以及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和角色。因此，对于了解南洋大学与政府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伊斯迈在文告中阐述了共产党对华校及南洋大学的渗透，称由于“对马来亚共产党来说，马来亚的独立以及马来西亚的成立已使到他们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策略皆告失败”，南大对共产主义有着特殊的地位，“虽然共产主义对华校中学生的影响已减少，但一些零星的共产主义追随者依然存在着。他们逐渐地退守着，直到马来西亚成立后南洋大学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守卫站。他们希望从这最后的堡垒中，利用华文教育问题并配合工业行动的支持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行动，企图推翻中央和新加坡政府”。

1963年9月和10月，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都对南洋大学内的学生采取了逮捕行动，但中央政府认为“当时保安行动并没有彻底执行”，因为“亲共学生采取了完密的反措施，当时，警方如要彻底地执行其保安计划，就不可避免地会与集合的学生们作正面的冲突而导致严重的损伤”，结果是“共产主义的死硬支持者仍然留在南洋大学里。他们接管了大学行政机构、食堂、福利委员会以及各种学生组织，甚至在毕业同学会中所有的重要职位”。

按照中央政府的指责，南洋大学内可说处处是共产主义份子和他们的支持者，而且势力强大，南大当局都被迫屈服，“共产势力如此全面和无情地

¹⁷⁹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文告全文，*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星期刊》，1964年6月28日。

操纵了大学里各种机构，甚至大学理事会当局及教职员也被威胁来协助他们来压制不符合共产主义计划的活动。还有在学术自由及学生权利的掩饰下，大学里的共产份子曾利用各种学生机构来对校外的共产主义份子作公开的支持。南大校内的共产份子在对抗印尼的对抗政策问题上以及在反抗国民登记及人力动员的问题上与校外的政治团体采取一致的立场，已达到了严重与危险的程度”。¹⁸⁰

政府对南大被共产主义势力控制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新加坡州政府和中央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些问题是由一些共产党干部制造出来的。他们控制了南洋大学和挫折一切欲将南大培养成为一个学术中心的努力。那些追求学术研究的安分守己学生是远较共产份子为多，但是他们被阻止去追求正当的学业和活动。由于这班共产份子的干涉及恐吓，使到校内学术研究及教导受到为难甚至阻碍。结果学术程度被损害了，因为一般的学生被这班利用南洋大学以遂其阴谋之共产主义煽动者所困扰。中央政府对这治安问题是十分关注的，因为大约一半的学生是来自马来半岛，另一半是来自新加坡以及约170名是来自沙巴和沙劳越。南洋大学是马来西亚境内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如果共产份子实际上控制了南大，它便成为一种危险的武器，并可被利用来毁灭本国，特别是动员学生来支持印尼的对抗马来西亚。共产份子可以也必会利用这种工具来引起马来西亚国内的种族冲突和纷乱，特别是目前当我们的邻邦正在大力地利用我国种族间的不同利益来粉碎我们”。¹⁸¹

中央政府提出了解决南大问题的办法，“南大问题只能通过教育改良和治安行动来解决。只在最近的期间，新加坡州政府曾完成和南大联络委员会的谈判以便能建立一个正当的有各种完善设备的大学，而且能恢复教职员们和南大理事会的应有职权”。

“中央政府明了在南大校内和校外的共产份子看到新加坡州政府和南大当局达到协定时感到惶恐。对于他们来说，协定的内容是严重地威胁到他们控制南大内政。这意味着结束他们长期来对南大及学生的威吓和利用以及对华人群体的欺骗。华人对南大的设立曾有帮助，故他们对南大是抱有极大的

¹⁸⁰同上。

¹⁸¹同上。

期望。只要这些主要的共产支持者留在校内暗中威吓和阻碍校方与学生，颠覆阴谋和治安问题将继续在南大发生，永无终止”。

政府希望借助大逮捕行动清除南大校园内的政治力量，“当局认为需要逮捕四十一名学生领袖和煽动份子。执行这种步骤是为了击破共产份子对南大的控制和恢复南大理事会和教职员的职权，这治安行动对学生学业生活只有微少影响，因为学生已有完成他们的学期考试和正在回家渡假。我希望南大理事会将能作一新的开始，建立一个真正能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府，来训练一批青年来从事对马来西亚有建设性的建国工作”。

虽然采取了强硬措施，但对南洋大学的地位问题，中央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承诺，“政府现在已对南洋大学里的共产份子采取了行动，我希望州政府以及南大当局能确保学生团体此后将不再受共产份子所渗透。如此一来，南大将能在自由学术气氛里发挥它的主要效能，造就学术水准高深的毕业生，使他们能在马来西亚社会中占据他们应有的地位。这样，政府将较容易对南大的地位和本国其他大学的关系作一适当的考虑”。¹⁸²

在中央政府同时发布的《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中，详细地分成“截至 1956 年为止之期间内共产党如何利用华文教育及中国之文化经过”、“南洋大学：新的机会”、“南洋大学学生会”、“国际联系”、“砂劳越学生与共产秘密组织的联系”、“反对合并”、“毕业同学会”等章节，从历史渊源、外部环境、内部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活动等方面详细论述南洋大学内存在的共产主义活动或影响。

白皮书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南大如何“缺乏有效率的领导层”，以及行政上的缺点，致使受共党支配的南大学生会，恐吓或者威胁大学当局容忍或者甚至于支持那种加强他们对于南大学生们的组织把握的步骤。例如，白皮书中曾说明大学理事会及毕业同学会，如何粉碎商学院中的非共党学生击破亲共学生控制南大学生会的企图。商学院学生，不仅受到除名的威胁，而且陈六使先生被说服，对于这些非共党学生，称之为“英国特务”。

白皮书分析南洋大学内“由于缺乏计划、原则，或传统及不规则的行政措施，兼以教职员因长期受到放在他们头上的‘一年合同’与‘一年居留准证’的利剑威胁，士气低沉，是以那批坚决献身共产主义服务的干部及那些

¹⁸² 同上。

曾有 1948 年至 1955 年间华文中学之动乱及煽动经验的人们，就乘虚向南大大肆袭击”，而“委派一个前曾受共产党威吓过的中学校长为南大副校长，是完成了促使南大学生团体受到严重的共产党影响之行动”。¹⁸³

白皮书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南大成为传授华文高等教育的学府这方面，是不会有很大关切心的，他们所最关切的，就是藉此俾于马来亚中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他们的目的是使南大变成他们的大本营，以便：甲：为马共招募干部，并灌输共产主义到他们的脑里去；乙：散布亲共宣传到全马来西亚各华校去；丙：与国际共产学生团体及在其他国家里性质相同的团体建立联系；丁：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以助处理一切被反国家的亲共势力认为对其有利而足以利用的“反对马来西亚的创立及反对马来西亚式的团体生活”的公开问题。¹⁸⁴

白皮书中列举证据，指出南大的亲共学生履行此项目标的活动，而南大学生会就是大本营。从学生会一创立，就受到共产势力的渗透，“当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进入南大的时候，他们立即开始创立一个学生会”，“当政府在 1956 年 9 月间封闭‘中学联’的时候，控制南大学生会乃为他们更重要的任务”。

南大学生会曾在 1963 年 11 月间号召学生在假期留在学校为大学周进行筹备工作。中央政府认为此举真正目的是“要把一支学生队伍留在学校，如果政府要在假期内改组南大，他们就可出面抗拒。同时也可以把他们集合起来，训练他们怎样进行共产党方式的斗争，并把共产党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学生会安排活动的程序有迹可循，采用“时事测验”的科目，也是“共产党认为足以提高学生思想认识、支持共产主义的屡试屡验的方法”。

¹⁸⁵

白皮书也指责南大学生会与国际学生组织的联系网络，“对共产党来说，南大学生会是对国内外的亲共学生团体，提供一个有效和可辩护的公开联系。它是附属国际学生会的共产党外围学生组织，对国际学生会坦然地给予支持。1958 年在哥伦坡召开国际学联秘书处会议，南大学生会最先派代

¹⁸³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Govt Print Office, 1964), 《南洋大学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吉隆坡：政府出版局，1964）。

¹⁸⁴ 同上。

¹⁸⁵ 同上。

表参加。在会上，南大代表说南大学生会认为‘今日在马来亚唯一的民族政党，就是马来亚共产党’”。

同样重要的，就是“南大学生会和印尼维持密切与不断的接触，特别是和共产党支配的全国印尼学生联合会”。白皮书追述南大学生会，如何联合那些受到他们控制的其他南大学生团体跟南大毕业同学会以及社阵一起，参加共党及印尼鼓动的反合并和反大马行动。安顺补选、社阵战胜行动党后，“学生领袖们都在假期中留在南大，讨论他们将来的反对大马计划”，白皮书说，“为使他们公开反对大马的行动达到最高潮，南大学生会就在举行新加坡选举期间支持社阵，虽然他们也可以引用陈六使先生所用的藉口说他们只不过通过南大毕业同学会的机构来帮助南大毕业生获选。但该学生会的受薪秘书则在南大毕业同学会的竞选总部里，整天工作。南大学生会的领袖和五六百名南大学生，则在为期九天之竞选运动中协助竞选”，而“南大学生会则捐助了五千元作为候选人的竞选费用”。

白皮书也披露了关于通过砂劳越学生，南大共党和砂劳越共党发生联系的情况。它指“在南大的砂劳越学生中之共产分子，差不多是全部来自砂劳越的共产党秘密组织。这批来自砂劳越的共产党秘密组织份子，在 1960 年 4 月就与在新加坡及马来亚的共产党小组建立了联系”，他们成功地渗透入南大砂、汶、沙三邦同学会，而且他们之中很多是南大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白皮书举出来自砂劳越极为活跃的学生领袖之一的王昭美为例，称她“原是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而且是 1959 年罢课时的一个极为活跃的份子。1959 年她报名加入南大，她是南大学生会砂、汶、沙同学会、南大合唱团及南大中文学会的会员。她是砂劳越共产党秘密组织的老会员，而且是该组织的南大的小组组长”。

白皮书指出，关于南大学生会学生领袖们的明显共产主义倾向的证据，可以从南大学生会以及此大学其他的亲共学生团体所刊发的刊物中引证出来。1962 年由史地学会刊发的《马来亚民族运动简史》小册子“颂扬马来亚共产党”，“声称以前所有反殖斗争中的成就应归功于马来亚共产党，并断言马共有权夺取政权，完成他们所发动的革命。马共暴徒则被誉为‘光荣的民族解放军’。凡反对他们的，不是封建、反动，便是殖民主义”。这篇简史从马共在 1959 年 1 月 25 日发表的声明中，赞同地引录了一句：“马来亚

的斗争乃是国际民主和平运动的一环。在此运动中，马来亚的人民将与全世界的进步国家站在一起”。

白皮书指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被称为由大部分中国人所组成的军队”，批评马共消耗了马来亚的财富，为人民带来痛苦。而该书“为了辩护说马共的政策是正当的，他们引述了许多从各国的亲共机构（如殖民地自由运动，中国和平委员会以及马来亚劳工党）得来了对他们有利的言论”。该书的编后记把该书描述为“人民英勇反殖斗争的史实”，其编撰之用意则说是：“希望能实现（结合祖国的需要，进行史地科学研究）的目标”，很明显，该书出版之目的，“是企图歪曲事实，断章取义，使读者对那本颂扬马共的简史有另一种的看法，且认为马共所扮演的角色是要争取民族独立。这是滥用学术自由以遂其政治颠覆企图的明证”。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这些亲共份子控制了所有以南大名义出版的刊物，并刊载一些文章，作为灌输其思想的资料”。这些文章在论题上或论据上“不但没有学术的价值，且循共产的路线讨论目前的政治问题。这些刊物被用来转载来自共产中国的文章，以供读者作为学习的资料，并为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传达他们所应遵循的政策。这些刊物的销路极广，其销数远超过南大学生的人数。因它也可以充作共产党供给工运者、文化工作者和马婆农民的读物”。

白皮书接着详细分析南大学生的一些出版物，如《南大论坛》（南大学生会）、《社会知识》（社会科学研究会）、《政治学报》（政治学会）。

《南大论坛》曾因“对联合邦的青年和学生所采取的传播共产主义的方式而被禁止于马来亚联合邦销售”，《社会知识》“从来没有出版过有学术研究性的文章”，而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另一机关报”。《政治学报》则是“奴颜婢膝地遵循共党统一战线的路线”，在1961年3月出版的第六期，载有一篇由一个马共地下工作者写来的文章，题为《求同存异的新精神》，第七期有文章支持林清祥先生对政府的要求，以作为他支持安顺区补选的代表。第九期到第十三期刊载反全民投票的宣传文章。¹⁸⁶

¹⁸⁶ 同上。

这些刊物“都积极跟随共产党人和印尼的路线，猛烈攻击马来西亚。例如《社会知识》拒绝接受全民投票的结果，同时还重复共产党人的恐吓：“要是他们不能和平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将被迫采取暴力行动”。

在揭露南大学生会与共产力量的紧密关系后，白皮书专门有一章节叙述南大毕业同学会的活动。“正如学生会是从中学联产生出来的一样，南大毕业同学会是由南大学生会产生出来的”，毕业同学会之所以成立，正是“1959年由南大毕业出来的共产党活动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结果，“作为他们的适当掩护，并通过南大毕业的教师与南大校友来继续他们如何影响各校的工作”。除指出并具体叙述同学会执委会选举的“被操纵”之外，白皮书称“毕业同学会与南大学生会内的共产集团同心合力，在校内外协助统一战线向公众人士进行有政治性的煽动。它支持南大学生会向商学会复仇。结果在1961年有六个学生被大学当局开除。它也支持南大学生会对改良华文中学校考试制度所作的煽动及南大当局对付政府改组南大政策所采取的拖延手段”。

对新马合并的课题，同学会也“劝诱并恐吓”参加一个中华总商会所办的“合并座谈会”的社团代表“协力煽动反对合并”。他们还“企图组织自己的群众大会来继续进行其座谈会以便从中操纵”，并向另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星洲乡村住民联合会求助”。在六月，毕业同学会发表一项声明，“攻击全民投票法案，说它是向民主作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白皮书指出，在1962年10月间，同学会认为不可仰望华文教师总会及中华总商会来支持它所拟展开的运动，而提出一项反对政府华校政策运动，并展开“火炬运动”，依照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典型方式，由毕业同学会发动，参与者包括南大学生会及受共产党控制的乡村住民联合会和乡村人民联合会。在该运动的组织委员会内，南大学生会的代表占了半数以上的席位，而“该运动是依照共产党的方式来计划的”。¹⁸⁷

中央政府认为，毕业同学会的活动一向都含有政治色彩。因此当社阵作其1963年的大选计划并决定从南大招募八名候选人时，他们就得向该同学会求助，并求陈六使先生资助竞选经费及赞成南大的几个毕业生出任候选人。“现在逃避警方逮捕的蓝炽理，亦曾通过该同学会力劝陈六使为支持社阵的

¹⁸⁷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南洋大学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

政治纲领发表谈话，但陈六使不表赞同。在大选的时候，该同学会的会所被用为社阵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的竞选总部”。

中央政府的白皮书将中学联、南大学生会、南大毕业同学会进行系统的联系和比较，认为“很明显地看出，他们从前在中学联活动所采取的政策、领导策略与技巧，都很有系统地被移用在南大学生会及南大毕业同学会的一切活动上。他们反对马来亚殖民政府的力量与方法，也同样地被引用来反对马来西亚”。政府指“这一领导层是受马共地下工作人员所控制，他们利用华文教育问题的目的，不外是要破坏马来亚政府的声誉，并在华校进行煽动工作，以破坏其教育地位，并使这些学校的学生，于学术上不能有什么成就，这属于政治性的企图，无非力求保持他们的政治势力，操纵这些非政治团体，且利用他们来做掩护，以便实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策略，而达到夺取政权的最终目的”。

中央政府指亲共力量“利用了南大的懦弱无能的领导，及其行政上的缺点，便成了南大教育方针及学校行政的主持人，甚至有权委任及管理全体教职员。因此，他们便抗拒任何足以改良及提高南大学术地位与学位价值的企图”。

换言之，南大当局也需要为共产党势力的渗透负上主要责任，这也是后来“曾屈服于共党恐吓的前任中学校长”、南大副校长庄竹林必须离开的主要原因。

白皮书也指出，“自从该大学成立后，亲共学生就已把自己当成或被允许成为南大的‘有效的主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反对任何为提高该大学学术水准及它所颁予的学位的改组行动”。大学的改组，以使它成为一纯粹的学术机构，将等于是共产党人将终止为“有效的主人”，这也将等于南大将不再是“马共进行吸收及培养干部的场所”。¹⁸⁸

白皮书也分析现在让亲共份子成为南大“有效的主人”的危险性，这些亲共学生“现在反对马来西亚民族政府的形式和方法，就跟他们过去反对马来西亚殖民地政治的方法一模一样”¹⁸⁹。

¹⁸⁸ 同上。

¹⁸⁹ 同上。

中央政府内政部长文告和白皮书的发布，将南洋大学与马来亚共产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南洋大学内的学生运动加以定性，从政治上摧毁了南大校园内学生力量的合法性。大逮捕是从学生力量上进行打击和削弱，而白皮书和文告则是从政治性质上将学生运动与反国家、颠覆政府紧密挂钩，对于限制和控制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争取社会舆论同情或支持十分有效。

虽然南大学生会采取抗争手段，并不断发表告社会人士的声明，指责“政府是经过严密的布置，将南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¹⁹⁰ “在这次公开抢夺南大的勾当中，行动党政府充当师爷，设计献计，与中央联盟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进攻南大”，¹⁹¹ 但是对整体社会舆论和政治气候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在逮捕事件发生后，南大教务会议决议就表示，“大学应以纯学术立场，此为本校一贯之宗旨。不幸过去有少数学生在校外参加政治活动，管理方面不免发生困难。今后自应加强教导，并望全体学生共体斯旨，专心向学”。¹⁹² 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也针对南大学生被捕事件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对陷于苦恼中的南大学生会深表同情”，但“中央政府与新加坡州政府指共产党利用南大，特别是利用南大学生会，本会在考虑此项指责之严重性后，认为中央政府与州政府有维持法律与秩序之责任，并应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人民之一般福利与进展”。¹⁹³

在中央政府的大逮捕和白皮书发表之后，新加坡政府在南大问题上取得有利的政治地位和话语优势，发表文告称“新加坡政府同意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安全步骤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有此需要。它丝毫没有干预到南洋大学的华文教育。由于这些共党分子在南大的大学理事会、行政部、宿舍部、食堂部及学生组织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南大已被利用作为训练共产党干部的场所”。¹⁹⁴

新加坡政府要求南大理事会和南大代表大会应该表明“反对南大任由共产党利用”，但是对陈六使即将在南大理事会会议之前召集的南大代表大会

¹⁹⁰ 南洋大学学生会《政府控制南大的真相》，油印复印件，1964年7月9日。

¹⁹¹ 南洋大学学生会《南大学生会就逮捕及开除事件告同胞书》，油印复印件，1964年7月19日。

¹⁹²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4年6月28日。

¹⁹³ 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4年6月29日。

¹⁹⁴ 新加坡政府文告全文，《南洋商报星期刊》，1964年6月28日。

保持高度的警惕，认为明显要影响南大理事会是否实行与政府达成协议。新加坡政府指“目前共产党人希望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学生会，向南大代表大会与南大理事会某些成员施以压力，使南大理事会的联络委员会与政府已经签定的协议，无法得以实施”。

新加坡政府警告南大代表大会和南大理事会谨慎行事，“这一次极可能是重整南大，使它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的最后一个机会”。同时允诺如果南大代表大会和南大理事会决心承认并保证实现与政府的协议，制止大学内一切共产党与颠覆活动，“新加坡政府准备为南大的改组与复兴工作付出一切所需力量与支持”。因此，“目前南大的前途完全掌握在负责南大要务的人士手中”。¹⁹⁵

其后政府开始进一步对南大校园内的“亲共势力”采取强硬措施，建立“安定的学习环境”，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南大教师就召开大会支持理事会与政府协议之原则，进行改革校政，及全力整饬大学风纪的决定。

在政府的压力下，南洋大学副校长庄竹林只有辞职。教育部长王邦文也开始直接介入南大的校政问题，并对庄竹林辞职事件施压，希望尽速完成。南大学生会则指“行动党李炯才曾通过南大二名重要理事，转达庄副校长，意谓庄氏倘不辞职，将采取行动对付之”。¹⁹⁶ 1964年7月7日，王邦文与南大联络委员会各委员举行两小时的会议，提出“有关当局应于目前采取必要步骤，以确保南大之共党及颠覆份子的势力，不致妨碍该项协议之实施，使南洋大学能成为一间纯学术性的学府”，对于庄竹林，“明显地，庄博士将无法恢复学生们的纪律，亦无法消除共党势力”，庄竹林提出辞职后，教育部长向南大联络委员会建议，在委任适当而合格的副校长之前，应由三院院长组成一临时委员会，负责大学行政工作，政府也将派一名代表加入委员会。¹⁹⁷

新加坡政府指责南大联络委员会中“有人在暗中活动，以阻止此项协议付诸实施”，由于对政府设立临时委员会的建议，联络委员会中只有刘玉水一人反对，认为他本人和五人联络委员会没有接受副校长辞呈和委任临时委

¹⁹⁵ 同上。

¹⁹⁶ 南洋大学学生会《政府控制南大的真相》，油印复印件，1964年7月9日。

¹⁹⁷ 新加坡政府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4年7月8日。

员会的权力。因此，政府所指责的对象非常明显，在要求次日就召开南大理事会、接受庄竹林辞呈时，政府还认为应该向公众人士表明：“陈六使虽已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之职，但他仍能运用相当的影响力，使此项有关清除南大共党及颠覆势力之协议不得付诸实施。刘玉水似乎亟欲挽留副校长庄竹林博士，因为他对于共党分子以及南大发起人都有用处”。¹⁹⁸

刘玉水还曾反对在南大大逮捕行动之后，由南大联络委员会发表声明，认为南大应该成为纯学术性学府，不受共党及颠覆份子的影响。虽然其他四名委员高德根、陈锡九、陈期岳和黄奕欢都同意，但最终这项声明未能发表。¹⁹⁹

新加坡政府为确保协议得以执行，就要清除一切障碍。在 7 月 8 日南大理事会接受庄竹林的辞职、即日生效后，南大理事会副主席、代主席刘玉水在主持理事会会议结束后，宣布辞去在南大的所有职务，退出南大舞台。

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被迫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之后，曾尝试保留其在南大的影响力，在 1964 年南大与政府谈判达成协议后，陈六使以南大各地委员会主席身份召集南大各州委员会特别代表大会，并提名五名以社会贤达资格任南大理事的人选，其中包括陈六使自己。结果政府发表文告，表示“注意到尚有某些人物还是恋栈着他们在南大和南大理事会中的职位。这些人物在中央政府的白皮书内已被暗示，有的甚至被指名道出，系曾协助和怂恿共产党与颠覆份子在南大进行颠覆活动。如果这些人敢于干预协议的执行，使南大不能摆脱共产党及颠覆份子的影响，那么他们必须对他们此种行动负起一切后果”。²⁰⁰ 一周之后，陈六使宣布辞去南大理事会理事一职，与他同时辞职的还包括另一位理事李俊承。²⁰¹

7 月，一批南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另有图书馆和餐厅等部门的 55 名职工被解聘。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曾通知新加坡政府，南大如要有新的开始，则某些人士应加以清除。这些应清除的人士，包括舍监人员、餐厅工作人员以及白皮书中所说的曾为南大共党份子助手的行政方面与书记工作人员”，新

¹⁹⁸ 同上。

¹⁹⁹ 同上。

²⁰⁰ 新加坡政府文告，《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7 日。

²⁰¹ 《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23 日。

加坡教育部长也指出，“在南大学生中，凡欲妨碍上述协议之履行，不使南大成为纯学术性学府者，当局必将采取行动，将他们逐出该校”。²⁰²

其后，教育部长王邦文在与南大教师会九人筹委会会面时，提到“此次改善南大的措施，是为了适应马来西亚国家社会的迫切需求，使这一间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最高学术机关，在彻底改善后，更加能够担负起为国家作育英才的大责任，也使华文教育更有机会可以发扬光大”，而要使南大彻底改善，“最基本的前提是必须彻底清除在南大中的亲共反国家分子，绝对不容许他们继续利用南大进行亲共反国家的政治宣传与破坏活动，改善的程序必须先建立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务使南大同学能够安心求学，然后才谈得上提高学术水准的问题。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校务工作是执行严明的纪律，树立良好的校风”。

对于开除和警告一大批南大学生，王邦文也向教师代表表示，“深切了解南大教师们过去在教学上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过去那些亲共反国家分子根本无心向学，他们只是热中于政治宣传与活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各位教师也经常受到他们的种种活动所骚扰，无法安心教学。至于不遵守校规，不尊重师长，不听从劝导，甚且强行要求分数，要求升班，这意想不到的不合理现象，也经常在南大发生，改善之后，当然不能容许这些丑态重演”。

203

政府整饬南大校风、清除亲共分子的举措，获得了南大毕业生协会筹委会的舆论支持。筹委会发表长篇声明，指责南大内的亲共势力使南大“在献身祖国的模糊口号中变成了党的干部训练所，我们在南大四年亲眼看到负有使命的少数职业学生干那‘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筹委会指最让社会人士忍无可忍的是在1963年新加坡大选中，这些“不学无术的职业学生居然把各阶层人士所创办的南大搞成了某个极权政党的竞选活动中心”。因此，筹委会认为“南大校内最近一连串的肃清行动是实必要的，假如过去没有这批受指使的学生在校内从事破坏与阻挠歪曲的工作，假如这些极权的学生会控制头子肯稍微放松对大多数同学们的学术思想的压制，那么，南大理事或早已跟政府同心协力把南大办得有声有色”。

²⁰² 新加坡政府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4年7月8日。

²⁰³ 教育部长王邦文演词全文，《南洋商报》，1964年8月15日。

筹委会指责“共产党人曾通过在南大的代理人以穷凶极恶、毫无廉耻的手段压迫教职员，迫除不跟他们走同一路线的同学，他们利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破坏与污蔑专心向学而不受他们支使的教职员与同学”，因此筹委会支持政府与南大当局在南大校内的肃清行动，“就是希望往后南大不再有恐怖与欺压的怪现象存在”。

筹委会甚至指责一些教职员给学生打低分，是因为“有少数特别企图的所谓助教以分数来压制对付不同思想信仰的同学，我们认为他们的存在对于学术水准是不会有提高作用”，“甚至是对学术界的一个奇耻大辱”。

筹委会称“共产党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他们善于制造不满情绪而加以利用，无中生有，小事化大”，而一些学生被开除之后，“一小撮共产党代理人企图在南大召集一个非法傀儡式的‘家长会议’，以便在会议上‘一致通过’幕后拟就的公式化决议草案！这种伎俩，我们在中学及南大早已看惯看厌了”，筹委会更称“南大开学在即，共产党死硬分子绝不会让南大及在校同学平静地过日子”。²⁰⁴

南大理事会主席高德根也发表书面声明，批评“部分被开除学生以及学生家长未经准许，擅自在南大学生楼召集会议图谋集体之行动，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主席刘孔贵教授屡加劝止，均置若罔闻。最后警方执行任务，有 42 人被逮捕”。声明指出，“最近社会上对热中于制造事件之部分同学，屡有烦言。有谓此等学生不承认自己国家马来西亚，进行反国家活动，有谓渠等不爱护南大，欲将南大作为政治活动场所，吾人希望南大同学不致愚昧至此，而勾结外界破坏分子利用南大制造事件，以遂其政治斗争之企图，陷南大于无可收拾之境”。²⁰⁵

高德根说，“七月二十一日本人书面谈话所指出，吾人今后所应共同努力者‘是力谋南大长久安定局面，求在平静而无政治干扰环境下办理，以期校务顺利，学生进益发挥为国树人高度效能’。因此，凡是不利南大之任何集体行动应加谴责，并且严厉禁止在南大范围内进行任何非法集会与非法活动，南大理事会及行政当局，绝对不受任何集体行动所左右，亦决不会接受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更不会改变改善南大既定方针，南大理事会将坚决支持

²⁰⁴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筹委会》声明全文，《星洲日报》，1964年8月13日。

²⁰⁵ 高德根书面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4年8月15日。

校方加强纪律整饬学风的措施，吾人将会切实遵照六月五日所达致的六项协议，切实改善南大，使南大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受任何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的左右或影响”。²⁰⁶

得益于政府的强硬行动，南大当局对校内的政治活动也能够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南大学生会和南大毕业生同学会在南大的力量和地位已是大势已去。南大当局不久宣布暂停南大学生会的活动，“在新学生会章程未经合法通告之前，任何人士皆不得假借学生会名义行事”²⁰⁷，学校也规定学生宿舍只准许同年级学生同房²⁰⁸，将学生会这一组织以及南大左派学生的影响力消除到最低。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也发表声明宣布全体理事卸职，“随着近日南大事态的急促变动，加上我会主席庄副校长的辞职，我们除表示对南大前途忧虑外，我们也充分体会到，我们的职务以及对南大母校的任务，经告段落。因此谨宣布全体理事卸职。未来同学会事宜，将交由大学当局处置”，²⁰⁹宣告毕业同学会的走入历史。

行动党 1963 年大选获胜后，社阵的力量渐趋薄弱，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对南大校园内的学生政治运动的打击收到成效，“所有游移和中间势力都已归位，左右南大谈判的亲共学生势力也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另一方面，“新马合并带来种种迫切的政治问题，如种族的纷争所造成的流血暴动，乃至新马两地政府之间的对垒，在在都使人民面对生死存亡的迫切感，南大问题就退入幕后，不再成为日常生活的话题”。²¹⁰

虽然南大问题自身的政治风潮消退，但是新马合并形成的新的政治局面和“两重”政府，仍然对南大产生政治影响，也影响了两地政府的政策和关系。

²⁰⁶ 同上。

²⁰⁷ 《南洋商报》，1964 年 8 月 7 日。

²⁰⁸ 《星洲日报》，1964 年 8 月 18 日。

²⁰⁹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书面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11 日。

²¹⁰ 行动党政府前官员与作者的电邮，2005 年 4 月 4 日。

第五节 中央与地方国家意识夹缝中的南大

新加坡在 1959 年自治之后，行动党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民众确立国家意识。这是二战结束之后全球独立新兴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对执政党而言，确立国家意识有利于整合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民间团体，围绕建设国家的目标，减低或消除内部矛盾，推动国家发展，也确保政党统治的合法性。

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在本章讨论的阶段，却面临了认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差异。新马合并课题曾在民众之间制造了对立和裂痕，政党立场不一，南大学生会等组织也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因此，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建立国家意识并不是一帆风顺，过去反对新马合并的政治力量和南大学生团体，也面对被称为“反国家分子”的压力。

新马合并之后，新加坡政府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更关心政府的建设方面——学校、医院、住屋、联络所、道路、桥梁、沟渠、公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工厂。因为只有目前创建中的工业基础能够给予我们更好的生活”。

211

对于教育，行动党政府也进行大量投入，带动国家建设以及建立国家意识。根据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所言，“在整个东南亚没有国家可与新加坡比拟，在教育上投入如此之巨：1964 年投入 1.05 亿元，1965 年投入 1.07 亿元”。而社会主义阵线“最仰慕的印尼，70% 的预算都花在军费和军备上”。²¹² 但是新马合并时新加坡的教育领域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不受在某些华校及南大征募的共党集团的破坏。在南大，共产党也许会使一些人相信限制他们的阴谋的行动，是违反某些神圣的原则”。²¹³

行动党政府与南大理事会达成协议之后，对南大的控制和影响显著加强，南大成为行动党政府建设新加坡国家教育体系中需要纳入的一环。原先民间的积极捐款早在几年前已开始陷于停顿，其中既有政府所言的“这些热情的支持者意识到南大校园内存在共产主义、不满其中的反国家行为”，²¹⁴ 也应该有支持者看到政府逐渐强力介入，不愿再继续承担援助的原因。社会

²¹¹ 李光耀在立法议院演说，*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3 年 12 月 10 日。

²¹² *The Straits Times*, 1964 年 11 月 19 日。

²¹³ 李光耀在立法议院的演说，*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3 年 12 月 10 日。

²¹⁴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国会谈话，*The Straits Times*, 1964 年 11 月 19 日。

主义阵线议员 Koo Yong 就在国会指责行动党政府垄断教育，公众愿意捐献的私立学校无法运行，自从政府接管南大和辅助学校后，民间的捐款就停止了。²¹⁵

根据教育部长杨玉麟的说法，到 1964 年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达成协议时，陈六使许诺要捐献的 500 万其实只支付了 200 万或 300 万，南洋商报答应以年付 10 万元的方式分期支付 100 万元，也只付了 10 万元。邵氏兄弟答应捐助 25 万，实际只付了 5 万。²¹⁶ 当年承诺捐献各方捐献南大基金总额百分之十的李光前，则早已在 1959 年 6 月底将 104 万 4148 元交完。²¹⁷

1965 年 2 月，南洋大学呼吁那些慈善家们达到承诺捐款给大学的数目，据大学的消息说，“大多数之前曾捐款给南大的人答应今年继续，不过，目前只有七分之三的人这样做”。²¹⁸

1964 年 3 月南大的第五届毕业典礼，是经过 1963 年 9 月大选、南大毕业生积极参政后首次的毕业典礼。教育部长杨玉麟在毕业典礼特意强调建立国家意识的重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指出，大学生必须在大学期间“建立坚强的国家观念，以备毕业之后能够为国家社会作更大的贡献，甚且成为国家社会的领袖，领导人民致力于社会改革与国家建设，俾能促进平等社会和强盛国家的早日实现”。²¹⁹

杨玉麟阐述国家建设与大学人才的相互关系，指出“坚强国家意识”对大学生极为重要，是“最基本而且最现实的问题”，“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而在本邦创立的高等学府，包括星大、南大、工艺学院、师资训练学院、义安学院，历史也全都是非常短暂。这些高等学府所培养出来的各种人才，实际上还不能够适应新国家建设在多方面的实际需求，固不论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如何迫切，但最基本的前提是我们的新国家，需要具有坚强国家意识的优秀大学青年作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在国家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良好而有效率的领导作用”。²²⁰

²¹⁵ *The Straits Times*, 1964 年 11 月 19 日。

²¹⁶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国会谈话，*The Straits Times*, 1964 年 11 月 19 日。

²¹⁷ 高德根的财政报告，《南洋商报》，1959 年 8 月 6 日。

²¹⁸ *The Straits Times*, 1965 年 2 月 3 日。

²¹⁹ 教育部长杨玉麟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4 年 3 月 31 日。

²²⁰ 同上。

南大一部分学生曾经激烈地反对建立马来西亚，南大多位毕业生参加社会主义阵线，而社阵也是强烈地反对建立马来西亚。杨玉麟指出，民主国家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是绝对不能滥用自由，否定自己的国家，或是向自己的国家挑战。我们的马来西亚，是根据各地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为基础而组成的，这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价值及合法地位。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如果不支持自己的国家，不效忠自己的国家，不但非常可悲，而且非常可耻”。²²¹

杨玉麟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青年，“应该珍惜自己是国家社会所器重的人才，不要妄自菲薄，扬弃最基本的国家意识而沉迷于抽象的政治主张，甚至盲目从事不利国家的活动。反过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青年，必须先使自己建立坚定不移的国家观念，所作所为都是以效忠国家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引导自己走向正确的道路，以自己的丰富知识技能去为国家社会服务”。²²²

1963—1965 年期间，行动党政府向民众灌输和建立的国家意识是以马来西亚为归依。但南洋大学不属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尴尬地位，造成其与行动党和马来西亚中央政府间的特殊关系，也处在新加坡政府与中央政府角力的夹缝之中。就与中央政府关系而言，李光耀曾在南洋大学发表演讲，指出“马来西亚成立前与成立后，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不同的，马来西亚成立以前，在宪法上与法律上，南大与中央政府毫无关系，马来西亚成立后，今年中央政府内政部长曾提到待南大改善后，将重新考虑南大的问题”，“马来西亚的中央政府与马来亚政府的任务有不同，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政治界限与政党的界限不是根据种族的支持，那么早晚南大一定会被中央政府承认”。²²³

但是，中央政府对南大不愿承认的态度，已由早期的学术水准理由，转向受到国内族群关系与政治的影响甚至控制。早在 1959 年时，当时的联合邦署理首相兼国防部长敦那昔就宣称，联合邦政府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因为“南大是民间所创办，我们只当它是一间外国的大学。联合邦政府并未承

²²¹ 教育部长杨玉麟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4 年 3 月 31 日。

²²² 同上。

²²³ 李光耀南洋大学演讲答问，《南洋商报》，1964 年 11 月 11 日。

认任何外国大学，所以对南大，政府将采取同样的态度”，那昔也说，“联合邦政府将不可能聘用南洋大学毕业生作为联合邦的公务人员，主要的理由是南大的学位尚未达到马来亚大学的一般水准”。²²⁴

而在 1964 年 6 月的南大大逮捕和《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发表后，柔佛州巫统的一些领袖公开主张关闭南大，新山巫统西区主席兼国会下议员端哈芝拉默敏哈芝表示，“我百分之百支持南大应该被封闭，这是要避免共产分子散布他们的活动到我们国家来”，他更指“大多数的南大毕业生都是沙文主义者”，而中央政府不仅应该封闭南大，而且还应该“封闭中国银行”，²²⁵ 显然将南大与中国的分支机构都视为共产力量传播的工具。

代表华社利益的马华公会，在白皮书发表之后，召开会长委员会会议，“以冗长的时间，讨论全国人士所密切关注的南大问题”，决定请马华总会长、财政部长陈修信亲自出面调停南洋大学的问题，²²⁶ 这一决定获得马来西亚雪兰莪南大委员会、吡叻州华文教育界等地华人社群的欢迎，认为以陈修信在中央政府以及联盟中的地位出来斡旋，最为恰当。²²⁷

但是陈修信涉入南大问题，与当年其父亲陈祯禄大力为南洋大学鼓与呼相比，显得谨慎而复杂。尤其是他在中央政府内阁中的部长身份，对南大课题反而身份尴尬。在宣布陈将出面调停南大问题后，就有政党向执政党联盟要求澄清对南洋大学的立场。陈修信对此回应为“如今南大问题已够复杂，如再渗入政治问题，便会更形复杂，更加难以解决。大家应该坦白以及抱着合理态度的看法来处理，如此一来这问题便会容易解决”。陈修信指出，“南大如果是一个纯粹教育机构，而且又够水准的话，相信南大毕业生之资格，是没有理由不会与其他大学一样，获得政府之平等待遇”。²²⁸

陈修信选在中央政府彻底强力清除南大校园内的政治势力之后，介入南大问题的解决，应有其政治利益上的考量。虽然作为华社利益的代表，但是政府内阁要员的身份决定其举措主要出于政治策略，在最符合自己和马华政治利益的时候出面。南大问题已经定性、亲共力量已经清除，这时再涉入南

²²⁴ 《南洋商报》，1959 年 11 月 2 日。

²²⁵ 端哈芝拉谈话，《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3 日。

²²⁶ 《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1 日。

²²⁷ 《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2 日，7 月 3 日。

²²⁸ 陈修信谈话，《南洋商报》，1964 年 7 月 3 日。

大问题，面对的政治压力和族群反弹要比以前小得多。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中，此举也有利于马华争取更多的支持。但是新马政府针对南洋大学的谈商，却涉及更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族群利益。

1964年11月18日，新加坡立法会上就是否批准200万津贴给南大建立图书馆和科学设备以及书籍进行辩论，社会主义阵线议员谢太宝批评新加坡政府在促使中央政府承认南大上一无所为，并不是真心协助南大，新加坡财政部长吴庆瑞回应时透露新加坡政府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就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问题正在进行商谈，但“都没有公开”，是因为“不要把承认学位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教育部长王邦文发言时则说，不确定社阵现在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津贴南大，过去政府没有义务帮助南大，是因为这样的援助只会让亲共产主义的学生获益。头脑正常的政府都不会资助亲共产主义的学生来破坏民主制度。但是现在社会主义阵线已经失去了对南大的控制，他们也没有兴趣看到政府来津贴南大。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则指社阵再次听从雅加达电台的指示，因为最近雅加达电台再次指责新加坡政府干预南大的自主权”。²²⁹

南洋大学是否应该得到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资助甚至承认，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件，其中涉及新加坡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对南大内亲共势力的忧虑以及华文大学性质与马来人主掌中央政府的矛盾等。即便在讨论阶段，反对的意见亦是公开而且强烈的。1964年11月底，人民行动党议员易润堂准备在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询问教育部长，是否中央政府准备津贴在南大的马来亚学生。语文出版局主任端赛纳塞（Syed Nasir, Director of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就公开要求中央政府勿考虑任何有关以奖学金资助南大学生的要求，因为如果答应了这种要求，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承认南洋大学。他指出：“这是原则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

端赛纳塞专门发出书面谈话，称“大学是我国国民教育制度的最高峰，因此，马来亚大学目前已成为一间国家大学，必须配合——而且应该象征我国国民教育制度的目标和系统。可是南洋大学并不是在国民教育制度下诞生的高等研究中心，南大不是这制度的象征，它只是一间私立大学而已，它的系统、目标及教学媒介语皆与全盘制度背道而驰。因此，如果中央政府给南大奖学金，或任何种协助，就是中央政府做了一件违背自己的国民教育制度的

²²⁹ *The Straits Times*, 1964年11月19日。

事情，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所做的，是违反了本国人民的愿望，尤其是民族团结的理想。若中央政府今日在经济上援助南大，则为南大的理想而奋斗之人士，迟早会要求该大学的教学媒介一即是华语被承认与巫语同为马来西亚的官方语文。这便是他们要求自己的权利与利益的方式，既不能以公开的方式，便以隐匿的、缄默的方式要求。”

端赛纳塞继续称“我还记得独立之前几年，马来亚的殖民地政府本身，已反对任何协助建立南大的步骤，如果现在的独立政府以任何方式协助该大学的或学生，则等于说我们的行事已违背了自己的国家理想”。

南洋大学的教育问题同样牵涉到新加坡与中央政府关系以及马来西亚的国家建构和语言问题。端赛纳塞就称“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给新加坡以教育权力，是一件极令人遗憾的事。照理目前应该集中努力，统一马来亚十一州、新加坡州、婆罗洲两州，即沙巴和砂劳越的教育制度。如果本国有两三种不同的教育制度，那么国家团结的呼声响彻云霄又有什么用处？”

端赛纳塞认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我们必须拥有相似的生活方式，教育制度也好，经济、政治制度也好，这是至为重要的，如果这个国家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就意味着我们培养出的国民，各有不同的感情、理想及思想方式等，这都会破坏国家的团结”。

端赛纳塞批评人民行动党，指“当我国正面临外来威胁及政府尽全力团结人民之际，提出这种问题，实令人遗憾，南洋大学的事情岂不能形容为来自内部的威胁？如果中央政府受理南洋大学背后人士的要求，那我预言人民的团结将告粉碎”。²³⁰

端赛纳塞的言论很快引起争议。马六甲国会议员、南大理事会副主席陈期岳认为他批评中央政府津贴南大事是越俎代庖，违背了公务员的职务，“身为公务员，是语文出版局主席，应致力发展语文的工作，而不该越俎代庖，批评不是他份内的事”，陈期岳指出，“根据本邦宪法一百五十一条，政府协助使各民族文化发展，使其获得存在。因此端赛纳塞的批评是恶意和过份的，恐怕有损华巫两族长久建立的感情”。²³¹

²³⁰ 端赛纳塞书面谈话，*The Straits Times*，《南洋商报》，1964年11月25日。

²³¹ 陈期岳在马六甲华人注册社团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南洋商报》，1964年11月30日。

端赛纳塞发表书面谈话，对陈期岳进行回应，称“我们之中每一名人士都晓得南洋大学在精神上及物资上，成为国家教育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展开我们的国家教育制度，其神圣目的乃为在人民之间建造团结。国语已被接受为这项制度的基础。国语是超越学术问题。它是社会政治，这是由于本邦的社会政治的需求，使国语成为我们整个组成以及作为一个国家本体所不可避免的基础”。

端赛纳塞指“当我们在共同的教育制度基础下，塑造种族团结的努力中，一间像南洋大学目前结构的教育机构，乃是一项时代错误。南洋大学的问题，已击中目前国家教育制度的核心，如果它的目前结构被维持下去，将使我们创造出一个统一马来西亚国的努力成为没有意义”。

端赛纳塞称“南洋大学并非是华人或是某些对它感到兴趣的人士的事情。这间大学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建立，我们必须以现实态度面对它，基于我们所能接受的国家利益及安全的原则，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当我说关于南洋大学的问题，并非是我试图‘管他人的闲事’，而是因为我感觉到这是我应做的责任之一”。

端赛纳塞称“我并无反对南洋大学在配合我国教育制度成为一间真正高等学府。不过，我是反对南洋大学中的分支（Sub-System），它是与我们这个教育制度的观念脱节及迥异。很不幸的，目前的南洋大学是被数名不负责任的所谓马来西亚人多操纵，他们的想法以及渴望，与我们格格不入。数月以前，我也以同样理由反对建立一间马来大学的概念”。²³²

马来西亚国语行动委员会也批评陈期岳的论调，表示对教育部长拉曼达立（Talib）的声明完全同意，认为陈期岳无权对南大问题表明其关注，因为南大不曾接受国家教育政策，委员会“认为陈氏此举可能导致种族和睦之破裂，坚持促请政府承认南大可能导致种族不睦”。²³³

在中央政府谈论南洋大学，难免牵扯到种族、语言以及国家建设的目标差异等问题。因此，马华公会成员、槟城北区议员倪宗吉在国会中表示，

²³² 端赛纳塞书面谈话全文，《南洋商报》，1964年12月1日。“Nantah is ‘out of context’-Nasir”，*The Straits Times*，1964年12月1日。

²³³ 《南洋商报》，1964年12月2日。

“不幸的，南洋大学由于受颠覆而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我要呼吁各议员不要把那些发言支持南大的议员，看作是沙文主义者”。²³⁴

教育部长达立曾在国会中说，“中央政府将承认南洋大学，只要南大彻底改组，适应自己，符合国策，发展国语，在 1967 年成为我国唯一的官方语言，南大政策必须符合政府目标朝向形成单一的马来西亚民族，南大宗旨必须基于种族团结和谐为本，假如南洋大学能做到这种地步，政府将承认南大学位，吸收其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服务”。²³⁵

除了中央政府中存在马来国语与南洋大学华文教学媒介语以及延伸出的族群关系与国家和谐的分歧之外，中央（吉隆坡）与地方（新加坡）政治利益的纠葛，参与国阵联盟的马华公会也与人民行动党的针锋相对的矛盾，都体现到南洋大学的课题上。南大问题一度成为马来亚中央与新加坡地方政治矛盾的角力场，为南大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复杂局面。

在 1964 年成立的南大毕业生协会与马华中央教育小组进行笔战。被指为“行动党外围傀儡组织”²³⁶的南大毕业生协会，要求马华“好好地利用目前的地位，理直气壮地替母语教育属下的南大问题在立法决策上据理力争合理的解决”，协会甚至指中央政府“不承认不资助南大的政策却是马华所促成的！因为‘联盟是由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素组成的政党，它的政策是相生相成、交互影响的、整体的’（引用马华教育小组说法）”。²³⁷

马华对于行动党与南洋大学的关系，提出不少批评。马华提出争取南大地位的三大目标：一，完成南大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一切政党政治退出南大；二，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准，完成符合马来西亚精神的大学；三，争取泛马来西亚对南大学位的承认。²³⁸ 对于 1964 年与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之后的南洋大学，马华指南大是“走了一个社阵的政治，来了一个行动党党政政治的局面”，南大行政当局也成了“行动党魔掌之下的饵食”。²³⁹

²³⁴ 倪宗吉 1964 年 12 月 15 日在国会的发言，转引自南大毕业生协会声明全文，《星洲日报》，1964 年 12 月 25 日。

²³⁵ 教育部长达立 1964 年 7 月 9 日在国会的发言，转引自南大毕业生协会声明全文，《星洲日报》，1964 年 12 月 25 日。

²³⁶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 年 1 月 14 日。

²³⁷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 年 1 月 7 日。

²³⁸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 年 1 月 14 日。

²³⁹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 年 1 月 23 日。

马华也指南大毕业生协会是“行动党的外围与傀儡组织”，其中一个原因是协会的一个理事黎达材是行动党的国会候选人，“被行动党升调为文化部政治秘书”。²⁴⁰ 在新加坡政府部门服务的联邦南大毕业同学为“来自联合邦之行动党党员”，²⁴¹ 马华还称“有负责监督南大寄宿生的行动党党员（黄济复），配带手枪，在南大执行公务”²⁴²，而黄济复为南大毕业生协会首任会长，自1964年8月至12月担任南大的舍监，1965年1月离职，前往英国攻读法律。²⁴³ 对于黄是否持械的说法，南大校内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刘孔贵否认有此事，称“没有看见黄氏携带武器，南大当局亦不准他携带武器来校”。²⁴⁴

对于毕业生协会的秘书，马华指其和新加坡教育部长是甥舅关系，“以这种优异关系出任南大毕业生协会正秘书的崇高职位”。马华在与毕业生协会的笔战中，意有所指地表示，“我们不会准备接受南大毕业生协会执委诸公的行动党党员们的忠告”。²⁴⁵

南大毕业生协会反驳马华的指责时，举出马华国会议员兼南大理事会副主席陈期岳的例子，指出按照马华的逻辑，“南大是受马华控制的，南大便是马华的外围与傀儡组织”。若推而广之，“马来西亚各州甚至东南亚各地有马华会员当理事或董事的学校、社团及商行都成为马华的外围与傀儡组织了”。²⁴⁶ 协会批评马华在南大问题上，“执政党的马华不予南大学位之承认，非不能也，不为也”。毕业生协会曾以“仁至义尽”形容新加坡政府在承认南大问题上“尽了分内的责任”，招致马华的批评，协会则反击马华的态度为“不仁不义、天良泯灭”。²⁴⁷

南大毕业生协会举出陈期岳的例子，似乎意有所指，间接批评陈的政治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新加坡和中央的矛盾，在南大理事会不同背景的理事身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在两个月后的南大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²⁴⁰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年1月23日。

²⁴¹ 同上。

²⁴²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年1月18日。

²⁴³ 黄济复，来自怡保。经政系第一届毕业生，是当年南大开幕时的纠察总指挥，又是“武林高手”，杨氏太极拳传人。见三合《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花絮》，载《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48页。黄于1995年5月，在英国伦敦去世。

²⁴⁴ 《南洋商报》，1965年1月28日。

²⁴⁵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年1月18日。

²⁴⁶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年1月14日。

²⁴⁷ 南大毕业生协会答复马华教育小组，《南洋商报》，1965年1月18日。

上讨论 1965 年度财政预算时，陈期岳就与高德根有一番辩论。针对理事会主席高德根有关政府对预算资助，“如经营业商视情况而定或多或少，如多，教职员加薪则多，如少则少”，陈期岳提出异议，认为“高德根谈话有需澄清”，“星政府资助南大，在费用方面是不可以削减的”，他表示“要知道，这是高德根自己想的话，或是新加坡政府叫高德根讲的，或者与政府商谈后才讲的”。²⁴⁸

南大毕业生协会指责马华的同时，马来亚的南大同学会则暗批行动党政府对南大的干预。马来亚南大同学会筹委会在其告社会人士书中就专门谈及“政党政治控制南大的问题”，指出“数年来这个问题不知牺牲了多少南大毕业生的出路和前途。过去南大学生会受共产外围组织的政党控制着，造成各阶层人士误解为‘南大就是共产党机构’，后经中央政府加以大力肃清，南大才摆脱了共产外围组织政党的控制。所不幸的，有某些政党并不尊重南大的尊严，仍欲以政党政治的力量控制南大，将南大问题作为政治资本”，筹委会声明指出“若期望任何政党政治远离南大，恢复南大纯粹为研究学术机构的本来面目，只有靠星马两地各政党本身保证不再以政党力量干预南大的校政，否则，尽管其政党在大吹大擂其如何支援南大，都不是最好的治本办法”。²⁴⁹

中央与地方围绕南大问题的矛盾，在南大各州委员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再次体现出来。理事会主席高德根致词时表示，“本邦政府的资助南大，协助南大的发展，已为全面性的支持与正式承认南大学位铺路”，除了新加坡政府之外，“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各州政府，亦同样的责无旁贷，也应马上给予南大以公平合理的待遇。理由很简单，南大是马来西亚人民的，南大培育出来的人材，也是以整个马来西亚为服务对象，自应获得政府的支持”。²⁵⁰

陈期岳则把矛头对准新加坡政府，“南大选出五代表与新加坡政府商谈改革南大问题，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但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后，对南大承认的问题，却无积极的表现”，陈期岳披露他曾写信给新加坡教育部，“谈及理

²⁴⁸ 《南洋商报》，1965 年 3 月 30 日。

²⁴⁹ 马来亚南大同学会筹备委员会告社会人士书全文，《南洋商报》，1965 年 4 月 20 日。

²⁵⁰ 高德根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5 年 3 月 30 日。

事会六名政府代表（新加坡政府三名，中央政府及沙、砂政府各一名）的问题，并请教育部修正南洋大学法令，但迄今未得教育部的答复。如果新加坡政府不履行双方谈商所达致的协议，那么新加坡政府应该负责，南大须要各州及中央政府的承认，除非修正南洋大学法，政府代表才能参加理事会”。对于中央政府承认南大的问题，陈期岳指出，据他所知道，中央政府承认南大问题已经很接近，它了解南大日甚一日，照他看承认南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陈期岳也高度赞扬被新加坡政府褫夺公民权、被迫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务的陈六使，称他为“南大之父”，“应该表扬他劳苦功高，丰功伟绩，应该邀请他出席第六届毕业典礼，应该选出代表去会见他，请他以过去的精神和意志继续支持南大，把南大办成一间成功的大学”。²⁵¹

陈期岳的谈话获得雪兰莪州代表张士元的支持，对于新加坡政府与南大达成协议后，迄今没有下文，他“相信全马华人与各族人士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希望南大“各州代表大会要求新加坡政府给予答复”，张士元指出“新加坡政府与南大当局首先解决了这件事情，然后对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的要求就会比较容易，如果新加坡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各州就无法进行工作”。²⁵²

南大学位承认与否以及政府该如何津贴南大的问题在 1965 年初成为中央政府与新加坡政府互相角力的对象，新加坡方面及南大当局也多次向中央政府喊话或施压。

在三月底举行的第六届毕业典礼上，南大理事会主席高德根再次呼吁中央政府早日承认南大，“呼吁社会上对南大表观望的，对南大存偏见的，今后能有一种新的认识”，“深信中央政府也会一样关心南大的前途，珍视那些有心报国，有心为社会做事的南大毕业生的的一片热忱，扶助他们，督促他们，并且早日承认南大学位，协助南大发展”。²⁵³

在同一场合，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解释了南大改革经过”，对于新加坡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在南大问题上的责任分担进行阐述。对于

²⁵¹ 陈期岳谈话，《南洋商报》，1965 年 3 月 30 日。

²⁵² 张士元谈话，《南洋商报》，1965 年 3 月 30 日。

²⁵³ 高德根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5 年 3 月 31 日。

外界对南大与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后按兵不动的批评，王邦文称“好些方面已经付诸实施，公众人士也许不很清楚”，并加以解释：“南大的首阶段改革工作，是以清除校内的反国家共产份子为主，从而维持学府的良好秩序。清除这类反国家共产份子时，基于明显理由，报章都曾详予报道，一般人士差不多都知道了。公众人士所不清楚的是好些行政上、财政上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目的在给南大建立起一个巩固、良好的基础，使现在的南大纳入正规，使未来的南大获得更壮健的发展”。

王邦文透露，“这一个阶段的改革工作，由于缺乏一个基于良好原则的适当的行政制度，所以花费了很多时间，远超出预料之外”。比如“往往找不到适当的财政记录、手续，也没有过一个正式的预算案，原来准备作为经常的款项，竟被挪用来作为发展开支，以致去年（1964年）八月教员的薪金都没办法支付，结果只好由政府先垫付出二十万元，方能度过难关”。

在课程方面，王邦文认为“很多地方不够理想，须待改革。譬如说南大各系课程的编配，间有不以学术立场为原则，而以某等教师的能胜任某些科目为着想，形成因人设课，而非因课程的需要而聘用适当的人员。在此种情形之下致使所设课程常各自缺乏联系，且所设课程未能顾及当地社会的需要”。

王邦文认为，“清除校内反国家共产份子”的“第一阶段改革虽然尚未完成，第二阶段的改革——课程的重新厘定及教职员资格的评定——已开始进行了”，王赓武领导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将“负责检讨现存的课程，做必要的调整，以应当地社会需求”。

王邦文首次提出，清除南洋大学内的“反国家共产份子”和课程改革，就是“提高南大学术水准最重要的二项措施”。而“学术水准的提高，则是政府承认南大学位的先决条件”。“只要南大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和发展，俾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是变成培育反国家共产份子的温床，新加坡政府时刻都准备给予资助”。王邦文表示，“南大的改革一旦完成，以及通过种种途径，提高了学术水准之后，承认学位问题，必可迎刃而解，不仅是新加坡政府的态度，本人希望中央政府也能如此”。²⁵⁴

²⁵⁴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5年3月31日。

新加坡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也应该承担资助南大的责任，因为“南大学生中，过半数是来自马来亚各州跟砂劳越、沙巴”，而新加坡“没有这么充裕的财源，继续资助来自新加坡以外的学生，更何况本邦经济在印尼的‘对抗’下已惨受打击”，新加坡要求“各州政府必须各自负起教育他们自己公民的责任”，新加坡政府“没有义务津贴那些既非新加坡公民，也未向新加坡缴纳一分一文赋税的其他各州学生”，王邦文称“新加坡政府的资助南大，增添教学设备，为来自大马其他各州学生而增聘的教职员等，已大超出新加坡政府所应负担的责任，同时也没办法一直这样继续下去”。²⁵⁵

²⁵⁵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5年3月31日。

第六节 小结

1963 至 1965 年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变幻无常，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新马合并带来的种族问题、政治角力、政治路线的冲突，都直接影响到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和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关系。

这一时期，对南洋大学而言，是一个政治上的转折点。既因为南大毕业生积极参与 1963 年大选、南洋大学成为选举的重要课题，而达到政治上的最高峰，也因为政治斗争的失利、大逮捕的实施、学生政治力量的消除而摔落谷底。参选意味着南大开始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建国人才，参与决定新加坡的政治进程，但同时也意味着南大开始输出参与政治权力分配的人才，外部政党间的政治差异和分歧势必在南大这一载体上出现扩大和延伸，这一扩大的分歧最终演变成政治上的冲突，招致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的干预、清除内部政治力量，彻底改变了南大的形象和命运。

其后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庄竹林被迫辞职，南大学生会、南大毕业同学会经过内部的学生联谊会和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的损耗斗争，以及外部的政府强力逮捕镇压，最终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使南大失去了在政治上以及南大问题上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支撑。政府也得以开始相对顺利地实施南大改组的计划，逐渐增加对南大的控制权。

虽然经历了逮捕事件、学生会和毕业同学会的力量消退，但南洋大学的承认问题在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体现了新加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治角力，以及围绕南洋大学产生的政治理念和国家目标的差异。

中央政府内存在强烈声音，从维护马来国语的角度坚决反对承认和资助华文大学的南大。而行动党政府对马来西亚的理念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从这一点看，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能否承认南洋大学，某种程度上就是能否落实“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标尺。

因此，行动党在马来西亚的国会里多次以南洋大学的问题向中央政府发力，南洋大学成为行动党在新加坡以外的政治版图中扩大理念、争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支持的一个平台。如果再将这一分析与行动党和中央政府内代表华人社会的马华公会之间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做以下论述：对行

动党和马华公会而言，南洋大学内亲共的学生力量和左派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共同的对手，但是在为南洋大学争取利益、改善水平来争取华人社会的支持上，彼此又是对手。

这种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对南洋大学问题的解决没有什么助益，相反两个政党——一个是南洋大学所在地、华人为主的社会的新加坡执政党，一个是代表包括南洋大学在内的华人社会利益的中央政府执政联盟的组成政党，无法在南大问题上实现彼此合作，相反都慎重行事，以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斗争中丧失有利的地位，招致不利的局面。

当然，南大问题归根结底还主要是新加坡的内部问题。南洋大学在新加坡独立建国的阶段，才真正开始与行动党的国家建构目标再度开始重新适应磨合的过程。

第六章 南大与行动党政府关系

（1965—1968）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与国家建构

1965 年是新加坡政治变迁、国家地位确立的分水岭。与新马一家时行动党政府拥有教育和劳工自主权相比，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面对的责任与压力都将增加，外部的区域局势和政治经济形势也复杂许多。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国家机器的掌控者，其对国家这一概念的定位、意识和图像，都深刻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行动党需要发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来集合政治优势，也会面对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建国理想，即以反对力量为主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南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环、学子精英的集中地，在反对行动党的力量尚未成为强弩之末的外部政治环境下，对行动党的国家建构意识如何回应，对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抱持何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南大与行动党政府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进程。

因此，对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理念以及独立后国家意识确立的过程进行分析实属必要。在这一进程中，行动党也因此对南洋大学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有着顺应其建国方向的要求，这也将是本节分析的重点。对于行动党的政治理念，不同角度的研究论述已为数众多，本文将仅以左翼思潮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角度切入，概述行动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形成、分裂，又如何因为对南洋大学的政策而招致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批评，最终脱离社会主义国际，以此观察在更广的层面上，以左翼思潮为主的南洋大学与行动党在国家意识和意识形态上的磨合过程。

李光耀等人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带有强烈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特征。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典型的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正式出现于 1951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成立的“社会党国际”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¹ 英国第一任工党首相、连续领导工党 30 多年的麦克唐纳（MacDonald, Ramsay）被认为是“奠定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基础”²的人物，而李光耀本人在英国留学期间，就深受英国工党的思想影响。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曾称“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因为“工党比保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英国工党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政府上台之后，要创造一个福利国，负责照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保守党没有强烈的抗议和街头流血事件，给李光耀“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也多次享受到这一平均主义制度下的好处，对于工党的政策佩服不已。李光耀加入了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长到俱乐部畅谈该党向国会提出的各种纲领时，李光耀一定出席。³

因此，在李光耀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变革的年代，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年代”，“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那一套公平合理的纲领”。在英国成熟的制度下，“宪制传统和容忍精神，使得权力和财富都在和平中进行基本的转移”。⁴

李光耀在英国期间受到英国工党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对行动党在新加坡成立之后的政治理念和定位、与左派和右派的互动关系都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更广的历史场景来看，对于左派来说，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表明，“民主社会主义从它的起源和发展来说，可以作为有条件的共产党人的同盟军”，⁵ 这或许可以从理论上解释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与左翼激进分子合作的动机和起源。

¹ 刘书林《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页 10。

² 刘书林《麦克唐纳社会主义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页 2。

³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 134 至 136。

⁴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 136。

⁵ 刘书林《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页 5。

对右派而言，“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及其前身的党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一些国家执政的实践，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逐渐为资产阶级统治阶级所接受和信赖。在这个过程中，把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观念改造成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它们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人道主义观念、多元化的观念，总之，把它们改造成资产阶级政党。在冷战的年代，使它们公开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成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人的工具”。⁶

在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落实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过程中，经历了参与政治、争取政权、巩固政权、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一些具体理念限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产生了修改甚至偏离，以致与国内、党内的政治理念发生斗争（比如行动党内部的两次分裂和权力斗争），行动党建党之初就以非共的社会主义纲领作为号召，对抗殖民主义，使自己站在左右两派的中间线上。而在 1961 年，行动党内部的左派人士脱离该党成立名为社会主义阵线的新政党，这一名称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双方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差异和分裂。

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继续高举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行动党副秘书长兼教育部长王邦文就称，新加坡“是以正确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去发挥富强的才智与能力，用诸于各项建设发展上，对内是基于公平与平等的原则，建立多元种族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对外是以不结盟政策结交更多的友好国家”。

对于要加入行动党的人，“也就是立志要为多元种族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在党的领导下以与全新加坡人民结合在一起，共同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范国家”。⁷

行动党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认知和落实，多数情况下是根据新加坡的现实环境和外部区域的政治格局，并不完全依照意识形态的教条政策，而是权衡现实的综合利益。

人民行动党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最后甚至与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激烈交锋。行动党在 1966 年“受邀加入社会主义国际”，⁸ 但荷兰工党在 1976

⁶同上。

⁷王邦文谈话，《南洋商报》，1966 年 5 月 16 日。

年指责“人民行动党有史以来的记录，明确地使它没有资格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新加坡人民被迫为人民行动党的经济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不能够接受的。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同法兰克福宣言和奥斯陆宣言所阐述的社会民主原则，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因此，荷兰工党建议“把人民行动党逐出社会主义国际”。⁹

在荷兰工党对行动党的指责中，“压制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自由”是其中一项。“就像工运那样，学生运动曾经在人民行动党统治之下受到特别注意。在反殖斗争中，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中学联）曾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除反对直接影响教育的各种殖民地政府外，中学联还积极支持工会。当南洋大学在一九五六年成立时，这项传统在那里获得继续保持”。荷兰工党批评“学生运动受到人民行动党的各种压制，它有系统地把大学置于强硬的政府控制之下。南大学生会在一九六四年被禁原因是学生针对合并进行抗议，并反对冷藏行动之下的逮捕行动。当局并设立一个学生辅导处来控制所有学生活动。南大行政机构里的成员也被人民行动党的人员取代。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被撤销，为了消除大学内批评政府者，许多教职员、讲师和工人都被辞退，而数十名学生则被逮捕或开除”。¹⁰

对荷兰工党所提及的逮捕及开除学生事件，南洋大学学生会也曾发表“告同胞书”，指责“政府用尽各种方法来抢夺南大。用逮捕学生、迫走校长、迫害理事主席，压迫副主席辞去一切职务、开除学生以及行政与管理人员，全面向南大进攻”。学生会指责“政府这次逮捕学生，又重弹老调，把红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咒骂我们是什么‘共产党’。其实，政府逮捕南大学生的真正原因，就是作为抢夺南大的一个步骤”。学生会认为，“在这次公开抢夺南大的

⁸ <李光耀致社会主义国际秘书长的信函>，1976年5月8日，见蒂凡那编《社会主义的实现—新加坡之道路》（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76），页135。

⁹ <荷兰工党提出建议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逐出社会主义国际的备忘录>，见蒂凡那编《社会主义的实现—新加坡之道路》，页232至243。

¹⁰ <荷兰工党提出建议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逐出社会主义国际的备忘录>，页240至241。

勾当中，行动党政府充当师爷，设计献计，与中央联盟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进攻南大”。¹¹

行动党秉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处理南大问题上，却与国际社会主义立场不同，并因此分道扬镳，表明行动党的政策不受其意识形态的束缚，采取务实、对政府有利的方式，最终因为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决裂，甚至在其后建党、建国的指导思想上，淡化乃至放弃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

民主社会主义在新加坡的演变过程，其实也在提醒人们，虽然行动党政府曾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但新加坡国家意识的最终确立，并不完全像意识形态建国的共产国家一样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根据区域的政治局势、族群特性、新马关系等作出的独特选择，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必须符合新加坡面对的实际境地，否则要么被调整，要么被抛弃。从这一角度看新加坡独立后的政党关系、国家建构，以及其对南洋大学的影响，就可以分析南大内存在的不同意识、不同思想与行动党路线的差异，为何引起政府与大学的尖锐对立。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行动党开始面对很大的困境，两年曾因公民投票加入马来西亚造成社会分裂，如今由于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分裂，再次面对新的政治压力。树立全民的国家意识，将人民团结在国家的旗帜之下，是维持新加坡生存以及行动党执政的一个重要基础。而在独立之后的近十年内，整个国家是处于“生存的意识形态”指导之下，¹² 有学者分析这种由行动党所制定和领导的“生存政治”具备四个主题与特征，包括“致力建设多种族的民主社会；建构一个严厉和紧密控制的社会必要性；强调国家建设；接受变化、与时俱进”。¹³

¹¹ 《南大学生会就逮捕及开除事件告同胞书》，1964年7月19日。

¹²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6。

¹³ 参见陈庆珠 Chan Heng Chee, *Singapore: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65-19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8-54.

新加坡短暂的历史、多元的文化、第一代移民社会，使“建立国家意识比别的国家困难”。¹⁴ 因此，行动党政府着力在公民心中培育国家观念，与之相关的政策亦围绕这一目标。与其他新兴国家类似，新加坡的国民国家建构希望打破地区和族群界限，在统一的政治格局和领土主权下，建立匀质的经济、市场、语言以及以国家象征符号为中心的文化模式。行动党政府为做到这一点，形成了所谓的“策划心态”（*planning mentality*）：政治领导人按照既定的政策，具有强烈的信心根据自己的规划来贯彻措施。这种心态“不但展现在政治方面的规划运作，同时也展现在其他方面的策划，包括城市规划、家庭人口计划、人力资源计划、教育计划”。¹⁵

但是，国民国家的建构充满复杂的矛盾冲突，因为这种建构“必然要继承历史，动员早已具有特定族群身份的民众，运用或者制造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个族群特征的象征符号，以某个族群为主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来重新划定社会界限、开发和利用经济、人口、政治、社会、历史、感情和符号的资本”。¹⁶ 而作为重新划定主体的“某个族群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显然都与掌握国家权力、制定国家政策、主导国家资源的领导阶层或阶级或政党的意志密切相关。因此，行动党本身对国家建构、对族群关系、对国家走向的理念、意识形态和认知，就决定了它将如何动员各族群身份的民众，重新划定社会界限。

但是，民族和国民国家的建构，本身是一个“各族群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在国家政治和领土格局内，在政治、经济以及诸多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分配方面，发生矛盾、存在差异、时有冲突的过程”，¹⁷ 即便行动党政府如何标榜建立超族群、超阶级的国家形态，它自身也在某种意义上难以避免成为一种族群的象征，用自己群体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周围的世界，为自己和自己的群体以及群体所代表的目标和理念争取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行动党政府与包括受华文教育的族群在内的新加坡各族群之间，既有利益的重合，更

¹⁴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语，《南洋商报》，1965年9月21日。

¹⁵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1985），页5。

¹⁶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页28。

¹⁷ 同上。

有“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的差异，要改变或重组对方的认知模式，必然会产生国家建构从目标到模式的冲突。

就受华文教育者而言，其多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对文化的认同、对传统的维护，深刻体现了一个族群在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上的归属性（ascriptive）¹⁸特征：家庭关系、族属、语言、认知模式、文化环境等，都在他出生前已经决定，没有选择余地。受华文教育者的基本生存空间是族群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容纳了他的母语、群体价值观、礼仪等文化要素，在这些文化要素的熏陶下，在作为这些文化要素承担者的前辈们的教育下，完成了社会化过程。作为华文教育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显然在这一社会化的进程中，从环境到价值观，从语言到行为模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作为族群经验、归属性产物的每一位社会意义上的操作者，在进入社会、参与国家建构、贡献个人力量的不同阶段，不论其后来的经验如何发生变化，都会始终保持主要的族群特征，并且将这些族群特征印刻在自己的种种产品（包括价值观、文化观和回报社会的行为）上。这种特征不独受华文教育者所有，同样应用在其他族群和群体（包括受英文教育的华族）上。正因为此，行动党政府在建立全新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甚至具体的语言、教育政策）时，都将面对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新加坡华人社会为主、受华文教育者比例高的现实，更决定了行动党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将来自华人族群中的受华文教育社群。

南洋大学作为华文最高学府的文化堡垒地位，也因此历史性地被摆放到与政府关系、国家建构中一个特殊的位置。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新加坡独立不久的一次谈话中，提醒公众“环绕在新加坡周围的国家，都各有本身的语言、文化。新加坡是个华人人口绝大多

¹⁸ 与归属性特征相对的是自愿性（voluntary）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指诸如婚姻关系、市场关系和各种个人间交往关系一类，可自由选择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归属性的则指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一类，人们一旦进入就无法选择的关系和网络。Kuhn, Philip 所著的 1980 *Rebellion and its Ene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85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和 Prasenjit Duara 所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中，运用这两个概念来作中国乡村社会分析，转引自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页 30。

数的国家，如果要在东南亚地区生存下去，人民便得有统一的思想意识，处处以新加坡的利益为前提，才不会引起邻邦的猜疑和敌视”，针对华文教育，王邦文表示“华教常常引起好多人的议论，你倘若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待华教，可能不以为理想。但若以新加坡国民的眼光来看，新加坡的华教政策，委实是最适合这个多元语言社会”。¹⁹

在行动党第四区部庆祝行动党成立 12 周年的晚会上，行动党副秘书长、教育部长王邦文强调，“一切的努力都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把个人、政党与国家，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只有国家的生存有保障，发展有成就，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才会有前途、有幸福、有希望”。²⁰

在公民中树立国家意识、强化国家利益为先，把个人、政党与国家结合，对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也有利。行动党也将效忠国家的宣传与批评政敌联系起来，1966 年 11 月 27 日，在新加坡唐人街一牛车水的一个业余艺术团体星华音乐剧社成立 27 周年游艺大会上，教育部长王邦文猛烈抨击社会主义阵线“不要自己的国家，不要自己的政府。他们竟然采取所谓议会外的群众斗争，像三星流氓一样在街头上纠众闹事，公然以暴力攻击警察，破坏秩序，甚且煽动学生制造麻烦”。王邦文称“如果像社阵以及其他共产外围阵线那一小群反共国家分子那样，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要，所作所为的目的是在摧毁国家前途，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严厉警告他们。他们所作所为，乃是天理、人情、国法所难容，他们自己必须负起反国家非法活动所造成一切后果的责任”。

围绕“国家”的课题，王邦文继续指社阵“并不是不要‘国家’，也不是不‘效忠国家’，不过，他们所要的是由共产极权统治的国家，他们所效忠的是他们的共产祖国”。²¹

在 1967 年汤中区的补选中，行动党候选人洪南标战胜社会主义阵线候选人。王邦文在选后对该区的居民谈话时，再以“国家”观念抨击社阵“不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民主政党，而是他们的外国主子用来毁灭新加坡共和

¹⁹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谈话，《南洋商报》，1965 年 9 月 21 日。

²⁰王邦文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6 年 5 月 16 日。

²¹王邦文演讲词全文，《南洋商报》，1966 年 11 月 28 日。

国的政治工具”，“社阵根本就不要国家，不要人民，也不要民主政治”。王邦文评价这次补选就是“爱国者战胜叛国者，民主主义者战胜共产主义者”。王邦文也要求居民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一定要体会到国家的重要性”，“个人的利益固然重要，国家的利益更加重要”，对于曾经支持社阵的人，“必须认清事实，深思熟虑，建立国家观念，加强公民意识，热爱自己的国家，支持自己的政府”。²²

新加坡走上独立建国之路后，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开始着重加强国民教育和国家意识教育，“时时在想办法使到教育更能符合国家社会需要。诸如教育部公布小学公民训练方案及实施方法，以及各项教育制度的不断改进加强，都是为了革新教育，以便培养年青一代更能合乎国家社会需要”，因此，独立后初期国民教育的两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培养新一代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²³

对于专门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大学，行动党政府和教育部更需要付出努力，培养国家意识，“符合国家社会的需要”。因为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袖最迫切的愿望是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促使他们调动一切资源——包括高等学府内的制度资源——来为整体目标服务。政府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基本的教育目标，更延伸到这些学府能为政治精英所制定的国家目标做出什么样的贡献。²⁴ 对以民间大学形态存在的南洋大学，将其“国家化”、为推行政府政策服务，就成为行动党政府的必须之举。

在新马一家时，行动党就以国家意识来要求南洋大学，教育部长王邦文曾首次明确提出，清除南洋大学内的“反国家共产份子”和课程改革，就是“提高南大学术水准最重要的二项措施”。而“学术水准的提高，则是政府承认南大学位的先决条件”。“只要南大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和发展，俾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是变成培育反国家共产份子的温床，新加坡政府时刻都准备给予

²² 王邦文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7年4月25日。

²³ 王邦文在张氏总会奖学金颁奖礼上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7年4月11日。

²⁴ Seah Chee Meow & Soeratno Partoatmodj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Case Studies: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Singapore: 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9), 2.

资助”。²⁵ 行动党政府的态度首次如此明确，南大内部“亲共势力”政治立场和影响直接与学术水准挂钩，突出了南大问题的政治性，而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和教育问题。换言之，南大内部的“亲共势力”消弥之时，才可能是政府满意南大学术水准之日。

在南洋大学 1965 年的毕业典礼上，王邦文要求南大当局与学生“协力确保南大成为一个不受颠覆活动影响的高等学府，特别是我们面对着来自印尼对抗，面对着种族主义政客们猖獗地利用着语言、种族、效忠等问题，鼓动着部分人民情绪，兴波作浪的此时此刻，南洋大学更应显示她愿意也有能力维护校内纪律，有办法控制任何亲共份子再度以维护华文教育、文化、学术自由等等为掩护，从事在校内进行其反国家活动”。

王邦文也要求南大学生“应时刻警惕，抗拒混迹他们中间的反国家份子的活动与种种阴谋，避免受其欺骗、误导与涉入共产的煽动。他们应通过言行，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马来西亚人，效忠于马来西亚，并随时准备在印尼的侵略下，为了大马领土主权的完整，挺身而出保护马来西亚”。他同时表扬南大学生联谊会“促请中央政府也在南大建立起跟马大一样的地方军，正是学生们效忠国家的具体表现”。²⁶

而在 1964 年被取缔的南洋大学学生会，就曾指责“行动党政府迫使校长与理事会正副主席辞职，以及自身委任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五人校政临时委员，实行行动党政府阴谋的作法，正是破坏了南大的自主权，破坏它和作为纯学术机构的原则”，学生会还严词批评“政府极力通过其代理人在校内，筹组分裂性组织，来颠覆代表校内学生最高组织的学生会和校外毕业同学代表组织——南大毕业同学会。在这过程，发表危言耸听、不利南大的言论。这些分裂组织是：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南大学生联谊会、南大毕业生协会。真是从事颠覆活动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²⁷

²⁵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5 年 3 月 31 日。

²⁶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5 年 3 月 31 日。

²⁷ 南洋大学学生会《政府控制南大的真相》，1964 年 7 月 9 日。

取南大学生会而代之的南大学生联谊会，因为政治立场的“正确”，获得新加坡政府的赞扬。在其成立周年纪念及筹募会务基金演出活动上，教育部长王邦文盛赞学生联谊会“成立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学生活动已经逐渐进入轨道”，“说明南大经改组后，一切的紊乱经已恢复正常。从紊乱到正常，这是南大在改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第一道曙光，政府今后更会全力支持南大，只要南大不再为亲共和反国家份子所操纵与垄断”。王邦文赞扬联谊会在“环境最恶劣的时候成立，可以说是南大同学正义力量冲破亲共份子控制的第一炮，尤其是在成立以后的过去一年中，尽管亲共份子不断加以破坏与打击，联谊会始终能够坚持正确的立场，领导和鼓励南大同学从事正常的各种活动，使亲共份子无法再垄断各种学生团体和活动继续去煽动与误导南大同学走上错误的道路”。²⁸

由于建立国家意识需要将南大改变为“不再为亲共和反国家分子所操纵与垄断”，南大内的学生组织除了学生会之外，其他“立场偏左”的组织同样面临被“改组”的命运。1965年初，南洋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处指令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南洋大学英文研究会等学生社团必须按照辅导处新颁布的《学生团体条例》修改会章并实行改组。南大政治学会第六届执委会（1964-1965）“鉴于此项命令有违本会初创之意旨”，曾要求校方鉴于考虑取消或删改某些条文，并准许召开第六届常年会员大会以让会员做最后取舍，“但此等合情合理的要求都为校方断然拒绝”，因此该执委会在1965年6月5日宣布辞去一切职务。²⁹南大英文研究会也对《学生团体条例》与要求改组事宜，认为“该条例对本会之创立宗旨与今后之会务活动影响重大，难以接受，决定于1965年6月4日起全体理事辞却英文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内之所有职位”。³⁰

学生组织的改组既是南洋大学整体改组内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在为南洋大学即将进行的课程与学制改组清除障碍。由王赓武领导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在1965年5月14日提交报告，虽然尚未公开宣布开办荣誉学位，将学制转为英

²⁸ 王邦文于南大学生联谊会周年纪念上致词全文，《南洋商报》，1965年4月21日。

²⁹ <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全体执委辞职启事>，《南洋商报》，1965年6月5日。

³⁰ <南洋大学英文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全体理事辞职启事>，《南洋商报》，1965年6月5日。

制，以与新加坡大学一致，但南大代理副校长黄应荣在 6 月的一次由南大毕业生协会主办的聚餐上，做《南洋大学之现状及其展望》演讲时就暗示，“南大向来采用学年学分制，只授予普通学位，一般的毕业同学们，不论在升学或就业上都感到吃亏。希望南大今后有所改善。本人认为南大今后应建立新的学制，除促进普通高等教育外，同时造就一些具有符合本国专业公会会员资格之人材，并授予更高的学位”。³¹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随后发表声明对南大建立新学制表示“毫无保留的欢迎”，并与新加坡大学比较，认为“新大三年可以同时培养出普通学士及荣誉学士，而南大花了四年却只能造就出清一色的普通学士，在政府部门来说，普通学士只能成为第二级的公务员。我们不希望南大只是能永远造就第二级公务员的一个机构”。³² 毕业生协会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南大与新大学制不一、而政府采用英制对南大生造成不利的尴尬局面。

新马分家后，政治格局、国家疆域、认同场景都发生改变，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例，以前任何华族商人都可成为商会会员，后修订章程，规定只限新加坡公民入会，马来西亚成立后，则要求必须是属于马来西亚公民的华人，³³ 新马分家后，则又重新只限新加坡公民入会。李光耀曾表示，新马分家后，行动党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教育，培养有才能、体格好的下一代，维持国家的安存”，³⁴ 在这样的要求下，南洋大学曾经结合新马各州华人社团力量、60%学生来自联合邦的背景反而成为新的尴尬，为南大地位和新马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比如，联合邦的学生是否能和以前一样报考南大？南大行政体系中原有的南大各州委员会，使马来亚的华社对南大保持相当的影响力，以后是否继续存在？以什么样的法律基础和权限存在？南大的联合邦毕业生如何在新加坡政府部门寻找工作？南大毕业生协会六名代表（杨子国、庄日昆、潘贤耀、黎达

³¹ 黄应荣《南洋大学之现状及其展望》，《南洋商报》，1965年6月21日。

³²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书面声明>，《南洋商报》，1965年6月23日。

³³ 叶平玉<新大厦新景象>，《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大厦落成纪念刊》（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编印，1964年），页81。

³⁴ 李光耀演讲词全文，《南洋商报星期日》，1966年10月30日。

材、罗约瑟、宋和才）在新马分家后不久曾会见教育部长王邦文，并获得王邦文保证“南大目前的一切会照旧，不会为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受到影响”。联合邦学生照旧可以报考南大，但是南大各州委员会是否继续存在，需参考法律专家意见。王邦文同时指出，“南大的行政改组已经完成，而提高学术水准的工作也已开始，承认南大的问题，预料可在三、五年内解决”。³⁵

王邦文所指的“提高学术水准的工作”就是指南大即将按照王赓武报告书进行有关学制与科目的改革，而南大自 1966 年准备开始实施三年普通学位和四年荣誉学位的新学制，“这三年的时间，正是第一批荣誉学士需要完成他们的课程，然后领取文凭离校的时间”。³⁶ 可以推测，行动党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是按照长远的部署和规划，按部就班地进行。

³⁵ 《南洋商报》，1965 年 8 月 21 日。

³⁶ 《星洲日报》，1965 年 9 月 6 日。

第二节 内外兼顾重组南大

新加坡政府对南大重组采取了内外兼济、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外是向英国大学评议会（Inter-University Council）求助，希望借助该评议会重组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来重组南大；对内则是成立以王赓武为主席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对南大的学制和学科进行检讨。

教育部代常任秘书关世强在 1964 年 11 月 23 日赴伦敦出席会议时，对新加坡政府如何借鉴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重组经验，来帮助南洋大学的重组和发展深感兴趣。英国海外发展部的 D.M.Smith 推荐他联络英国大学评议会的秘书麦士威（Maxwell），因为麦士威两年前曾在香港帮助大学重组。根据 D.M.Smith 的形容，“新加坡政府在最近清除共产主义分子之后，促进南大的教育走上正确道路的努力十分诚恳，应该给予支持”。虽然“新加坡政府拥有教育自主权，但若向英国政府求助仍须通过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因此，D.M.Smith 要求大学评议会给予“非正式的帮助”。³⁷

在麦士威的复函中，证实关世强已经与他见面，关表示“是否可以为南大采取与帮助香港中文大学相类似的措施”，“在最近的大选之后，新加坡政府对南大有着更热切的兴趣，大学开始重组”。就香港中文大学来说，大学评议会与之有着正式的联系，从创建一开始就支持并参与筹建委员会，因此有义务继续帮助香港中文大学。麦士威代表评议会表示，如果新加坡提出要求，大学评议会当然会考虑，但无法预知最后会有怎么样的决定。麦士威并意味深长地指出，他“认为任何要求由大学内部适当的主管当局提出，是十分重要的”。³⁸

关世强在与麦士威见面后一个月回信，表示已经与教育部长（王邦文）讨论过，决定根据麦士威的建议正式行文，向评议会这样的独立、受尊敬的机构寻求协助，提供专业的意见。关世强在信函中希望评议会能够对南大学术人员的资历、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进行评估，提出他们应有何种待遇职位的建议。

³⁷ 英国海外发展部（Ministry of Overseas Development）电文，1964 年 11 月 23 日。英国 Public Record Office, BW 90/554.

³⁸ Maxwell 致海外发展部 D.M.Smith 的复函，1964 年 11 月 30 日，BW 90/554.

南大现有 86 名教员，包括 41 位教授、24 位副教授和 21 位讲师，希望由评议会评估的人员则不超过 60 人，大部分教师来自台湾，拥有美国文凭，一小部分持有欧洲和日本文凭。关世强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将随时提供有关南大的历史背景和新加坡总体情况，教师也已经准备好相关的资料。他同时介绍，本地即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即王赓武任主席的课程审查委员会），检讨现有的课程结构和科目的内容，提出为适应新加坡需要的有关课程结构的建议。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安排委员会与评议会联络。

关世强在信函中指出，显然评议会将扮演的是顾问角色，最终对任何决定和行动负责的将是南大当局本身。但或许在某些时候，将公开评议会是当局咨询对象的事实。新加坡政府希望评议会的评估工作能够在 1965 年 9 月前完成。而且能够越快得知评议会的原则性决定越好，如果决定是负面的话，教育部将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³⁹

虽然新加坡政府主动并且积极地寻求大学评议会的协助，但是评议会始终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在麦士威的复函中，谈到评议会帮助香港中文大学时，称“与大学具有联系和了解的记录，对于进行评估大学是至关重要的，中文大学的校长和学院的院长提供的最初评估帮助很大，如果没有咨询大学的高层职员，对中文大学进行评估是非常困难的。而不幸的是，我们与南大没有类似的个人联络记录，从理事会的角度看，这无可避免地使行动变得复杂”。⁴⁰

麦士威表示，评议会因此认为与南大校长建立直接管道才是实质性的根本，因为没有他和属下各院院长们的协助，评议会怀疑行动能否令人满意地落实。评议会认为新加坡教育部、南大有关当局和评议会三方就评估的范围和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是至关重要的。⁴¹

关世强在一个月后回信，向麦士威介绍黄应荣已于近期被任命为南大副校长和代理校长，称黄自大学建校起即在南大任教，并在此职之前，担任过短期但很重要的大学注册主任。关认为黄应荣是评议会可以就学术事务咨询的最合

³⁹ 关世强致评议会 Maxwell 的信函，1964 年 12 月 24 日，BW 90/554.

⁴⁰ Maxwell 致新加坡教育部代常任秘书关世强的复函，1965 年 2 月 9 日，BW 90/554.

⁴¹ Ibid.

适人选，并且与黄应荣已经就麦士威的建议进行讨论，双方同意评议会评估的范围如下：“评定南洋大学的教学人员的资历、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并向大学提供根据评估所应给予的聘任建议；建议大学在未来不同等级的聘用中所应采取的标准”。关世强同时表示，既然这一措施涉及三方，来往信函应同时附件致第三方，而他已将之前就此事情的来往信函副本交黄应荣参考。⁴²

麦士威领导的评议会对于评定的范围要求修改为“在收到南大代校长有关讲师及以上的教学人员学术资格的评估报告后，根据评估的内容建议大学如何重新调整他们的聘任”。这显然是为了不承担相关的直接责任，评议会不愿如此草率，依据纸上材料进行评估，而将此责任转嫁到南大当局自身。麦士威在解释此修改时就称，曾与关世强讨论过具备当地基本评估的重要性，“因为毕竟一个不在其位的评估者不能够从被评定对象的纸上资料了解他教学有多出色，或是他为大学做出多有价值的贡献。委员会认为必须依靠当地自身的报告”。麦士威同时附上要求被评估者填写的表格，指出“中文系或中国历史系除外，评估委员们都不懂中文，因此需要他们将所发表的论文题目、发表地点翻译成英文，并有英文的摘要”。⁴³

评议会的要求获得了新加坡教育部和南洋大学的同意。关世强并且希望评议会能够在 1965 年 9 月前完成评估，因为如果延迟的话，南洋大学来年的计划就需要修改。⁴⁴ 麦士威表示只要在 6 月收到有关详细资料，就可以在 9 月前完成评估工作。但也表示可能受到所咨询的专家是否出国等类似事情的影响而耽误。⁴⁵

就在新加坡教育部与英国大学评议会就教职员重新聘用和评估的程序进行信函往来沟通时，南大理事会就 1965 年南大财政预算案，已经决定由 1964 年的二百余万元增加到四百多万元，改善南大教职员的待遇，一般上由院长至助教职位都将获得加薪。这一决定由包括高德根、李锦端、魏雅聆、黄奕欢和刘

⁴²新加坡教育部代常任秘书关世强致理事会 Maxwell 的复函，1965 年 3 月 11 日，BW 90/554.

⁴³ Maxwell 致新加坡教育部代常任秘书关世强的复函，1965 年 4 月 13 日，BW 90/554.

⁴⁴新加坡教育部代常任秘书关世强致理事会 Maxwell 的复函，1965 年 5 月 3 日，BW 90/554.

⁴⁵ Maxwell 致新加坡教育部代常任秘书关世强的复函，1965 年 5 月 12 日，BW 90/554.

孔贵五人组成的财政预算小组提议，调整后的薪金为：院长每月增至 1750 元，系主任 1500 元，教授 1100 元，副教授 900 元，讲师 700 元，助教 500 元。⁴⁶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委任王赓武为主席的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经过数月的工作，已经完成报告书，并于 1965 年 5 月呈交，但是新加坡政府一直没有公布，直至 9 月。其原因即便王赓武本人也无法解释，间中又发生新马分家的重大变化，他“不明白新政府为什么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8 月新马分家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时间新加坡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却没有真正执行”。⁴⁷

就现有的资料分析，迟迟未公布王赓武报告书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英国大学评议会负责的教职员学术资格评估工作也是以 9 月为期，王赓武报告书提呈时，大学评议会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而课程审查、教员学术评估、职级聘用都是新加坡政府改善南大学术水准的重要领域，因此需要等大学评议会提交报告后一并考虑。至于 9 月前后大学评议会的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何，由于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对外公布，现有资料亦无法探究其中的原委，但就政府角度来看，同时握有两份不同范围的报告书，更方便其决策，做出其认为正确的判断。

其二，王赓武报告书提呈之后，新马的政治风云变幻对于新加坡的教育政策、社会秩序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那时的新加坡政府是否不愿旁生枝节？或无暇他顾？又或是等待选择最有利的时机？

独立建国后一个月，1965 年 9 月 11 日，南大宣布理事会及教授会已经采纳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对南大学制、南大教学语言的建议等具体内容，本文不会详加论述，而是将重点放在南大当局、学生、华社舆论对报告书的反应，以及其后产生的南大学生与大学当局及新加坡政府间的对立和影响。

王赓武报告书的主要建议内容包括：建议南洋大学建立新学制，除普通学士学位外，增设荣誉学位课程；实行新课程，以使南大能够收容所有国内各源

⁴⁶ 《南洋商报》，1964 年 12 月 8 日。

⁴⁷ <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见刘宏主编《坦荡人生 学者情怀——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 年），页 40。

流教育出身的学生；各学院若干学系应作适当调整，增设马来学系，并设立语言中心，借以提高全体同学作为学习工具的语文程度，适应学习与研究上的需要；建议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为汉学系；提高教师待遇并提供充分研究机会与设备，以提高学术水准。⁴⁸

王赓武后来谈及报告书时，称“报告书的目的是争取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有相同的待遇”，对海外华人的信心也使王赓武认为“不仅要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还希望有些地方比他们更好”，王承认“现在想来可能有些幼稚”，因为“可能当时年纪轻，经验不够，相当理想”。⁴⁹

报告书中重视马来文的学习，王赓武解释是因为“马来亚的母语是马来语，非英语，所以并非殖民地问题，因为已经独立”，“我们的野心是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也成，现在想来真是一个过分的理想，非每人可做到。”但是“语言稍差一点的学生可以至少熟悉两种语言，不是英语跟华语，就是马来语、华语”，王赓武认为问题在于如何适应当时的环境，“不管在商业（英文可能也重要）或在政治上，马来语力量很大，一定要懂。当时我们以为南大毕业生要应付工商业的需要，需重视英文，但要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上服务的话，马来语亦重要”，“提议南大成立语言中心就是希望能鼓励大家多把一、两种语言修好，这个目标能达到的话，南大学生要比其他两所大学好，英、马来语可与他们比，又多一个华语，将来在社会上会更强”。⁵⁰

委员会由新加坡政府委任，因此难免被带上半官方色彩。王赓武撇清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只找几个人去报告教育的情况”，“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⁵¹

王赓武认为报告书有特殊的外部环境，在新马分家之后，“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

⁴⁸ 《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1965。

⁴⁹ 《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页40。

⁵⁰ 同上，页41。

⁵¹ 同上。

大的”。⁵² 王赓武指出，要特别注意两点：“一，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二，不明白新政府为什么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报告书 5 月呈上，8 月新马分家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时间新加坡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却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再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⁵³

王赓武对南大当时与社会需要的结合程度的看法为：“当时一些初到南大的人是由外地来的，非东南亚人，对当地环境不一定了解，有点像关起门办大学的情况，不顾当地的情况如何，所以引起种种问题。我认为大学不应如此”。⁵⁴

王赓武报告书公布之后，对于改变学制，舆论表现出与 1956 年时南大改变学制建议不同的反应。华社有观点认为，南大改变后，今后毕业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比美世界上任何一间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像这种大学教育，当然符合我们大家的愿望，“所需要讨论的只有一点，就是要达到如此美满的境界，恐怕除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外，别无其他途径。反过来说，当一旦以英语为主要媒介语时，南大便丧失原有的特征，变成跟新大和马大没有分别的一间大学”。所以尽管报告书里的许多建议都是合理而且具有积极的意义，应受到欢迎，“只是当年创办南大的基本目标，却在于成功为一间中文大学”。⁵⁵

《星洲日报》的社论则批评王赓武报告书要求“南大的大门必须开向所有各源流学校出身的学生，而且将来的毕业生即使不能精通三种语文，至少也要精通两种”，并提出疑问“政府如果接受关于南大的这个改革建议，将来对于星大是否也准备这样作呢？或者星大则仍将继续留为唯一的清一色英语媒介大学？”，对于报告书中所说“我们承认南大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这方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仍得开设一些科目

⁵² 同上，页 40。

⁵³ 同上。

⁵⁴ 同上，页 45。

⁵⁵ <南洋大学的蜕变>，《南洋商报》社论，1965 年 9 月 13 日。

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社论质疑这是否意味着南大的将来任务就是“甲：收容星大不能收容的英校以外所有其他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的总汇？乙：改造华校源流出身学生，使他们能‘符合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即是要在于能改造他们以英语（或者国语？）为媒介语？丙：除了‘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南大势须由一间华文大学变成英文（或者国语？）大学？丁：所谓反映‘我们的社会特质’，这指的是英语至上？还是真实的多元社会？”

社论称“翻遍了这一份报告书，至今对于这四个问题还未曾求得适当的解答。我们尤其认为遗憾的是报告书中所强调必须‘符合国家的利益’，原文中并无确切说明。这当然不是华语，但是这是指英文？还是国语（巫文）？这个问题是不容含糊的”。⁵⁶

《星洲日报》两天后再次发表社论《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认为王赓武报告书比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都“更进一步，查问到南大的存在的理由”，按照报告书“符合国家利益”的建议，造成“南大课程的调整前提，变成首先在于如何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南大如果按照这个报告书的建议去调整改组，那么，改造之后的南大是否还继续保持为一间华文大学，抑或变成一间配角的英文大学？”⁵⁷

该社论还批评王赓武报告书有违新加坡政府与南大当局在 1964 年达致的六点协议，因为六点协议的第四点内容是“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以前已屡次作此保证，在马来西亚宪法下，新加坡应保留教育自主权，因此，政府将可继续以往平等对待四大教育源流政策”，对该协议，社论质疑委员会“在草拟报告书第二章‘关于语文的建议’的内容时，是否曾予认真考虑？”

社论提出，课程审查委员会认为南大只容纳华文媒介学校毕业生，造就只精通华文的毕业生为“不符合国家的利益”，那么，目前的星大只容纳英文媒

⁵⁶ <南大前途的新展望>，《星洲日报》社论，1965 年 9 月 14 日。

⁵⁷ <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星洲日报》社论，1965 年 9 月 16 日。

介学校毕业生，造就只精通英文的毕业生，这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南大的这种情形既然需要通盘改造，那么星大如何？

对于委员会认为南大此后只能“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讲授媒介语”，社论质疑“这是否是说，将来的南大只有一部分用华语上讲？这些‘仍得’用华文讲授的指的是哪些科目？此外的科目用什么语文讲授？这些华语与非华语讲授的科目比例如何？”⁵⁸

对于王赓武报告书，新加坡英文舆论看法有所不同，有评论认为“一间纯华文的大学在多方面都不合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所以，要想提高水准，南大的学生必须训练使能通过非华语的其他语言听课。委员会因此主张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它建议设立语言中心以便训练南大学生可用多种语文听讲”，该评论进一步主张“把南大由单一语文的大学转变为多种语文的大学，由为一部分人民服务进而为整个社会服务，这需要详细厘定一套办法。而且，这样的改变在逻辑上必须是从中小学阶段起就这样做的”。⁵⁹ 《星洲日报》的社论质疑按照这一发展，“南大如果必须变质，此后则连带所有华文中小学校都必须跟着一律蜕变”。“那么英文源流的中小学以及现在的星大，只以单一语文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民服务，是否也应该接受同样的改造？”⁶⁰

社论认为，报告书的“主要精神似乎是在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因此引用英国政府在 1954 年发表的阿斯奎兹报告书加以批驳：“在各殖民地中，大学教育的最难解决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媒介通常使用英语，而英语又时常并非学生之母语这个事实”，阿斯奎兹报告书还指出，“学生升入大学是否适合，第一件事就取决于他能否掌握教学媒介语。他对于所听讲授必须能明白的心领神会，而自己对于这种语言也能运用自如，才不致妨碍他的学识发展。我们由经验得知，学生为满足此种条件，即使教学用语为其母语已非易事；如为非母语之外国语自然更难”，“（学生所需之）努力不仅为使用此外

⁵⁸ 同上。

⁵⁹ 转引自《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

⁶⁰ 《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

语，而且为学习用此外语思维，这当然了不起。但除非完满的掌握成功，学生不仅将在学习中遭遇困难，即在心理上所引起之混乱也可能是真正有害的”。⁶¹ 社论质疑王赓武委员会是否参考过英国教育专家研究战后殖民地（包括新加坡在内）高等教育时所提出的主张。

对于报告书建议南洋大学实行新的学制，新马两地的毕业生组织也意见相反。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发表声明表示“报告书最令人鼓舞的是建议南大应拟定授予更高学位的计划”，并重申六月间所发表的对黄应荣提及南大建立新学制及授予更高学位的支持声明。⁶² 而马来亚南大同学会筹委会则表示，“南大为一民办大学，一切应公诸民意，理事会应垂注社会各界之反应，不应对一切制度之实施操之过急”。该会指出，“在校长室文告中曾强调该报告书已被理事会及教授会之通过采纳，本会有鉴于事态之严重，曾经通电询南大理事会及校方，请示该报告书之实际内容及如何实施方法，据理事会回告，理事会因主席高德根先生不在，故无法召开会议，至于报告书事，理事会之理事亦是得从报纸上得悉报告书之内容，故无可能有经理事会议通过接纳一事”。

筹委会也对教授会接纳报告书提出质疑，“因南大并无教授会之设立，唯有教务会议，且教务会议亦无通过采用之议决，此事实使本会感到困惑不解”，对于报告书的势在必行，筹委会认为“此事应慎重考虑，不应匆促行事”。⁶³

王赓武报告书在南大校园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1965年10月5日，黄应荣在文学院向该院一、二、三年级学生解释报告书时，“学生曾发出一些声音”，黄无法再解释下去，离开文学院返回其宿舍途中，曾受学生团团围住，表示反对改制，并要求他表明反对该报告书的内容，后来警察闻讯赶至南大。⁶⁴ 根据新加坡警方的文告，“当黄等人离开礼堂不远，而准备进入他们的车时，他们却被阻止进入，而就在这个时候，礼堂里的电光被关掉，一些学生跟随着

⁶¹ 阿斯奎兹报告书，转引自《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

⁶²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声明，《南洋商报》，1965年9月20日。

⁶³ 马来亚南大同学会筹委会主席陈礼嘉谈话，《星洲日报》，1965年9月23日。

⁶⁴ 《星洲日报》，1965年10月6日。

他们，且把他们包围起来，其中一名以一块手帕蒙着面向副校长辱骂，这时与副校长同行的一些人也被石头袭击，其中一名尚被拳殴”。⁶⁵

仅相隔一天，南大再度发生纷乱事件，根据新加坡警察秘书齐来亚所发出的声明，“南大代副校长黄应荣博士，于本月六日下午约七时半，在文学院礼堂中向约共五百名理学院学生演讲，礼堂满座，一些不能找到座位的学生，须站立在走廊两旁，此会议的召开是向学生们解释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建议。当黄博士开始向学生们演讲的时候，那些坐在后面以及站在外边的学生发出嘘嘘的声音，妨碍他的说话。虽则如此，黄博士继续他的演讲，直到下午约七时五十分的时候，一些制造麻烦的学生和几名该大学的职员之间发生纷扰”。有学生被职员指向上抛椅子而被抓住，学生则指有职员用棍子打人，黄应荣结束演讲离开礼堂，而被指用棍打学生的职员林温国（Lim Oon Keok）被助理警监余伟度（Seah Wai Toh）看到被二十多名学生殴打，从礼堂还有一队学生向被打地点去，警察就对空鸣枪警告，学生“都慌慌张张地散开”，最后警察还看到“一小队的学生用华语高唱团结就是力量”。⁶⁶

南大校方其后采取强硬行动，开除了 85 名学生，由副校长黄应荣任主席的南大纪律委员会称“近来显然有一部分学生借题生事，鼓动风波，或扰乱会场，污辱师长，或结队高歌游行示威，破坏纪律，行为恶劣，莫此为甚，察其策动主干，或则曾受大学处分，且均签具保证书、悔过书，有案可稽”。⁶⁷ 在委员会的布告中，并没有公布 85 名学生的名单。

对于校内的游行示威，南大当局处理起来已经比以前少了许多顾虑，增加了权威，行政效力提高，这与 1964 年开始的南大行政重组、清理“亲共反国家分子”的一系列措施密切相关。虽然如此，南大学生仍然在政治立场、国家意识、南大方向、对政府态度以及斗争手法上存在不同集团式的差异，这一点，从南大一些学生团体对王赓武报告书以及学生抗议事件的态度差异可以看出。

⁶⁵ 新加坡警方文告，《星洲日报》，1965 年 10 月 7 日。

⁶⁶ 新加坡警察秘书声明，《星洲日报》，1965 年 10 月 8 日。

⁶⁷ 南洋大学纪律委员会布告。《星洲日报》，1965 年 10 月 23 日。

与南大校方将事件定为“破坏纪律”性质不同的是，一些团体进行政治上的解读与定性，南大毕业生协会和南大学生联谊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极端分子”。南大毕业生协会指称“在南大校内的少数极端分子利用报告书从事捣乱骚扰，制造了所谓‘一〇五（十月五日）及一〇六（十月六日）事件，然后由某政党的机关报以传统的方式大加鼓吹与渲染，希望能藉此混淆社会人士的视听！”。南大毕业生协会的声明不点名地批评社会主义阵线，称“大事渲染，加油加酱，歪曲事实地刊载南大事件，对南大的尊严和南大同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声望是只有产生极其不良的效果。为了同学的良好发展，为了同学的光明前途，我们不希望任何阵线的政党在南大校内制造事件，从中捞取政治资本！老实说，企图把一间由人民血汗钱兴办的高等学术机关搞成政治骚乱的温床，那未免太残忍！”⁶⁸

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指责“一部分极端疯狂分子又再兴风作浪，借题滋事做绝望的挣扎”，“早就计划破坏这次的会议，他们知道这次会议若召开成功，南大从此将向学术大道迈进，这批极端疯狂分子将无法在南大立足，因此，他们在事前是有计划的阴谋，要乘机制造骚乱事件，破坏学校纪律，企图使南大的名誉受到玷污，使社会人士对南大的信心动摇，此种居心之恶毒令人切齿”。

学生联谊会指“事后一些亲共的学生团体竟然在某政党报上发表声明，歪曲事实，企图为亲共分子洗刷在南大校内所干的残暴罪行。事实上是黄代副校长及其他师长们被他们抛掷石块击伤，他们这种含血喷人逞凶反噬，企图蒙骗社会人士”。联谊会表示“不能容忍少数害群之马继续在南大为非作歹，坚决要求校方采取纪律行动，严厉制裁滋事的极端疯狂分子，彻底把他们从神圣的学术机构清除出去！”⁶⁹

南大经济学会筹委会也发表声明“谴责极端分子企图破坏校誉”，批评“部分极端分子毫无顾忌的借题滋事，乘机制造骚乱事件，企图使社会人士对南大的信心动摇”，该会也批评“校内生物、化学、物理、数学四学生团体，

⁶⁸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声明>，《星洲日报》，1965年10月15日。

⁶⁹ <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声明>，《星洲日报》，1965年10月15日。

竟然在亲共的政党机关报上发表声明，企图以歪曲事实来混淆社会人士的视听”。⁷⁰

马来亚南大同学筹委会与南大毕业生协会、学生联谊会和经济学会观点有所不同。对于所谓“极端分子”，该会认为是学生“一时的冲动”，对“某些政党在本月五日及六日在南大校内发生的骚扰事件中，大事渲染及企图将改制问题变为政治斗争问题一事，表示遗憾”，该会表示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政党将南大问题作为政治资本。南大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机关，它绝不容许任何政党控制”。对于王赓武报告书，马来亚南大同学会筹委会批评为“与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龄报告书提出之前都有充分的时间让南大理事会、教务会议、校外热心教育团体及社会人士研究过”相比，王赓武报告书没有做到。筹委会意有所指地指出，“任何激烈的沙文主义的概念，将毫无留情地被摒弃于南大门外，任何企图保留殖民地遗留下的毒素，也将被铲除”。⁷¹

南大校园内的学生团体，一些更采取激烈的批评态度。1965年10月26日，南洋大学十个学生团体，包括中国语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合唱团和戏剧会，发表长篇幅的《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虽然“不否认报告书某些值得参考的地方，然则，我们不能同意报告书总的精神实质，它不只严重损害到南大的健全发展，故意违反南大创校的宗旨，更恶毒地企图以此来摧毁华文教育”。《备忘录》认为王赓武报告书与白里斯葛和魏雅聆报告书“在进行损害民族教育方面原来是一脉相承，变本加厉”，因此呼吁人们“决不能被报告书中某些好看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忽略了藏在这种烟幕中丑恶的本质。否则，对民族教育，对南大前途都存在着极不利的后果”。《备忘录》明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以漂亮词藻装饰而成的《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因为它企图变质南大与摧残民族教育”。⁷²

⁷⁰ <南大经济学会筹委会声明>，1965年10月16日。

⁷¹ 《马来亚南大同学会筹委会声明》，1965年10月19日。

⁷² 南大十学生团体《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1965年10月26日。

《备忘录》指责报告书是“政府全面控制南大后推行其变质南大的立言基础”，“政府为了达到其控制南大、变质南大、消灭教育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备忘录》认为，课程审查委员会的组成，是“不符合正常手续与不合理的”，因为“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是在副校长被迫辞职以后组成的，其工作仅限于维持新校长上任前过渡时期的学校行政，因此，它并非南大权力机构，也根本无权组织课程审查委员会来处理课程问题”。

对于报告书提出的改变学制的建议，《备忘录》认为“新学制主要目的在破坏南大完整学制的体系，把南大统一在星大的体制中去。但是，星大是一间英文大学，而南大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一间华文大学，这事实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一般仇视民族教育，推崇英文教育的学者的不快”，报告书提出的荣誉学位的安排，“很明显地成了加速南大英文化的催化剂”，《备忘录》认为“新学制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荣誉学位本身，无疑成了淘汰学生，造就少数‘贵族学者’的手段，这是根本违背南大的创办宗旨”，因此“反对旨在阉割南大完整体系的毒辣手段”。

《备忘录》也对报告书中有关入学资格的规定、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为汉学系均加以抨击，并对报告书中一些提法斥之为“谬论”，包括“我们社会的特质应该在任何一间为此社会服务的高等学府里反映出来”、“南大至今仅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等。

南大十个学生团体的《备忘录》将报告书与行动党政府一直对南大校政的控制与干预联系在一起，称“星马政府共谋接管南大，撵走敢于出面讲话，坚决维护南大纯洁性的理事和副校长，开除并逮捕数以百计的南大在籍学生，颠覆南大校政和南大学生组织；粗暴无理的纪律处分，已使云南园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大学基本的自主权利和学术自由权利已丧失殆尽”。而“报告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行动党政府藉以变质南大的立言基础，也是它颠覆华文教育体系的极其严重的步骤”。⁷³

⁷³南大十学生团体《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1965年10月26日。

南大十学生团体强烈质疑和批评报告书的政治意图，并直接抨击行动党政府的南大政策，这也使报告书的学术色彩淡化、政治背景加深。对报告书立场的差异，正是南大学生团体对行动党政策的怀疑和不满、对南大地位的忧虑、对南大在国家建构中的角色和特性与政府相左的体现。因为报告书而引发的抗争和学潮，是新加坡独立建国后的首次学生运动，行动党政府的强硬处理，也昭示了南大内部的学生抗争能力将越来越弱化的趋势。

根据新加坡警方的说法，被南大校方宣布开除的 85 名学生，“获得一小部分其他大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在 1965 年 10 月 29 日，警方接获情报，被开除的南大学生与支持者，意图召集群众，在市政厅前举行示威集会，集会发起人并未向警方申请集会准证。于是警方采取防范步骤，派出警察在数要点防备。“约两百名学生在由美芝路向海山街”进发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发射四颗催泪弹驱散群众，有两名学生被拘捕，其中一人是被开除的学生。⁷⁴

被开除的学生曾接到南大副校长的通知，限定他们于 10 月 30 日中午前离开学校。但有约 29 名学生继续留宿在校内宿舍里，“因而副校长即要求警方协助校方，把这些学生逐出校园”。警方 30 日晚间进入校园，“有一些不守纪律分子发出怪声，及向警队抛掷石块与玻璃瓶”，后来更有舍监办事处被破开并纵火焚烧，扑救时“遥对宿舍内有一百五十名顽抗学生，频对警方喝倒彩及怪叫”。⁷⁵

南大学生随后展开罢课活动。由“南大同学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于 1965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南大同学罢课宣言》中称，“我们南大同学以最沉痛的心情、最大的愤慨、最坚定的决心向一切关怀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庄严宣布：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成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宣言》称“同学受迫害已经达到极点，南大被变质的危机已经空前严重，民族教育的生存更是岌岌可危”，指“军警暴徒已经占据了整个南大，特务爪牙已经密布整个神圣学府。行动党政权企图以新闻封锁来堵住我们的嘴，企图以

⁷⁴ 新加坡警方声明，《南洋商报》，1965 年 10 月 30 日。

⁷⁵ 新加坡警方声明，《南洋商报》1965 年 11 月 1 日。

警棍、催泪弹、枪尖来吓退我们”，并指出“学生生活辅导处是行动党的特务机构，南大纪律委员会也仅仅是行动党迫害同学的工具。这两个机构，已经犯下滔天大罪，我们完全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我们更不能承认纪律委员会对同学迫害的任何决定”。

因此，罢课学生誓言“绝不允许同学继续受迫害！绝不容许王赓武报告书变质南大！绝不容许南大理事会、社会人士、南大师生不被放在眼中！绝不容许华人社会被侮辱！绝不容许民族自尊心受损害！绝不容许行动党把南大沦为它的党校！”

罢课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南大当局应听取公意，拒绝接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二，任何有关南大的改革，都应在不违背南大创校宗旨，不改变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为前提；三，大学当局应即刻无条件撤销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不合理敕令，并保证今后不再无理处罚任何同学”。⁷⁶

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针对南大罢课的事件发表声明，支持校方开除 85 名学生，称“去年改组以来，政府及南大当局费尽苦心，才把南大从亲共反国家分子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朝向纯粹学习机关的康庄大道迈进，尽管还有一部分不良分子继续在南大求学，但是他们都是经过政府当局警告或受大学当局处分之后写了保证书和悔过书，大学当局以宽大的态度对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专心向学，同学们也希望他们迷途知返，完成学业。不料他们却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仍然存心找机会藉故生事”，当大学当局采取纪律行动后，“连日来他们的行为更加猖狂，先是在十月二十八日鼓动少数支持者和他们一起在学校中开大会，提要求，游行示威，继则在十月二十九日成群结队，到市区内游行示威。但是疯狂极端分子，却找不到足够的支持者，若到坡底游行，队伍不够‘壮观’，面子下不了台，因此他们便向某亲共政党借群众，以充当南大学生，鱼目混珠，混水摸鱼。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社会人士，说他们的队伍是‘强大的’。如被警方拘捕的示威者和贴标语者多不是南大学生”。⁷⁷

⁷⁶ 南大同学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南大同学罢课宣言》，1965年11月1日。

⁷⁷ 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声明，1965年11月4日。

对于南大内的罢课事件，学生联谊会批评“极端疯狂分子已经像一群野兽一样，他们发动所谓‘罢课’，但得不到多数同学的支持，他们孤立无援时索性将正在课室上课的同学施以威胁，将课室的黑板涂上红漆，把所有的课室锁头弄坏，不让工人开启”，学生联谊会针对此“严正指出，社会人士对你们的背景和所作所为是了如指掌，你们只不过是把一九六一年中四罢考的事件搬上南大重演而已，所不同的是地点，而演员和导演却完全一样”，⁷⁸ 暗指两次事件有相同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

新加坡“治安当局”则公布，在 11 月 3 日晚上八时后，警方设于南大大门的检查站，“曾经阻挡了四十八名企图进入南大校园的社会主义阵线人员。稍后，又有人避过了检查站，抄小路潜入校内，并与学生们取得联系”。到晚上十点多，“有大约一百二十名的学生，列成队伍，从校内浩浩荡荡开出校门，步行至裕廊社阵支部”，⁷⁹ 显示南大学生罢课事件与社会主义阵线有着密切联系，社阵也涉入南大校园。

南大副校长黄应荣发表文告，称“部分学生不满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认为将使南大变质，横肆抨击，危言耸听，实则断章取义，以误传误，一孔之见，不尽不确”，黄认为“教学媒介语与鼓励兼习外文，原为二事，岂可混淆不清”。就现状而言，南大“大部分学科之课本及参考书，皆已采用英文原版，若言变质，则早已变质矣。既用其书，而又不愿深解，不思精进，故步自封，而美其名曰维护民族教育，恶口作梗”。黄应荣质疑“辄吹毛求疵，摇唇鼓舌，果何为者”。⁸⁰

南大学生的集会，得到社会部分力量的响应，形成内外呼应之势，这也正是政府最为担心的。除警方公布的社阵涉入南大外，“根据有关方面的消息”，在 11 月 11 日晚间，南洋大学学生楼曾有一个慰问南大学生的集会。约莫有三、四百名在校学生参加了这个集会，而为数三百名的校外人士也到场慰问他们。这三百名人士分乘五辆包租巴士赴会。会上，新民及应新校友会曾表

⁷⁸ 同上。

⁷⁹ 《南洋商报》，1965 年 11 月 5 日。

⁸⁰ 南大副校长黄应荣文告全文，《南洋商报》，1965 年 11 月 12 日。

演余兴节目。这三百名校外人士属于二十七个校友会的代表，由“南大事件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九个校友会：晋江、崇正、培青、宏文、光洋、三山、爱同、彰德、崇福。除校友会代表外，社阵及“沙都”工会的代表，也曾参加慰问学生。⁸¹

十天之后，包括新民及应新在内的十一间校友会因为“被指曾发现积极涉入不良活动支持最近因八十五名南大学生被开除而引起的学生骚动”，⁸² 被政府解散。《南洋商报星期刊》刊出的新闻照片显示，其中之一被解散的爱同校友会会所的窗口下，就悬挂着布条标语“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将南大变成英文大学”。⁸³ 社会事务部的文告称“这些校友会曾被发现积极牵涉不良活动，支持最近因为八十五名南大学生被开除而引起的学生骚动”，“这些校友会的活动，完全不符合各该团体的宗旨”，“新加坡人民必将体识到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以便保证凡容许本身改变其合法目标，被利用于亲共活动的团体，概不准继续给一些叛逆的煽动分子们一种掩饰”。⁸⁴ 十一间校友会解散之后，又有 21 间华校校友会受到社团注册官警告，“不得为十一间经被取消注册的校友会属下人士利用，作为他们进行暧昧活动的掩饰”。⁸⁵

十一间校友会取消注册后，会员和其他校友会的会员于 11 月 24 日下午，集合在福建会馆、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和新加坡车业工友联合会外，手持标语布条向政府大厦游行。警方称“他们并没有申请警察准字举行此项游行”，加以驱散，并逮捕 32 人，“其中有些是来自被吊销注册的校友会，以及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书报印务业工友联合会、欧人雇员联合会、新加坡商店职工联合会的四名执委，以及社阵红山支部秘书”。⁸⁶

这 85 名被开除的学生中，有 43 人是马来西亚人。1966 年 4 月，新加坡政府宪报公布，副总理杜进才援引移民法令，下令永远禁止这 43 人进入新加坡。新加坡解释原因时表示，“1965 年 10 月至 11 月，南大学生的一些鼓动份子，

⁸¹ 《南洋商报》，1965 年 11 月 13 日。

⁸²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5 年 11 月 21 日。

⁸³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5 年 11 月 21 日。

⁸⁴ 新加坡社会事务部文告，《南洋商报星期刊》，1965 年 11 月 21 日。

⁸⁵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5 年 12 月 1 日。

⁸⁶ 《南洋商报》，1965 年 11 月 25 日。

半数以上是来自马来西亚，他们藉口反对南大课程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企图阻止南大改组工作。他们侮辱、袭击副校长以及校方职员，并焚烧舍监的办公室，毁坏校方财产，校内墙壁涂以红漆，做出任意胡为的举动。85 名学生鼓动者，43 名系来自马来西亚，因为这种无纪律行动，遂被南大开除。新加坡政府支持南大当局所采取的行动，认为应当维护纪律，故此按照移民法令第九条文规定，下令禁止这 43 名马来西亚学生进入新加坡共和国。此外尚设法禁止被开除学生，在该新学年度始业时进入该校园范围”。⁸⁷

据一些南大学生回忆当初的罢课情形，称“开始的时候，支持学生会的中坚分子四处张贴标语和悬挂布条，号召罢课抗议，并在各学院进行纠察。大部分同学抱观望态度，静观其变，少部分同学则照常上课，引发至不可收拾，是军警人员在校园里的嚣张态度造成的”，“军警拿大藤条乱打人的消息，使炽热的情绪火上加油，大家干脆不去上课，无声抗议”，还有南大学生认为“大罢课持续了一个多月，政府实行新闻封锁，报章上不见任何报道。南大同学亲自到坡底的大街小巷，广贴‘南大罢课’的标语，突破封锁”。⁸⁸

南大校园内在 1965 年 10 月、11 月间围绕王赓武报告书引发骚动，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就引起政治局势动荡，对政府造成挑战，对社会并无益处，因此虽然政府采取强硬的态度对待，仍需要适当地对南大的地位进行重申和保证。李光耀在 11 月 12 日与南大三位理事高德根、陈锡九、黄奕欢会面，“讨论有关政府对南大及其教学媒介语的政策”，李光耀表示，“政府决遵守 1964 年 6 月 5 日由政府代表易润堂先生及李炯才先生二人与南大理事高德根、陈锡九、黄奕欢先生所签定的协议。该协议的第四点的明文是‘新加坡政府重加保证华文将继续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前此，政府曾经一再作此保证。在马来西亚宪法下，新加坡仍保留教育自主权。因此，政府可以继续实施以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现行政策’”。⁸⁹

⁸⁷ 新加坡政府文告全文，《南洋商报》，1966 年 4 月 10 日。

⁸⁸ 许万忠<大罢课>，1991 年 12 月 15 日。转引自《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页 390。

⁸⁹ 《南洋商报星期刊》，1965 年 11 月 14 日。

李光耀的表态为其后政府与南大就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事宜商谈奠定基调。在三天的谈商中，每天都对外发布联合声明，11月15日首次会谈后，双方发表声明，“一，开会时，政府代表指出总理已经声明，新加坡虽已独立，但政府仍然继续遵守政府与南大理事会双方代表于1964年六月五日发表之联合声明所保证之原则及精神，并重新保证该联合声明中之第四条协议。该协议如下：‘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之教学媒介语’。政府代表在今日之会议上也再三的保证，南大将永远成为独立新加坡国家之华文大学，并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南大代表对于这一点，皆表示满意。二，本委员会将详细研究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视其是否符合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联合声明之原则与精神。委员会认为欲使该报告书符合上述声明之原则与精神，则凡欲进入南大之各源流学校之学生，最低限度必须通晓华文。如此，南大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一间华文大学。本委员会将继续研讨该报告书，以便使南大课程问题早日获得解决”。⁹⁰ 在南洋大学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谈商第二天，则发表声明“吁请社会各方面人士，勿在现阶段下，把南大问题扩展为政治问题”。⁹¹

新加坡全国职总主席何思明也针对南大事件发表声明，称“南大问题乃一项行政问题。它不是语文问题，不是文化问题，甚至不是政治问题”，何思明认为，“白里斯葛评议书、魏雅龄报告书和最后的王赓武建议都是要矫正行政上的缺点，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这三个人为偏袒或反华人。因此，这是一个行政的问题，办理一间大学乃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工作，而决不是感情的问题，它绝不能由游行、标语或午夜在巴士站涂鸦所能寻得解决办法”。⁹²

在结束三天后的谈商后，双方代表对报告书可能引起的误会之各点均加以澄清，公布商谈最后之结果：

一，南洋大学将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二，南洋大学将配合政府平等对待四大源流之教育政策，收容来自四大源流教育之学生，然因南洋大学之教学媒

⁹⁰ 《南大联络委员会声明》，1965年11月16日。

⁹¹ 《南洋商报》，1965年11月17日。

⁹² 职总主席何思明文告，《南洋商报》，1965年11月19日。

介乃以华文为主，故凡欲进入南大之学生，最低限度必须通晓华文，以便他们在南大能接受教导。三，理事会代表们亦支持政府之政策，即大学毕业生应最少通晓一种华文以外的其他语文。四，凡受课程变换影响之学系，即现代语文学系，教育系及化学工程系，其在籍学生，将可继续在旧学制下完成其学业。五，为了使南洋大学受到人民的尊重，我们必须支持南大当局维持其权力及纪律。南大必须造就人才负起建国任务，并引导国家走向安定及繁荣，才能使人民对它的前途有信心。六，本委员会重申 1964 年 6 月 5 日双方所达成协议之基本原则及精神，并籍此解决一切未来之问题。⁹³

教育部长王邦文针对王赓武报告书提出看法，认为“这是南大未来发展的最大关键，只要南大能够依照报告书的各项建议，循序渐进，逐步改善，学术水准达到普通的程度，有关承认学位问题当可以迎刃而解”。⁹⁴

王指出，南大是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可是我们必须了解新加坡乃是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文的国家，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及英文都是平等的官方语文。虽然华文将永远作为南大的主要教学媒介，毕业生如果能够通晓本国的其他一两种官方语文，对学生以及国家都比较有利”。王明确指出，“政府及公众人士的恳切期望，不外是要使南大能够更好地适应一个正在各方面发展中、迅速趋向现代化的多元种族国家的需求”，因此，王赓武报告书中“最现实的一项改善工作是语言中心的建立，以最有效的教学法，在最短时间内使学生掌握所需语文知识”，但是“有些人把这种基于实际需求以及符合多元种族国家政策的语文教学媒介略予改善的措施，曲解为使‘华文大学’变质为‘英文大学’，已导致新的纷乱，亲共分子又乘机重新掀起目前的不良状态，伤害南大的未来发展前途”。

因此，王邦文希望“有识之人士应当对国家政策与南大前途兼顾，认清作为一个新兴的多元民族国家，自然希望高等学府能够培养更多使用一种语文以上的专业人才，为这个多元民族国家效劳，不希望这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未来公民，从小学至大学受完十六年教育，还是仅仅懂得使用一种语言而已”。

⁹³ <南洋大学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与南大代表联合声明>，《南洋商报》，1965 年 11 月 18 日。

⁹⁴ 王邦文<南大向前迈进>，《星洲日报》，1965 年 12 月 2 日。

对于政府对南大的资助，王邦文将其与报告书的落实情况结合挂钩，“在南大当局采纳和实施报告书的建议之后，每一改善阶段所需的经济资助，政府也将会不断增加，以应南大的实际需求”。⁹⁵

南大今后的定位是华文大学还是英文大学？虽然行动党政府多次保证南洋大学华文大学的性质不变，但是南大转变为英文大学的趋势和目标却早已确立。行动党政府的一位前官员就表示，“有识之士当时也预见，南大如果要真正发展，必须步入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道路。一间大学要进步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新课本、新课程的供应，同时也必须要有新一代的教职员接班。但这两方面的诉求对南大都不存在。中文教学如果只是文史哲也许还混得过去，但在数理化科学方面就根本不可能”。⁹⁶ 但是，“政府当时没有刻意引进英文作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所以没有时间表，我们只是意识到南大由于受到课本、课程和师资的限制，必定会走向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道路。当时的想法是，与其强迫施行，不如由南大作自然、不得已的接受”。⁹⁷

⁹⁵同上。

⁹⁶ 行动党政府前官员与作者的电邮，2005年3月22日。

⁹⁷ 行动党政府前官员与作者的电邮，2005年3月23日。

第三节 南洋大学实现国家化

大学在国家体系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曾有大学主管认为“在发展阶段，大学的‘主人’就是政府。大学的角色就是帮助国家实施由政府制定的发展计划，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温顺而在知识上有所裨益”。而作为学术机构，“如果不符合、就应该去遵循由政治领袖所代表的社会意愿”。⁹⁸

在大学需要依赖政府资助或是政府开始愿意资助大学（正如南洋大学的例子）的时候，也意味着政府或是政治领袖将更多地参与大学进展的决策过程。在大学和政府关系上，政治领袖的风格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将是最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而国家所处的地理、区域、政治环境，也对大学与政府关系，或者说政府如何决定大学的角色产生影响。比如新加坡城市国家的定位、吸引外来投资的迫切，其生存有赖于“促销”其他国家对新加坡服务的需求，⁹⁹ 因此对技能和专业人才（大学培养出的结果）有着生存意义上的需要。

即便如此，大学在新加坡发展中虽然具有重要的角色，但此时乃至其后一段时期，大学与政府规划者的关系仍是单向和间接的，即大学对新加坡的贡献仍是由政府主导，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机制让大学与政府规划者一起交换观点、制定发展规划，以及随时监督计划进展。¹⁰⁰

从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角度看，政府急需将南洋大学纳入国家体系，以“帮助国家实施由政府制定的发展计划”，在这一吸纳过程中，也必然产生文化、族群、语言上的改变与重组。

⁹⁸ 天主教大学联合会的 Rev. Father Torralba 的评论，见 Seah Chee Meow & Soeratno Partoatmodj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Case Studies: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Singapore: 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9), 3.

⁹⁹ Seah Chee Meow & Soeratno Partoatmodj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Case Studies: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3,7.

¹⁰⁰ Toh Peng Kia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lanner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Singapore". in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Yip Yat Hoong. (Singapore: 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1), 51.

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兴国家，执政的行动党政府需要在国家建构中以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主导方向，而在“建构国民国家的过程中，必然也要试图想像和建构超族群的文化，这样，国内族群文化的边界、分类和解释框架，自然要发生不断重整”，“国民国家总是以某种中性的形象出现，努力用国民性代替族群性，增加人们的自愿性，使之归属感合为一体，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自然习性’”。¹⁰¹ 从这一角度看，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环境中，不具种族性的英文，就成为行动党政府“中性”的选择，代替族群性的社会分化，当然这其中还有行动党精英阶层普遍受英文教育以及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依赖西方的功利性考虑。

南大华文大学的特性与这一目标具有根本性的矛盾。作为政权的执行者和社会的管理者，行动党政府需要缩小国民性与族群性、个人与群体、自愿性与归属感、族群与种族、民族等现象和观念间的对立和对抗，实现全国范围的现代化国家建构总动员。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难以逾越的矛盾，那就是一种族群的话语来对抗另一族群的话语，迁民社会在被改造的过程中，这种对抗也会造成极具能量的反弹。如果说行动党政府在改造南洋大学以及全国教育制度和语言体系的过程中，尝试消弥或削弱这种族群话语的对抗性，那么，采取双语制或者母语与官方英语并重（其实总有偏废，但至少在形式和宣传上满足了需要）的政策，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这一角度看，在这种方式的国民国家现代化总动员中，“获利最大的总是那些族群精英，因为他们往往是双语人或者多语人，是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者，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知识、关系及其社会地位，使他们很容易代表本族群从政府获得各种物质和符号的资源”。¹⁰² 而行动党政府一旦达成对南洋大学的语言改制目标，南洋大学一方面淡化了华文大学的符号，另一方面，其毕业生作为族群的精英代表形象却将可以进一步加强（因为政府主导了这一形象的建设过程），在容易获得政府各种资源的同时，也可以实现行动党政府培养符合国家建构目标的人才的结果。

¹⁰¹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页 40。

¹⁰² 同上，页 42。

除了宏观的国家发展方向外，从微观的政策运作和经济发展，行动党政府也需要大学及其他教育高等学府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仅仅做为思想的阵营和人文的熏陶。另一所华文教育背景、创办于 1963 年的义安工艺学院就称自拟定计划之日起，就“要使本学院的各种设施与星马立国的政策以及当前社会的需要密切配合”，而在“新加坡的工业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政府正在采取急遽的步骤，改革当前的学校制度”下，义安工艺学院将“配合政府的新教育政策，适应新加坡工业发展的需求”。¹⁰³

新加坡迈入建国道路，行动党政府通过完成对南大行政当局的重组以及课程学制的改变，逐渐加强对南大的控制能力，引导南大符合行动党建国理念的方向，也在这一进程中，以正式承认南洋大学学位，实现南洋大学的国家化。在重要的两个步骤开始落实后，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态度和政策宣示，出现逐步的细节微调，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南大国家化的进程。

南洋大学这一国家化的进程，也有学者从霸权理论的角度加以阐释。根据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即统治者在建构统治权力时必须吸纳、改造——而不是消灭——被统治者的文化及社会组织，使它们转化为有利于维持既有的宰制关系。这种统治的手法称为霸权。而新加坡政府在改造南大的过程中，为解决国家权力形构的矛盾，采取的对策是“没有文化让步的组织吸纳”(institutional incorporation without cultural accommodation)，将南洋大学从一所私立大学吸纳转变成为受国家资助及管制，然后着手压抑南大的华人文化及激进的意识形态。¹⁰⁴ 然而，该论述忽略的是，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吸纳转变，“压抑南大的华人文化及激进的意识形态”并非其结果，而是吸纳和转变的手段，本论文在前面数章中对新加坡政府的南大政策的论述中已经证明了这一过程。

¹⁰³ 义安工艺学院前院长刘英舜 1968 年谈话，见《我与义安》（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出版委员会，1970 年），页 7。

¹⁰⁴ Ting-Hong Wong, *State Formation, Hegemony, and Nanyang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1953 to 1965*, 《教育与社会研究》创刊号(台湾：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暨社会学研究所，2000/12), 59-85。另见 Ting-Hong W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2)。

1966 年 5 月，南大理事会主席高德根去世，陈锡九接任理事会主席。在 1966 年 5 月底的南洋大学第七届毕业典礼上，陈锡九呼吁“各届人士仍本过去爱护南大的精神，继续支持南大，以使南大在学术发展上更有辉煌成就”。¹⁰⁵ 教育部长王邦文致词时表示，“南洋大学自从创办以来，历经过许多风波，由于亲共分子的把持与利用，几乎使这间最高学府变成亲共分子进行反国家政治斗争的堡垒。1964 年 7 月间进行改组以及实施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后，南大才开始上轨道。1964 年改组，可以说是使南大从政治的漩涡中摆脱出来，恢复了纯粹学术机关的真面目。同时也使它发展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能够适应多元种族社会需求的大学”。¹⁰⁶

新加坡政府与南洋大学曾在 1964 年达致协议，第四点是“新加坡政府重加保证华文将继续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前此，政府曾经一再作此保证。在马来西亚宪法下，新加坡仍保留教育自主权。因此，政府可以继续实施以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现行政策”。饶有深意的是，协议第四点的内容虽然保证“华文将继续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后面的“政府可以继续实施以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现行政策”却蕴含双重内容。既可以视为对南大华文教学媒介语的支持，亦可以作为政府对南大推行华文教学的一种“牵制”，由于需要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因此华文教学就不宜突出。这亦为未来新加坡政府促使南洋大学走上英文大学的道路埋下伏笔。

在 1966 年南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就没有再次强调华语继续为南大教学媒介语，而是指出，“回顾过去和现在，有许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种族思想、语言问题以及宗教信仰，往往会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酿成流血的悲剧”，而这些都是“由于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新加坡四种语文同列为平等的官方语文，因此，“在新加坡不会由于种族、语文以及宗教问题，酿成政治悲剧。新加坡永远扬弃一种种族、一

¹⁰⁵ 陈锡九致词全文，《南洋商报星期刊》，1966 年 5 月 29 日。

¹⁰⁶ 王邦文致词全文，《南洋商报星期刊》，1966 年 5 月 29 日。

种语文、一种宗教的狭隘思想，新加坡绝不容许任何种族沙文主义思想从中作祟，破坏多元种族和睦共处团结合作的稳固基础”。¹⁰⁷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是“教育的方针在于使我们的下一代具有坚强的国家意识与多元种族概念，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文，适应多元种族社会，大家在没有语文障碍的情况下，团结一致为国家建设而努力。因此，政府当局不但推行以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开明政策，而且进一步以第二语文为各源流学校的必修科。这种健全的教育制度，将为多元种族国家奠定稳固的基础，也可以作为其他多元种族国家的模范”。

王邦文对南大提出要求，“基于这一原则，作为我国的高等学府，不管是南大或是新大，都应该随时照顾我国社会的需求与进展而能及时地作适当的调整，从而使其毕业生能跟上国家社会的进展而毫无隔膜地服务人群。一间不顾现实需求的大学，其所造就出来的毕业生不是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就是因学不致用而遭社会所淘汰”，而新加坡是一个新兴的小国家，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看，“担当不起人材与公款在这方面的损失与浪费。因此，我们的教育政策定要确保政府在花了大笔教育费用所培养出来的人材，个个都能各尽所长，在建国的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¹⁰⁸

对行动党政府而言，在国家建构之初，正需要大批能够适应及了解社会情况的大学毕业生的服务。因此“大学当前的任务应使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能够有创造性地去处理社会的问题，分析它及解决它。质言之，本地的大学毕业生都应该具备实际的工作能力”。

王邦文的谈话显示了行动党政府对于大学教育以及大学毕业生的目标与方向。国家多元语文、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没有语文障碍的政治生存现实，决定了南大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势必改变的命运；培养国家急需的实用人才、避免资源浪费的要求决定了政府势必强势干预课程和学制规划的制定。南洋大学的教师征聘工作就在此时大规模展开，“刊于世界各地的征聘广告已经带来了

¹⁰⁷王邦文致词全文，《南洋商报星期刊》，1966年5月29日。

¹⁰⁸同上。

许多申请书，有不少在其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原本南洋大学的在职教职员也需要重新提出申请。¹⁰⁹

行动党政府对于大学教育与国家生存的关系，有一番从语言政治、人才储备乃至东南亚区域关系等角度立足的考虑。在由政府捐助的南大图书馆落成典礼上，李光耀发表谈话，透露新马分家后，行动党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教育，培养有才能、体格好的下一代，维持国家的安存”。他对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提出要求，“我认为新大今后必须做到使他们的学生对当地社会的真实情况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因为新大目前的教育内容并未完全反映当地社会与人民的趋向，而南大也必须做到使学生们更多地懂得东南亚全盘局势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的青年，才能符合我们的需求，只有在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的时候，南大与新大才有存在的最高价值”。¹¹⁰

南大的学生之所以要“懂得东南亚全盘局势的来龙去脉”，是因为南大有着华文大学的性质以及华族学生为主的背景，而因此与东南亚华人生存环境和区域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李光耀指出“你我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和主人，今天在这里的你我却都是华族的后裔，我们都晓得十年来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许多华侨遇到了重重的迫害，许多华裔受到了种族不同的歧视，有些华族人士甚至还面对死亡与驱逐的威胁！只有在新加坡的华裔，才能保持安全与自尊的地位”。李光耀认为其中“唯一的原因是，我们认识现实，对东南亚现实曾经做过一番非常准确的估计，否则今日新加坡的华裔，包括南大，不可能享有目前的安宁”。¹¹¹

李光耀试图化解华人社会内部受英文教育与受华文教育的矛盾与鸿沟，从而缓解受华文教育者争取华文教育地位的诉求与抗争。因为这一矛盾和鸿沟在东南亚整体华人社会的生存环境下将不复存在，“既然你我都是华裔（虽然我们之间有受中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分），我们彼此的命运还是无法分开的，如果华裔必须遭受痛苦与危险，你我都一样难逃劫运”。

¹⁰⁹同上。

¹¹⁰ 李光耀演讲词全文，《南洋商报星期刊》，1966年10月30日。

¹¹¹同上。

李光耀保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加坡是不会有危险的，华族的地位、华文教育及华族文化都不会有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地以逻辑来思考，不要再运用过时的旧口号来讨论问题”。

李光耀希望南大当局认真研究他对南大和新大学生的要求，“赶紧起来部署一切，以应付未来的挑战，使南大将来在东南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学术研究中心”。¹¹²

对于李光耀的谈话，华社舆论认为李光耀所寄望于南大必须负起的使命应该包括三点：“一是制造健全的头脑——补充华人社会过去没有自己的母语高级学府时代之‘有勇无谋’，甚至把南大办成功一个在全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学术研究中心；二是制造健全的人格——它所制造出来的人才，不单是人才，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绝对不是奴才；三是这样的非奴才的人才必须有健全的体格——能够执干戈以卫社稷，而不能像过去的殖民地时代一样只是‘弱不禁风’的白领阶级”。¹¹³

《星洲日报》的社论认为南大刚好正符合它最迫切的需要，一是“未曾丧失母族文化传统的华人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才”，二是“在一个刚从殖民地解放出来的国家办教育，比制造人才更要紧的一件事是在于如何使人才不致变成奴才。过去的人才训练集中在制造白领阶级的候补，那样的人才其实正是奴才的储备。南大在成立的当时就未曾沾染上这个时代风气。今后是否只能制造一些‘只有知识，只能服从政府政策的人，而不是有魄力有胆识的人’？这是整个国家——上自总理，下至贩夫走卒——所一致刮目以视的有待回答的问题”，最后则是“体格的锻炼”。¹¹⁴

李光耀有关“人才”与“奴才”的谈话，更被舆论视为是“李光耀总理宣读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思想论文——分析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揭示他的教育革命主张”，甚至是“被誉为‘文化革命宣言’”。¹¹⁵

¹¹²同上。

¹¹³“南洋大学的新使命”，《星洲日报》社论，1966年11月5日。

¹¹⁴同上。

¹¹⁵<不幸的南洋大学与义安学院事件>，《星洲日报》社论，1966年11月21日。

在图书馆开幕典礼上，在副校长黄应荣和李光耀致词时，有“约两百名男女青年举着布条，喊着口号，展开游行请愿”，向李光耀呈上一份请愿书，然后他们遮着脸，列队在举行开幕仪式的场地上转了几圈。根据《南洋商报》的报道，这两百人中“近一百名是南大学生，而以来自马来亚的占大多数，其他超过一半的人，是南大师生从未见过，来自校外的非南大学生”。¹¹⁶ 而《星洲日报》则称“约有两百名南大学生”。¹¹⁷ 南大学生七个学术团体包括南大历史学会、南大生物学会、南大化学学会、南大中国语文学会、南大数学会、南大物理学会及南大地理学会筹备委员会事后召开记者会，解释事件，称在图书馆开幕典礼时，“曾向李光耀总理提呈一份备忘录，同时他们也另外向南大理事会主席陈锡九提呈一份备忘录。内容大意是要求将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交还给南洋大学”。¹¹⁸

李光耀在面对游行示威的学生时，采取主动应对的方式，邀请学生派代表上台陈述他们的要求。一位来自马来亚联合邦的学生李万千上台发言，“谴责新加坡政府控制南大，学生反抗，又利用军警殴打学生；要修改南大法令，排斥联合邦南大理事；大学没有自主权，要求撤销入学准证，谴责政府褫夺陈六使公民权，赶走庄竹林”。李光耀在回应时，首先质疑联合邦的学生能否代表整个南大学生，指“没有新加坡便没有南大，南大不是依赖联合邦一些百万富翁的，他们无法帮南大的忙”。李光耀还对受华文教育者的勇气和果敢表示佩服，“我了解新大的情形，他们要示威，请他们由新大游行到职工大厦，他们不敢，只要由市府大厦到职工大厦，而且还要申请准证，但义安学生就不同他们，要游行就游行”，李光耀转而指出，“固然一方面佩服受华文教育人士的果敢，但有勇无谋是不行的”。¹¹⁹

对于学生的要求，李光耀回应称，“你要改变新加坡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那就说服我们，给我们知道为什么应该让南大没有组织、散漫下去？”¹²⁰

¹¹⁶ 《南洋商报周刊》，1966年10月30日。

¹¹⁷ 《星洲日报周刊》，1966年10月30日。

¹¹⁸ 《南洋商报周刊》，1966年10月30日。

¹¹⁹ 《星洲日报周刊》，1966年10月30日。

¹²⁰ 《南洋商报周刊》，1966年10月30日。

南大学生联谊会次日发表声明谴责这些学生的“错误行为”，认为“他们的举动是别有阴谋；是要配合外来的统一阵线的指令；是要制造流血纷扰事件；是要摧毁破坏南大的声誉，他们想回复过去南大那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学生生活方式”。¹²¹

这一事件随即引发了南大学生要求维护学术自由的抗争。1966年11月1日，大约有六百名的南洋大学学生，在晚上七时半在南大旧餐厅，举行同学大会，争取学生会及维护大学学术自由。新加坡大学、工艺学院及义安学院的代表也参加。¹²² 几天之后，名为“南洋大学争取大学自主维护学生权益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主办座谈会，主题是“大学自主与入学准证”，与会人士包括前首席部长马绍尔律师、新加坡大学、工艺学院与义安学院学生会代表。马绍尔抨击“新加坡大学的学术自由已经被扼杀，许多教授因为与政府抱不同见解而被迫辞职”，他怀疑“所谓适合入学准证是由行动党政府向联盟建议的，不然的话现在行动党政府大可以立即撤消之”。新大、工艺学院、义安学院学生会与行动委员会代表“一致认为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是大学非常宝贵的东西，一间大学失去自主与学术自由根本就不成其为大学。适合入学准证的目的是在于排斥具有与政府不同思想的学生”。¹²³

不久，“行动委员会”再次举行抗议大会，抗议南大学生陈伟英被驱逐出境及被开除学籍等事。新大、工艺学院和义安学院亦有学生代表出席。大会最后通过七项议决案，包括“抗议警方逮捕同学，要求政府立即收回驱逐陈伟英出境之成命，要求学校当局收回开除陈伟英及陈锦福两位同学之成命，立即恢复他们的学籍。对教务会议十一月十日之告同学书表示最大的遗憾，要求学校当局于三日内与南大学生争取大学自主维护学生权益行动委员会进行谈商，共同解决学生会及开除同学事件，俾使问题获得合理解决，强烈抗议黄代副校长

¹²¹ 《南洋商报》，1966年10月31日。

¹²² 《南洋商报》，1966年11月2日。

¹²³ 《南洋商报》，1966年11月7日。

拒绝接见‘全星学生行动阵线’代表，呼吁全体同学随时响应全星学生行动阵线的一切号召”。¹²⁴

南洋大学教务会议其后发表告全体同学书，批评“少数同学不守校规，每藉故生端，造成不安，以阻碍正常的建设与发展”，对李光耀为南大图书馆揭幕时学生的示威活动，南大教务会议批评为“显然是违反校纪有损校誉”，对于所谓的行动委员会“散发传单，乱贴标语”等“变态活动”，与南洋大学有关的“不外两点：一，反对修正大学法，二，要求恢复学生会”，教务会议对此解释是“按 1965 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对于法定机构成员之委任有所规定，即是：‘新加坡现行任何成文法中之任何规定，使任何法定机构或其他依法组织之团体之成员，由马来西亚委派或代表马来西亚任何权力机构、个人或团体者，除总统在宪报另有指令外，均属无效’，遵照这个根本大法，我们南洋大学法，自不得不加以修正”。¹²⁵

对于恢复学生会的问题，教务会议称“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件事跟大学法也有连带关系。一俟大学法修正颁布实施，新理事会成立后，便可依法进行筹组学生会”，教务会议也称“关于马来西亚学生就读南大事，并无变动”。¹²⁶

1966 年 11 月 1 日修改的《南洋大学修正法案》内容不久公布，包括原有法令之校长、秘书及财政等名称，分别更改为副校长、注册主任及会计长，由理事会加以委任。法案并规定委任一名助理副校长，由理事会委任，执行副校长未能履行的任务。新法案最大的修改，是原有理事会由校长及 27 人组成，现改为由校长及 20 人组成，其组成情况为：一，政府委任者 6 人，其中 3 人可在新加坡以外居住者；二，毕业生团体由其会员中选出者 2 人；三，教务会由其会员中选出者 2 人；四，大学会员在全体大会中选出者 3 人；五，由退任理事会在教育、文化、工业或商业界知名人士中委任者 7 人。理事的任期由两年改为四年。

¹²⁴ 《南洋商报》，1966 年 11 月 15 日。

¹²⁵ 南大教务会议告全体同学书全文，《南洋商报》1966 年 11 月 12 日。

¹²⁶ 同上。

法案修改后，带来最直接及最深远的影响是新理事会的阵容里，不再有新马各地赞助人代表，使出资赞助南大的新马两地商人、社团或是有关机构无法对南大校政施加影响，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教人士或华社领袖，再无影响南大的平台。

在对学生抗议事件发表公开文告加以说明后，南大校方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处理校内的违纪事件。南洋大学纪律委员会在 1966 年 11 月 15 日发表书面声明，点出南大校内的学生团体与向李光耀示威的学生以及其后“行动委员会”之间的联系，称“查十月二十六日南大有七个所谓学术团体，给几个人把持，擅盖印章，散发告同学书，声称反对修正南洋大学法，充满了挑衅的口吻，甚至污辱理事会谓南大‘进行改组，完全是少数丧失立场，贪恋官职的理事把南大出卖的结果’”。对于新图书馆落成典礼上的示威，南大纪律委员会称“约有百数十名学生，由于该学会等少数把持份子的煽动纠众，竟列队游行扰乱会场”。

纪律委员会指责这批学生组成“非法的行动委员会”，“滥用该七学术团体的名义散发告同学书，鼓动同学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斗争”，行动委员会还“派代表晋见黄副校长，态度傲慢，出言不逊”，十一月十二日，“竟有百余名之学生，包围总办公厅，质问开除陈伟英事，声势汹汹，且作人身危害之威胁”。纪律委员会指责这批学生为“居心叵测之恶劣份子”，宣布予以开除。包括马来亚籍 39 名，砂劳越籍 4 名，新加坡籍 17 名。¹²⁷

隔日，南大“发现文理商三学院的墙壁，均被红漆涂抹标语，课室钥孔均被水泥封塞。复有纠察学生围胁工友前往开启课室门户，而且阻碍学生上课”，后来更有“约三百人在文学院礼堂集会，竟有外来份子参加，演说煽动”，“此少数集会之不良学生胆敢号召罢课，彼未受惩处之不良学生，仍不知悔悟，一一出现，参加不法活动”，因此，南大纪律委员会再度宣布开除五十名学生的学籍。更为特别的是，南大宣布将“吁请警方协助，采取措施：

¹²⁷ 南洋大学纪律委员会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6 年 11 月 16 日。

一，将被开除学籍者立令离开。二，将纠察份子之恶行立即制止。三，将破坏校产、涂损墙壁者立即逮捕”。¹²⁸

这是南大校方罕见的“主动邀请”警方介入校园事务并采取行动之举。当天新加坡警察后备队分乘三辆红车前往南洋大学并在校内驻守，警方人员还于18日凌晨三时左右，觅查那些已被南大当局开除而仍留在学校的学生，令他们离开南大校舍。据警方称，共有九名遭南洋大学当局开除的学生，被警方所拘捕。被捕的学生中，有八名于南大校园内被内部安全部人员所带走，第九名则于裕廊路上被捕。这九名学生均是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¹²⁹ 显示绝非简单的违反校纪行为。

纪律委员会称“鉴于此少数不良份子别具心肝，如再予姑息容忍，则恶势力潜藏滋蔓，时时掀风作浪，殆无止境，本大学之风纪，决难维持，吾华族之优良传统，华文教育之发展，亦必被破坏无余”。¹³⁰

新加坡随后援引移民法令与放逐条例，将被开除学籍的四名新加坡大学学生及南洋大学六十七名学生，驱逐出境。这些学生都不是新加坡公民，根据官方的文告，四名新加坡大学学生“并非共产党员，惟与共产党联合阵线活动有密切关系，而且此种关系保持了相当时日”。他们和其他身为新大社会主义者俱乐部领袖的学生，住在社阵主席李绍祖医生住宅后面的一所房子里，“经常就近向李氏请教各项政治问题。当义安学院学生骚动时，他们经常访问那些非法占据校舍的学生领袖，并鼓励此等学生继续其非法行动。他们亦参与义安学生的非法游行及示威”。对于南洋大学、新大、义安学院共同参与的“学生全国行动阵线”在“南大与义安学院学生引导下成立时，这四名新大学生居然明知故犯，煽动受华文教育的人，进行有关藐视教育当局与政府的运动。他们也许认为，身为新大学生，遂享有不受惩戒的特权。因此，当局必须使这四名学生以及新大的任何其他学生觉醒，不要自以为他们与那些受华文教育的不同，可以从事于共党联合阵线活动而不受惩戒”。南大六十七名被开除学籍的学

¹²⁸ 南洋大学纪律委员会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6年11月17日。

¹²⁹ 《南洋商报》1966年11月18日。

¹³⁰ 南洋大学纪律委员会声明全文，《南洋商报》1966年11月17日。

生，包括 16 名女生“乃因在校内违反纪律及从事毁物活动而遭开除学籍”，“被禁止不得在新加坡居住，如在新出现将可被判监两年”。¹³¹

南洋大学内的这次学潮导致 112 名学生被开除学籍，69 名被驱逐出境（包括两名因为过去参加社阵游行被捕的学生）。这次学潮不单单是南洋大学内部的事务，也与新加坡大学、义安学院各自的抗争活动联系在一起，义安学院则有 81 名学生被开除学籍，14 名学生记大过，65 名学生被警察逮捕扣留。新加坡数所高等学府内的学潮连动，制造了更大的影响。“新大的学生要求‘学术自由’，反对‘入学准证’，南大的同学要求彻底明了政府对于王赓武报告书的究竟态度，义安同学则不满于汤寿柏报告书把他们的学院降级为‘初级学院’，而且还是遥无确期的留为初级学院”。¹³²

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变、建设国家意识的要求被普遍接受、政府强势能力的加强、民心向往安定发展的心理，都使这次学潮面临了与以往不同的舆论环境。学生的要求被一些舆论视为“过时”，因为“继历时十二年的马共暴动结束之后，印尼的‘对抗’也已正式终结，学术自由的恢复以及入学准证的取消应该最多不过是时间问题。如果我们各高级学府的学生会能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高明领导，这两个问题的争取的胜利，应该不难弹指立至”，至于南大的王赓武报告书问题，“尽管仍然有人把这个过时的圣经奉为经典，看看李光耀总理最近以来被誉为的‘文化革命宣言’的演词，任何人都可以明知，那些二毛子假洋人妄想把南大变质为英文大学的努力，其实早已注定只能把他们自己铸造为历史上的华教罪人”。只有义安学院的问题“最现实”，“因为创造与经办义安学院的义安公司最近忽然决定要把它像弃婴一样抛弃街边”。¹³³

《星洲日报》的社论委婉地批评学生错失时机，“千错万错其实都只是一时时机之错：一，在南大，正当李光耀总理宣读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思想论文——分析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揭示他的教育革命主张的时候，南大的学生们却仍然只把他当成了过去的李光耀而向他抗议示威。二，在义安，一个多月的

¹³¹ 《南洋商报》，1966 年 11 月 19 日。

¹³² <不幸的南洋大学与义安学院事件>，《星洲日报》社论，1966 年 11 月 21 日。

¹³³ 同上。

罢课并未引起社会上的足够反响，可是教育部长却忽然自愿挺身而出，这时候，学生们却把善意错当成恶意，终于使一件本来可以峰回路转的事件，变成不可收拾的不幸”。¹³⁴

学潮席卷数所高等学府，采取开除学籍乃至驱逐出境的强硬手段，显然不是学校单方面的措施。政府如此“雷厉风行的铁掌政策”，可能出于一些担心：“社阵已然放弃议会斗争而走向议会以外，南大义安的学生运动有可能竟与社阵的‘街头’活动汇流”，“更有进者，正当东马来西亚的‘越界入侵’份子活动逐渐有变成为本地的地下恐怖份子的趋势之时，西马来西亚也发现了新出现的恐怖分子，北马的颠覆份子更早已在响应泰共的新兴势力而死灰复燃，在这样的时机，新加坡的学潮是否能跟这些都容或有关呢？”

虽然这些猜疑都可能不无理由，但是《星洲日报》的社论认为政治的决策不能只建立在猜疑上，否则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将变成是集中营。除了表达希望当政者能够胸襟开朗，“除了学术自由之保障迟早必然恢复，大学入学准证之迟早必然取消，以及南大与义安前途之必然有所保证，就是现在不幸被冤枉罹难的同学，有关当局也一定应该有百计千方为他们设想自新之路”。而“南大与义安的最高行政当局有责任给这些必须‘绳之以法’的教育结果找寻出一种自新之路”。¹³⁵

被开除及驱逐出境的南洋大学学生 24 人，后来晋见新加坡驻联合邦最高专员连瀛洲，并提呈一份两千余字的抗议书。学生曾要求最高专员允许记者旁听，但遭到拒绝。这批学生向连瀛洲提出的问题包括“要求新加坡政府提出学生究竟犯了何种罪状？如罪状是确实的话，则他们是愿意被提控于法庭，以求法律的裁决。否则，希望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以及“这次事件给予学生的惩罚，在国际法律上而言，是太过严厉了，这种措施，将会为他国所嘲笑”，学生也“要求政府释放目前被监禁的新加坡籍的南大学生，要求政府向公众人士解释，在上月（十一月）十七日警方所采取行动的理由。警方在该日曾派出整千名的警察逮捕学生”。学生也质问“李光耀总理曾答应过一名前南

¹³⁴ 同上。

¹³⁵ <不幸的南洋大学与义安学院事件>，《星洲日报》社论，1966 年 11 月 21 日。

大生李万千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为何较后时却派员企图逮捕李万千？”李万千就是在南大图书馆开幕礼上向李光耀挑战公开辩论的学生。¹³⁶

对于这批受到处理的学生，即便到了第二年南大新生入学的时候，批判仍在继续，但似乎表露出过于严厉、有人蒙受冤枉的意思。南大学生联谊会会在1967年4月的《告新同学书》中，指责“极少数极端份子用尽种种卑鄙伎俩，极尽歪曲事实的能事，胡言乱语，以至一些善良的同学受其妄言所误而做出无谓的牺牲”，学生联谊会因此提醒新生要“随时警惕，以清醒的头脑应付之，却勿受其谬论所误”。¹³⁷ 对于大学与新兴国家的关系，南大学生联谊会明确提出了“国家至上、南大第一的大原则”¹³⁸。

南洋大学逐渐国家化的过程，是外部行动党政府的推动引导和内部大学当局、学生适应新兴国家的合力结果。对于行动党政府来说，新兴国家建国人才的匮乏，使大学按照国家／政府的目标发展至关重要。这既涉及到人才储备的问题，也牵涉到大学培养出的人才是否能够尽可能与行动党政府的目标接轨甚至具有相同的理念。在1967年南大新旧毕业生联欢宴会上，受邀出席并致词的包括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和教育部长王邦文。拉惹勒南即指出，“新加坡政府不只是热心于新加坡的长远前途，同时也关心新领袖接班的问题，这不只是指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包括商业、工业、教育、文化各方面的领袖”，而“那些受过大学训练的人，必须提供新的领袖”。¹³⁹ 拉惹勒南明确指出，新加坡的新领袖将不会来自那些所谓“垃圾桶”政党（即从事街头抗争、推翻垃圾桶），而是“来自像南大毕业生这些人”，他甚至认为“至于他们作为执政党领袖，还是通过一些新的反对党出来，都没有关系”。¹⁴⁰

在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建国后，南大在这一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日益重要。由入学新生中新马学生的比例可以一证：1964年度，马来西亚的入学人数占59.63%，新加坡占37.4%；1965-1966年度中，马来西亚入学人数占

¹³⁶ 南大学生代表邱国英介绍与连瀛洲谈话经过，《南洋商报》，1966年12月6日。

¹³⁷ 南大学生联谊会《告新同学书》全文，《南洋商报》，1967年4月18日。

¹³⁸ 同上。

¹³⁹ 拉惹勒南演讲全文，《南洋商报星期刊》，1967年5月21日。

¹⁴⁰ 同上。

56.2%，新加坡占 39.99%；1966-1967 年度中，马来西亚入学人数占 50.68%，新加坡占 45.65%。到了 1967-1968 年度，入学的新生中来自新加坡的占 64.94%，首次多过来自马来西亚的 32.41%。¹⁴¹

南大校长黄应荣认为，南大对于建国所能作的贡献，可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南大作为高级学府，足以影响、训练与改造未来领袖的年轻一代，其二是供给贸易、商业、社会学与科学的专门训练，以满足对高级人才的需求。¹⁴²

虽然南大的地位日益重要，但行动党政府对于南大的“学术水准”仍未达满意，南大在建国过程中的角色仍有距离。教育部长王邦文在 1967 年南大第八届毕业典礼上致词时详细阐述了南大与新加坡国家发展的关系：

在一般新兴独立的国家里，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集中在寥寥可数的几间大学，大学毕业生固然受国家器重，大学本身也处于特别受尊重的崇高地位，可是大学的任务并不只是在学术上谋发展，培养一批批具有高深知识的专门人才而已。大学不应该处在社会与国家无关的超然地位，必须成为国家社会的一个环节，随着国家社会的进展，分担一部分推动的责任。因此，正在发展中的南大，应当为这种趋向而作一些必要的准备。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之一环的南洋大学，南大师生应该把自己看成为国家社会的重要份子，为国家社会尽一点责任，不要自以为是与世无涉的清高名士，对大学以外的世事不闻不问。¹⁴³

王邦文指出南大本身所面临的挑战是“南大当局究竟能否把南大发展成为一间学术中心，在发扬文化方面使南大赢得她所冀望的地位”。南大毕业生对华文教育的贡献以及在国外大学的深造，“只证明了南大的素质。南大既然作为一间高等教育机构，在文化建设上、在思想及学术上领导国家的前途，但在作为替国家解决她所面对的难题上，南洋大学还未能扮演她所应扮演的重大角色。因此南大不应将本身仅仅作为一间教学机构”。¹⁴⁴

1967 年 10 月 27 日，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宪报公布南洋大学（修正）法，由 10 月 23 日起实施，确保了政府对南洋大学的影响力。12 月 18 日，南洋

¹⁴¹ 南大校长黄应荣演讲词，《南洋商报星期刊》，1967 年 6 月 25 日。

¹⁴² 同上。

¹⁴³ 王邦文演讲词，《南洋商报星期刊》，1967 年 5 月 21 日。

¹⁴⁴ 同上。

大学修正法令实施后，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选出 21 名理事，12 月 29 日，南洋大学第三任理事会成立，陈锡九蝉联理事会主席，黄奕欢为副主席。关世强、李绍光、叶昆灿、高立人、黄祖耀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68 年 5 月 25 日，南大举行第九届毕业典礼，教育部长王邦文在致词时，宣布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至此，正式实现了南洋大学的国家化。10 月 5 日，马来亚大学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接受南洋大学学生进入马大深造。

正式承认南大学位与之前有何不同？教育部长王邦文如此解释，“它意味着在公共服务方面，南大学位将被视为与新加坡大学以及其他被接受的外国学位具有同等的学术地位。它意味着南大毕业生现在可以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获得承认的大学毕业生竞争公共服务职位”。¹⁴⁵

但矛盾的是，在南大学位获得正式承认以前，南大毕业生也已被接受进入政府机关服务，至 1967 年底，约有 800 名南大毕业生在教育界服务，而另外两百名则在其他的政府机关服务，而且，“所有获得录取进入政府机关服务的南大毕业生一向都与其他获得政府承认的学位的毕业生享受同等的待遇，因此，政府的正式承认并未提高南大学位在薪酬方面的价值，而且也并不意味着南大毕业生在政府与私人服务方面将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王邦文指出学位被正式承认的真正意义是“使南大毕业生以及肄业生不再自视或被人视为属于较低一等的一群”。¹⁴⁶

政府在宣布承认南大学位时，指出“较政府承认来得更重要的是由学术界的其他高等学府所给予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是藉官方的宣示，它必须以优良的学术水准和实际的成就始能取得。南大经已赢得其他大学的尊重，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南大毕业生获准进入海外各著名大学深造得到证明”。

王邦文同时阐述南大与新大的关系，指出“由于新加坡的资源有限，我们希望新大与南大将要求更密切合作的途径，尤其应该设法消除在课程与设备方面的不必要重复，当然这必须在不牺牲各大学之特性与本质的情况下进行”。

¹⁴⁵ 王邦文在南洋大学第九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南洋商报》，1968 年 5 月 26 日。

¹⁴⁶ 同上。

王邦文强调“在我们这个两百万人口的年轻国家、组织严密的多元民族社会，无论是在工业或高等学府方面，是不容许浪费或无助于生产的事业存在。我们希望两大学府间将产生思想的交流，使双方能进一步节省经费与提高效率”，而这种“不容许浪费资源”的执政思想也直接影响到大学的教学用语以及最终培养出的人才，王邦文意味深长地指出“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两间大学应该深切地了解到政府在逐渐加强我们学校里的两种语文教育的用意。为了使学校毕业生们能真正通晓两种语文，除了由明年起，规定第二语文为学校文凭考试的必考科外，我们已经开始应用第二语文教学若干学科。假如要政府的两种语文教育政策能成功，显然地，我们的这两间高等学府也必须同时要有适当的调整”。¹⁴⁷

新加坡政府承认南大学位被称为“全世界的学术史上一件破天荒之举”，因为“没有一个高级学府所授予的学位在它的本国需要承认，也没有一间高级学府的学位这么殷切与耐心的等待承认”。¹⁴⁸ 对于华社而言，这是一件姗姗来迟的应有之物，因此，欣喜之余，并不心存感激。《星洲日报》的社论指承认学位“结束了一个十二年来的悬案，也解决了从南洋大学创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争端。这个争端起初是政治的——十二年前的殖民地统治当局根本不愿意本地有一间土语大学；后来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受外国语教育出身的当地人根本怀疑土语教育的价值”。社论引述教育部长王邦文宣布承认南大学位演词中高度赞扬南大学术地位的谈话，评论道：“谈到一间学府的学术成就，就连政府的承不承认甚至都不能作为直接的衡量标准”。¹⁴⁹

南大在新加坡建国阶段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磨合期，直至被政府正式承认学位、完成国家化的进程，但国家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七十年代担任南大校长的黄丽松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的特征曾做出同样适用于南大、所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的论述：

¹⁴⁷ 王邦文在南洋大学第九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南洋商报》，1968年5月26日。

¹⁴⁸ <星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星洲日报》社论，1968年5月31日。

¹⁴⁹ <星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星洲日报》社论，1968年5月31日。

一，对本国文化缺乏认识——新独立的国家，由于文化外铄过久，对于本国文化观念反而比较淡薄。大学之中，每每缺乏国家观念，这与本国文化之缺乏认识，可说互为因果。因此，大学之中对于本身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还需要努力提倡。二，对本地区缺乏认识——新兴国家的大学士林，往往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殖民地宗主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非常熟悉。平日高谈阔论，像是在数家珍。但对同一地区的周遭邻邦，甚至本身生存所系的国家事务，懵懵然无所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十多年前，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ASAIHL）初次开会时，各大学派来的代表，见面时宛如陌路人。他们之间对彼此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稍有认识的人少之又少，但对于英、美、法、荷国家的语言文化却是说来琅琅上口、头头是道。¹⁵⁰

黄丽松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还存在师资与设备不理想、经费缺乏等问题，而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未能作全面的协助——每个新独立的国家所面对的首要的目标是在发展国家的经济，希冀巩固国家的生机，各国都极力推行工业化，注重工艺训练。大学方面除了担负一般的大学学术教育之外，须在工业发展方面扮演一份角色，协助社会解决种种难题，这是应该的事，但是往往由于人才非常不敷，训练和知识不够或不符合需要，其所能作出的贡献不多。

因此，大学里的教学与研究，如何避免脱离赖以生存的环境，就变成一件重要的课题。发展中的国家，一方面是遭受殖民地统治者忽视过久，一切建国事业，百端待举，教育事业更是要迎头赶上；另一方面又要为工业发展而奋斗，这是国家的非常时期”。

由于南大已经开始建立和“正确体验”“一个发展中国家创建新大学，经费来源必需凭藉政府的大力支持，方能循着正轨，本着在质不在量的政策，顺利地发展”的观念，黄丽松认为，“政府对于大学如何花费公款，自然要关心。譬如训练的人才，要符合国家当前及长远的发展的需要；研究工作又希冀大部分能切合实际的目标。为国家安全问题，教授人员的遴聘、学生的收录，必要时政府也免不了要有发言权”。

¹⁵⁰黄丽松〈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星洲日报》，1970年1月1日。

对于这是否侵犯大学自主权，黄丽松认为“在百废待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里，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在不致违背教育与探讨原则的范围内，如果能够尽量配合国家经济的需要，帮忙解决社会急待解决的课题，不但是件好事，也是很应该的”。

至于教员与学生的遴选问题，“那是牵涉政治动荡环境中新兴国家安全的措施，虽然有时觉得令人懊恼，却是一剂不可不服的苦药。一般新兴的国家，不但有外犯，同时往往亦有内忧。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之下，政府有责任确保大学不致成为颠覆活动与骚乱的温床，从而维持应有的宁静环境从事讲道授业。从这种积极的角度看，大学自主权的问题，便应该有新的谅解”。¹⁵¹

南大在国家化的进程中，对于政府对大学“教授遴选、学生收录”的发言权、大学自主权的“新谅解”，有过痛苦的抗争过程，最终在行政与课程上实现了行动党政府国家意识的要求，通过学位被承认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政府行为，实现了大学的国家化。

¹⁵¹ 黄丽松<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星洲日报》，1970年1月1日。

第四节 小结

通过对新加坡独立建国后行动党的国家意识和政治理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行动党的国家图像和相关政策是多元种族、区域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即便是行动党曾经奉为圭臬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新加坡也实现了蜕变和调整。因此，南洋大学内存在的不同意识、不同思想，如果与行动党路线出现差异，必然会引起政府与大学的尖锐对立，而在本章所讨论的阶段，这种对立大多体现在学生团体与政府之间，大学当局本身则已在行政重组完成之后，对于大学的作用和定位，有了与行动党政府趋向一致的观点。

本章主要讨论在新加坡独立以后南洋大学国家化的进程。可以确定，在经历过自治、新马一家和独立后，南洋大学国家化是必然趋势。需要厘清的是，南洋大学在独立前的十多年间，即便是纯粹的华文大学，但一直是新马的本土大学，以为当地培养人才为目标，对新加坡或马来亚的“国家认同”（虽然国家实体和建国的政体历史很短）一直存在，因此，广义的国家化早已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对国家化的内涵、方式和内容进行界定，南大的国家化可以这样表述，即按照行动党政府国家目标、国家特性、国家架构、政治格局、政党体系的要求进行的国家化。由于行动党的强势政府以及多年一党执政的优势，它对于新加坡国家的方向、组成、政策有着系统、连续的谋划和安排，南洋大学实现国家化，必然必须符合行动党政府的设想和进展。

行动党政府承认南大学位、实现国家化的先决条件是“学术水准的提高”，而教育部长王邦文也首次将提高学术水准最重要的措施与“清除南洋大学内的反国家共产分子”挂钩，既突显了南洋大学问题政治层面的复杂程度，也从侧面佐证了前文所述的南大国家化进程必须符合行动党政府的国家架构、政治格局和政党体系的要求，尤其是在政治层面。

南大学生团体对于政府或政党对大学的干预有着不同的理解。抗争的学生认为政府借国家意识实现政党意志，以政党意志改变南大意识。支持政府的团体则认为执政党是建设国家的主体，从而支持政府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建构。政治认知上的差异，是南大局势难以平复、学生与政府对抗不断出现的重要原

因。因此，南大学生对政府干预大学自主权、政府强力干涉大学事务的过程和方式，是一个痛苦的接纳过程。随着南大国家化的实现，这一痛苦的感觉也随之渐渐降低。

但是，1968 年南大学位获正式承认，只是南大国家化进程的一个段落，其后还出现一些调整，不断适应行动党政府建设国家的需要。比如对于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保证“继续实施以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现行政策”，既可以视为对南大华文教学媒介语的支持，也可以作为政府出于平衡和平等的需要，对南大推行华文教学媒介语的“牵制”，为南大未来采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铺路。

教育部长王邦文在 1966 年谈“教育的方针教育的方针在于使我们的下一代具有坚强的国家意识与多元种族概念，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文，适应多元种族社会，大家在没有语文障碍的情况下，团结一致为国家建设而努力”，要求南大“应该随时照顾我国社会的需求与进展而能及时地作适当的调整，从而使其毕业生能跟上国家社会的进展而毫无隔膜地服务人群”，“确保政府在花了大笔教育费用所培养出来的人材，个个都能各尽所长，在建国的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¹⁵² 正是行动党国家建构与实现南大国家化的指导原则。

对于大学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李光耀对此也有着类似的阐述，他在 1970 年 8 月 11 日晚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邀，在校内建国堂发表专题演讲《南大与我们的前途》，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必须了解南大或新大毕业生的出路和前途，都不免要受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影响的。新加坡国小民寡，必须着重于工业发展”，“现在，不管新加坡、美国、苏联或中国，所需要的都是高度的专门人才，来协助国家的高度发展，成为高度的工艺社会”。¹⁵³

财政部长林金山在南大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宣布新加坡会计师协会已经同意让南大会计系与星大会计系的毕业生享有同等地位时，也阐述了南大在国家建构中的任务，“南大今后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把商学院中的各个学系，加以

¹⁵² 王邦文致词全文，《南洋商报星期刊》，1966 年 5 月 29 日。

¹⁵³ 李光耀〈南大与我们的前途〉，《星洲日报》，1970 年 8 月 12 日。

巩固和扩充，并且配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如果南大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南大本身，而同时能符合国家的需求，不论是在质或量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政府都乐于继续协助的”，林金山同时提醒南大，“大学的两项主要的任务，是教学和研究。在新加坡，由于资源短缺，因此，有关方面在执行这两项任务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一心一意要建设的，是一个生气蓬勃、团结一致的国家，所以大学的任务，绝对不能和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¹⁵⁴

因此，南洋大学在 1968 年以承认学位为标志，实现了国家化。但在未来的新加坡建国历程中，还需要面对新的调整，适应行动党政府的国家建构目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教学媒介语的改变，因为在李光耀看来，“如果没有把南大变成一所符合我们社会的要求，就是培养一批可以用英语做事、用英语为媒介语的人的（学府），那一定是失败的”，而如果对南大放任不管，“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我看（情况会）越来越坏”。¹⁵⁵

这个“越来越坏”的情况为：华文大学与英文大学若在新加坡长期存在，对一直努力塑造新加坡国家认同、朝向国家建构目标的行动党政府来说，将无法解决社群分裂的问题，“将会使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鸿沟永远延续下去”，这样的结果将是产生“两群新加坡华人，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语文和社会政治世界里。新加坡已经够小了，而如果在我们国家的心脏部位还出现断裂，这将会减少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效力”。¹⁵⁶

¹⁵⁴ 林金山在南大第十二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词，《星洲日报》1971 年 8 月 1 日。

¹⁵⁵ 李光耀接受前新加坡广播局电视节目“人物专访”访谈的华语谈话，《联合早报》，1994 年 4 月 11 日。

¹⁵⁶ 新加坡时任总理吴作栋 1995 年在“南大之夜”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盛宴上的致词，《联合早报》，1995 年 6 月 4 日。

第七章 总结

研究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两元关系研究。

首先，新加坡政府的组成形态、政治结构、执政党派、与中央政府关系在1953至1968年间先后发生多次转变，经历了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民选的劳工阵线政府到人民行动党自治政府以至新马合并下的新加坡行动党政府和新加坡独立后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由于政府的性质不同、利益不同、目标不同，因此对于南洋大学的政策、定位、干预程度、解决南大问题的迫切程度、手法软硬都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

其次，关系论述中的另外一个主体南洋大学，由于设立的背景和政治形势的演变，也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个体，造成“南洋大学”这一名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校董、教职员、学生会、毕业生组织等相关成员共享的形象符号，但由于组成人员背景和来源的差异、力量对比的强弱，实际上南洋大学在不同时期，都分化存在不同的代表集团，各自都被视为南洋大学的代言人，最终又共同组成南洋大学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结构。

因此，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两个主体其实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深刻地影响到南大与政府的关系。比如南大内部力量体系的演变，直接影响到政府对南大的态度、对南大地位的定位以及对南大政策的强硬程度，而政府形态的变化，也影响到南大校董、学生、毕业生对政府性质的看法、对政府处理南大问题的态度以及对政府政策的反应方式。

我们先简要总结一下历届政府与南洋大学关系的情况。

在殖民地政府时期，对南洋大学的政策和态度由“默反”逐渐转变为“默认”。首先，南洋大学这所“华人大学”、“华语大学”的出现，在英国殖民当局正努力削弱华文教育、以英文统领各族教育的形势下，成为殖民政府政治上意欲打压的对象。英国殖民地当局持反对态度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制约，二是政治上的担忧。

而南洋大学在宣布创立之后，面对的不仅仅是殖民政府的障碍，还面对来自马来亚大学、马来亚联邦政府、马来社群和华人社群内部（部分受英文教育华人及土生华人）的反对声浪。这些反对声浪中，有殖民政府刻意安排的幕后运作，有谋求政治利益的族群驱动力，也有受英文教育的既得利益者的一贯情绪的体现。这种种反对力量，都是殖民政府决定对南大政策的考虑因素，也是借用来制约南大发展的工具。

但是，英国殖民地当局不愿以政府的名义，对华人社会投入高度认同和情感寄托的南洋大学公开加以反对，而是委婉地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默反”。这是因为公开压制作作为民族教育代表的南洋大学，并不符合英殖民地政府的成本利益，“简单取消或者削弱作为文化符号一部分的民族教育及其原有媒介语言，无异于取消或者削弱原有的精神、感情和认知关系，所以，凡是发生上述取代化简削弱事例的地方，总会同时存在强大的反作用力”，¹ 殖民地政府不愿面对华族社群“强大的反作用力”，是其“默反”政策的根本原因。

殖民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南大将成立的现实，这一被动性也决定了南大与殖民政府关系的某种特征，即南大所保持的华文教育独立性不愿也无法使政府插手其中，进行干预或提供津贴。这一点是后来行动党政府想方设法改变与南大关系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以津贴或补助的方式换取对校政的影响力。

政治上的平衡和考量使得英国殖民政府“默认”南大，这其中也包括美国势力卷入产生作用的因素。同时，殖民政府“默认”有自己的底线，即虽然政府无法阻止南大建校、招生，但在承认学位问题上却毫不让步，直到南大符合政府的要求和标准为止。但是，那时的南大创办人并没有意识到学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学生还没有入校，离毕业更为期尚远，因此学位问题并没有爆发成为南大与殖民地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为后来南大与民选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纷争与拉锯埋下了伏笔。

¹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页 186。

在殖民地政府期间，南大的代表力量主要是校董，包括创办人陈六使以及新马一批华商。与殖民地政府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除了创办初期有过激烈的争论之外，基本上处于比较平和的轨道。

在劳工阵线组成民选政府之后，曾为南洋大学带来希望。首席部长马绍尔与南大渊源深厚，还是南大会员，明确表态支持南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南大与政府的关系处于良性阶段，迎来创校以来首次出现一至少在表面上充分显示如此一有利的政治环境。

在马绍尔任期一年多的“蜜月期”内，南洋大学主要的进展是校址建设、经费筹措、筹办先修班等“技术性”问题，与政府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和纷争。马绍尔政府甚至主动尝试过如何解决承认南大学位的问题，而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基于独立办学的传统，并未意识到学位承认的核心地位，从而错失了争取的最佳时机。

南大 1956 年 3 月 15 日正式开学之后，伴随新加坡政治形势的演变，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学位承认、大学地位以及学生政治活动方面，南大与其后林有福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矛盾有所激化。

林有福执政时期，对于亲共产主义等左翼力量采取了与马绍尔政府阶段不同的政治策略，南大学生也首次开始参与社会上的政治活动。林有福政府对华校生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清洗措施，并且指控中学联、铜鼓音乐联合会等组织是马共的外围组织。但由于南大学生和校方当局不曾发生直接的反对林有福政府的政治运动，因此，虽然林有福对亲共产主义力量采取强硬措施，并没有直接针对南大的清洗措施。双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直到南大 1958 年 3 月即将举行落成典礼，双方关系开始出现改善的良机。

南大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学位承认和经济援助上，需要政府的支持；而林有福政府面临次年的大选，也需要以南洋大学为代表的华社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于是双方取得了利益平衡点，政府开始研究资助南洋大学的方式方法，而南大也频频释放出愿意改制和聘请首席部长担任校长的善意。

最关键的是，双方在确定政府援助南大的原则和学位评议上取得了一致，同意成立学术评议会讨论学位承认问题，这是处理南大与政府关系的两大突破，处理得好，

将为南大的地位与发展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也为南大与政府的关系，带来质的突破。但是，由于自治大选和评议会的报告书时间交织在一起，政治权力的交接和政治舞台的变化，又为南大与政府的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在行动党自 1959 年执政到 1963 年新马合并期间，新加坡基本还是处于“不确定的国家建设时期，对国家本身的争夺与控制成为该阶段的主旋律”，² 南大也是政治争夺与控制的对象和工具。白里斯葛评议会作出对南大不利的报告书之后，林有福出于政治需要和选举压力，不愿公开发表。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之后，反而不存在政治包袱，可以以报告书为工具和契机，促进南大的改组。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背后，还折射出当时在英国殖民地势力日益弱化的情况下，围绕南洋大学而产生的英美教育制度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白里斯葛报告书发挥了作为维护英国教育制度的护法使者的作用，突显了英美制度之争以及制度背后牵涉的华文教育、与中国关系以及新加坡马来亚关系等复杂因素。

对南大当局而言，当时并未将学制差异视为南大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但却不幸地成英美制度之争的牺牲品，陷入学位不受承认的困境，彻底改变发展道路。南大与新加坡政府在这一阶段的关系必须开始将其置于行动党政治理念的背景之下考察。与马绍尔政府、林有福政府阶段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的行动党政府，表现出强烈的自治和国家意识，对于南大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一环的要求和希望也就越高。

行动党执政之后到 1963 年大选之前，政府一直试图使用温和的手段与南大谈判、协商，对南大进行一些改造，使政府可以真正发挥影响力，符合政府的愿望并消除潜在的不安。但是显然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愈演愈烈，以致行动党政府看到陈六使支持南大毕业生“参与反对政府的阵营，进行竞选”。从南大内部来说，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以及政府与南大委员会进行的数次谈判、建立南大理事会等措施，并没有使南大向政府希望的方向取得进展。而南大内部存在的让政府为之不安的因素还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比

²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6。

如对华文作为教学用语的坚持、政府无法介入南大校政、南大学生会实力越来越强，直接影响政府与南大当局的谈判、外部共产主义势力对南大事务的“渗透与干预”等，最关键的是其毕业生开始成为反政府、反行动党政治力量的重要来源，这一趋势更令行动党政府担忧。

当时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是追求新马合并，为争取新马华人的支持，需要南大保持一定的华文大学的特色，但又需要南大加强马来亚的地方色彩，避免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在联合邦政治和种族斗争中处于舆论上不利的地位。而这都需要政府加强对南大的管理和控制。正是在这样看似矛盾的政治理念下，南大与行动党政府进入了磨合阶段。

1963 至 1965 年新马合并时期，对南洋大学是一个政治上的转折点。既因为南大毕业生积极参与 1963 年大选、南洋大学也成为选举的重要课题，而达到政治上的最高峰，也因为政治斗争的失利、大逮捕的实施、学生政治力量的消除而摔落谷底。参选意味着南大开始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建国人才，参与决定新加坡的政治进程，但同时也意味着南大开始输出参与政治权力分配的人才，外部政党间的政治差异和分歧势必在南大这一载体上出现扩大和延伸，这一扩大的分歧最终演变成政治上的冲突，招致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的干预、清除内部政治力量，彻底改变了南大的形象和命运。

其后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庄竹林被迫辞职，南大学生会、南大毕业同学会经过内部的学生联谊会和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的损耗斗争，以及外部的政府强力逮捕镇压，最终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使南大失去了在政治上乃至南大问题上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支撑。政府也得以开始相对顺利地实施南大改组的计划，逐渐增加对南大的控制权。

此时的南大问题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体现了新加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治角力，以及围绕南洋大学产生的政治理念和国家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内存在强烈声音，从维护马来国语的角度坚决反对承认和资助华文大学的南大。而行动党政府对马来西亚的理念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从这一点看，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能否承认南洋大学，某种程度上就是能否接受“马来西亚人的马

来西亚”的标尺。南洋大学成为行动党在新加坡以外的政治版图中扩大理念、争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支持的一个平台。

当然，南大问题归根结底还主要是新加坡的内部问题。而南洋大学在新加坡独立建国的阶段，才真正开始与行动党的国家建构目标再度开始重新适应磨合的过程。

到了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南洋大学问题摆脱了外部的复杂因素，相对显得简单起来。在经历过自治、新马一家和独立后，南洋大学的国家化是必然趋势。南大的国家化可以这样表述，即按照行动党政府国家目标、国家特性、国家架构、政治格局、政党体系的要求进行的国家化。由于行动党的强势政府以及多年一党执政的优势，它对于新加坡国家的方向、组成、政策有着系统、连续的谋划和安排，南洋大学实现国家化，必然必须符合行动党政府的设想和进展。

行动党政府承认南大学位、实现国家化的先决条件是“学术水准的提高”，而教育部长王邦文也首次将提高学术水准最重要的措施与“清除南洋大学内的反国家共产分子”挂钩，既突显了南洋大学问题政治层面的复杂程度，也从侧面佐证南大国家化进程必须符合行动党政府的国家架构、政治格局和政党体系的要求，尤其是在政治层面。

南大学生团体对于政府或政党对大学的干预有着不同的理解。抗争的学生认为政府借国家意识实现政党意志，以政党意志改变南大意识。支持政府的团体则认为执政党是建设国家的主体，从而支持政府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建构。政治认知上的差异，是南大局势难以平复、学生与政府对抗不断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南大学生对政府干预大学自主权、政府强力干涉大学事务的意愿和方式，是一个痛苦的接纳过程。随着南大国家化的完成，这一痛苦的感觉也随之渐渐降低。

因此，南洋大学在 1968 年以承认学位为标志，实现了国家化。这只是南大国家化进程的一个段落，在未来的新加坡建国历程中，还需要面对新的调整，适应行动党政府的国家建构目标。比如对于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保证“继续实施以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现行政策”，既可以视为对南大华文教学媒介语的支

持，也可以作为政府出于平衡和平等的需要，对南大推行华文教学媒介语的“牵制”，为南大未来采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铺路。

显然，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南洋大学与历届不同政治形态的政府都存在不同程度和性质的矛盾。但虽然是不同性质、不同政党、不同政治环境的政府，与南洋大学之间的关系仍然有些可以归纳出的共性。

首先，有关大学控制权之争，一直贯穿南洋大学与历届政府的关系主轴。由于控制权牵涉到大学的性质确定、发展方向、人事安排、社会影响、学生思潮等事关大学发展、又攸关社会内部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大学的控制权一直主导着南大与政府的关系。这也是早期华校的传统，“对任何形式之政府管制均加以强烈之反对，一般言之，只在学校经费骤增，校舍不堪修理，或教员薪金过于低薄以致影响学术程度时，政府津贴始获接受”³。

由于存在南大发展过程、内部政治力量、外部政治环境的差异，历届政府对控制权的渴望和焦灼程度各有所不同，也都一直没有将争取对南大的控制权公诸于口，但南大与政府彼此却是十分清楚，是否接受津贴、如何接受津贴则是控制权之争的体现方式之一。

殖民政府时代，政府津贴华校时，条件之一就是需要“说明学校当局所采取并拟采取在校实施两种语文教育制度之步骤，以便达到为本殖民地养成良好且能正确通晓英文与国语之公民”。⁴ 在殖民地时代，南大创办之初，殖民政府就曾尝试将南大转变成马大的一个学院，以保证学术水准，避免发展失控。⁵

南大开学前一个月，民选政府也体会到政府对控制南大的困难。教育部常任秘书麦理纶在一份准备提呈给内阁部长们有关南大情况的档案中指出，“必须强调的是，即便到了临近开学的阶段，（南大）还没有任何接近政府寻求帮助或指导的动作。大学由一个既极度怀疑政府计划、又对大学象征意义一无所知的人来构思，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将种族和政治从教育中分隔开也是可能

³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

⁴ 《华校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1953年12月15日新加坡立法会通过，见《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页308。

⁵ 第五届教育部长会议文件，英国 Public Record Office, BW 901554.

的一最不幸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教育发展应该遵循一定的进程，却使得任何形式的政府控制格外困难。”⁶ 由于此时南大并没有接受政府的津贴，因此，政府对南洋大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而在行动党执政之后与南洋大学当局有关提高学术水准等问题展开的谈判中，数度中断、数度延误，也都是因为控制权的争议。行动党内部的想法就认为，“关于南大的谈判，之所以拖延时日，完全在于学校的控制权问题。政府出钱资助，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学校各方行政的控制权如拟定课程内容，选取学生以及聘请教职员等，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南大成为培养共产党分子的温床”。⁷

陈六使在这场控制权的争夺战中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作为南洋大学的主要创办人和管理者，他对于大学管理方式、办校风格、校园气氛、大学地位和水准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商人办学是华校的传统，但是中小学华校的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精英特色有着本质的差别，作为大学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并不能完全按照商业公司的管理方式，还需要学术的背景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经验。因此，陈六使的知识水平、教育背景和商人本色，若不能选择适合的介入和发挥影响力的方式，必然将与南洋大学发展取得突破、政府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目标产生冲突。

就校内管理而言，陈六使与林语堂的冲突、陈六使与张天泽的矛盾都源自对南大管理权归属的争议。而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彻底离开南大，则是与政府针对南大控制权的斗争失败的结果。由南大的创办人最终变成政府对付的对象，陈六使的角色变化成为一个不幸的悲剧。虽然南大与政府之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内部的政治活动、毕业生的反政府立场，但就大学控制权本身仍是教育问题，即使没有政治活动困扰，政府最终也需要掌握南大的控制权。南大发生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政府争夺控制权的速度，或者是改变了政府争夺控制权的方式。

⁶ 新加坡教育部档案，1956年2月9日。

⁷ 行动党政府前官员与作者的电邮，2005年3月19日。

其次，历届报告书对于南洋大学都应该有着特别的借鉴价值。在本论文讨论的阶段，包括三份主要的报告书——即 1959 年的白里斯葛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1960 年的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和 1965 年的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三份报告书都曾招致南大校方、创办人或南大学生会、毕业同学会的不同力度的批评。

这三份报告书都与行动党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白里斯葛报告书虽是在林有福政府阶段制定，但却由行动党政府决定公布。魏雅聆检讨委员会由行动党政府委任，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也是由行动党政府委任，但却与白里斯葛报告书一样，在政治环境改变之后，才由政府公布。报告书与当时的环境难免有着一定的政治联系，但不会削弱其学术价值和客观性。制定报告书的学者身份、教育背景和对华文文化、华文教育的了解，都部分避免了压制华文教育的指责。

因此，对于报告书中先后出现的对南大管理体系、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批评和建议，有其合理成分和意义，可以说解释了南大无法取得政府承认的部分原因。报告书的产生更加深和印证了政府对南洋大学在教育问题上的判断，因此促使政府下决心争取对南洋大学的控制权。

第三，南洋大学的演变和实现国家化，是迁民社会最终“国家化”的隐喻。南洋大学的创办，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体现了移民形态为主的迁民社会为维护本原文化传统、提升社群话语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实现地方化等三种努力。在英华社会成为新加坡社会主流、最接近前宗主国特征的统治集团后，必然通过强化自身对国家的建构目标，来将其他族群、其他文化象征统一到国家的符号之下。南洋大学华文大学的特性、迁民社群主掌南大校政和发展方向、独立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成为迁民社会与统治集团角力的缘起。

国民国家有两种形态，一是地缘国民国家型（territorial nations），即多族群共同体，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新加坡也是属于这一类型。二是族群国民国家型（ethnic nations），即由单一族群形成的国家。在地缘国民国家里，主流文化往往来自优势族群或者多数族群，现代国民国家要求国家与国民在共同的文化认同上整合，而这种共同的文化，也就是国家文化，绝大部分属

于优势族群（至少在认识上如此）。在这样的国家文化改造重塑过程中，非优势族群或非主流文化面对双重效忠的局面。

用这样的理论来观察分析南洋大学以及其所代表的迁民社会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化，在新加坡建国和国家建构过程中，面对英文教育成为国家主流教育、新加坡塑造超族群的国家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马来亚文化）时，不难理解迁民社会所面对的双重效忠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要效忠国家及其文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接受和认同优势族群的文化），这是国家建构的必须之路；另一方面他们要效忠自己的族群文化，他们正是在这样的族群文化中建立起族群的特征和自身的价值观。当双重效忠的方向与原则发生冲突时，或者说他们认为需要效忠的国家及其文化将伤害或损及族群文化的效忠时，必然发生力量的拉锯甚至激烈的抗争。

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即不管是强迫的，还是默认的，强势语言容易成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由于强势语言与强势文化紧密相连，在一个极端上，作为强迫同化的一部分，说劣势或弱势语言的群体被迫学习强势语言；在另一个极端上，强势语言被那些劣质或弱势语言的使用者自然而然地接受，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和社会进取的重要手段，甚至也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⁸ 这种语言帝国主义，不仅仅体现在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间的单向作用，其实在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前殖民地内部各种语言之间，同样存在，经过执政者的国家建构目标和意识想像，英语成为理所当然的强势语言。

吊诡的是，这种语言强势，常常以平等面貌出现，助长了优势群体自鸣得意、夸大自我的心态，在事实上贬低了非优势群体及其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优势群体和非优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英语在新加坡的强势地位，也在“四种官方语言平等”的面貌下，取得了合理化。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洋大学的名称在一定意义上也暗喻了它的属性和在国家中地位的某种矛盾。自南洋大学 1953 年倡议建校、1955 年开学至 1968 年学位终于被承认，乃至其后发展至 1980 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

⁸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观点，转引自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页 164。

学，在伴随新加坡建国、发展的进程中，其校名最终也需要切合国家演变的需要。与之相提并论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带有鲜明的地域和地缘特征，甚至具备国家的政治属性。

而正如“南洋华侨”这一概念随着东南亚国家逐渐使用当地国家的名称加在华人的身上，变成马华、印华、泰华而逐渐被淘汰一样，南洋大学使用的“南洋”一名也存在着与国家观念的矛盾，其概念“本身就是所有的东南亚华人都可以去的大学，不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它的概念是整个南洋，后来当然就成问题了，因为到新兴国家成立之后，每个国家分得那么清楚，‘南洋’这个名词就越来越不适合用”。⁹

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曾经提出如此看法：新加坡加强国家意识的道路，“经历了一个非常刻意而自危地塑造新加坡人观念的时期，所有的学校课程都必须国民化”，“如果不刻意地切掉这些联系，不可能塑造新加坡人自己的认同感”，所以对新加坡来说，“塑造新加坡认同感是个非常痛苦的时期，跟这些联系感情深厚的人，突然感到得削弱这些联系，才能把更强烈的情感，依附在新加坡人这个身份上。这种痛苦，一部分体现在南大的起落挣扎、华校问题与华文地位里头”。¹⁰

在这一意义上，南洋大学的演变成为一种隐喻，即折射迁民社会如何在新加坡从早期的数量优势、政治弱势，到争取地位、维护利益，再到屈服强势主流、被迫淡化族群文化特征，乃至最终在国家化的作用之下，完成了对国家及国家文化的效忠，塑造出共同的新加坡认同感。

⁹ 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分认同〉，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页101。

¹⁰ 杨荣文专访全文，《联合早报》，1995年7月16日。

参考资料

历史档案及未刊资料：

File: Colonial Office , CO1022/346,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CO1030,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File: Nanyang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ME4037, 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陈嘉庚致林崇鹤、潘国渠亲笔信，1954，1955.

南洋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1960—1964

南洋大学教务会议记录，1956—1968

南洋大学首届理事会成立会议记录，1962

原始文件、声明：

《华校联合会的八项原则》，1952年4月27日。

《南大学生会全民投票声明》，1963年。

《社阵竞选宣言》，1963年9月12日。

《新加坡联盟竞选宣言》，1963年9月13日。

《人民行动党竞选宣言》，1963年9月13日。

1963年大选李炯才群众大会演说全文，1963年9月20日。

南大理事会政府代表联合声明，1963年10月3日。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联合声明》，1964年6月6日。

《南大毕业同学会声明》，1963年10月4日。

《南大毕业同学会革新委员会宣言》，1964年2月21日。

《南大毕业同学会革新委员会告社会人士书》，1964年2月21日。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声明》，《南洋商报》，1964年2月22日。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声明》，1964年2月27日。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书面声明》，《南洋商报》，1964年3月1日。

《南大毕业同学会革新委员会告社会人士书》，《南洋商报》，1964年2月21日。

《南大学生联谊会宣言》，《南洋商报》，1964年3月3日。

南洋大学学生会《政府控制南大的真相》，油印复印件，1964年7月9日。

南洋大学学生会《南大学生会就逮捕及开除事件告同胞书》，油印复印件，1964年7月19日。

南大十学生团体《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1965年10月26日。

口述历史或个人访谈：

孙罗文，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主席

林明治，南洋大学英文研究学会首任主席

叶昆灿，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曾任南洋大学理事会理事

蔡崇语，南洋大学会计系第一届毕业生，曾任南大注册主任，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易润堂，曾任李光耀政治秘书，劳工部长、文化部长，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

郑奋兴，南大数学系第一届毕业生，曾任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

高立人，南大化学系毕业生，曾任南大理事，国会议员

林焕文，南大化学系第一届毕业生，曾任南大学生会主席，红山区国会议员

中文书目：

陈烈甫《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新加坡：南大事业有限公司、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1997）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崔贵强、古鸿廷合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

蒂凡那编《社会主义的实现—新加坡之道路》（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76）

韩福光、华仁、陈澄子合著，张定绮译《李光耀治国之论》（台北：天下远见出版，1999）

《合并、假合并与邦联》（新加坡：阵线报出版委员会，1962）

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马华社会研究丛书，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

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康乐音乐研究会为鼓励本地艺术创作举行文艺晚会特辑》（新加坡：康乐音乐研究会，1962）

林清祥等著《当前宪制斗争的任务》（新加坡：阵线报出版委员会，1961）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印行，1985）

李光耀、杨玉麟《语言与政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编辑委员会，1960）

《李光耀回忆录—1923 • 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1998）

《李光耀回忆录—1965 • 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

《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新加坡：联合早报编，1993）

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

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1）

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

梁文贵等撰《人民阵线宣言》，（新加坡：人民阵线出版，1972）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刘宏主编《坦荡人生学者情怀—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
- 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 刘书林《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刘英舜《我与义安》（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出版委员会，1970）
- 罗亚《政治部回忆录—港英政府最神秘的部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1997）
- L.V.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 年-1972 年》（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出版，2001）
-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65）
- 《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编撰，1965）
- 《南洋大学第十一届学生会理事会常年工作报告书》（新加坡：南洋大学，1975）
- 《南洋大学法》（新加坡，1959）
- 《南洋大学法》（修正本）（新加坡：1966）
- 《南洋大学概况》（新加坡：南洋大学，1959）
- 《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吉隆坡：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发表，吉隆坡政府印刷局，1964）
- 《南洋大学史论集》（马来西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
- 《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1965）
- 《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特辑》（新加坡：南洋大学学生会，1963）
- 《南洋大学全球校友会联欢会特刊》（1992）
-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马来西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
- 《全马平社为南洋大学筹募基金义演纪念刊》（新加坡：全马平社为南洋大学筹募基金义演委员会，1953）

《人民行动党·1954—1979》，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1979。

《人民行动党 15 周年纪念特刊》（1970）

沈子周《一九五六年东南亚经济年鉴》（新加坡：东南亚经济导报出版公司，1957）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发行，1993）

宋哲美编《星马教育研究集》（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4）

唐青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台北：华侨教育出版社，1964）

王如明编撰《呵 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 1955—200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

王秀南《星马教育泛论》（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0）

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 1954—1965》（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

《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大厦落成纪念刊》（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编印，1964）

《一九五九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

张曦娜《客答问》（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出版，1994）

郑奋兴、傅文义、傅文成《大南大之旅》（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

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象》（台湾：骆驼出版社，1996）

论文：

李素娟《新加坡舆论界对创办南洋大学的反响（1953—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学位论文，1994—1995）

林菊英《从政治环境的变迁看华校学潮与政府政策（1954—1956）》（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学系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

宋明顺《东南亚华人及其前途：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冲击》（新加坡：南洋大学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论文，1976）

李路曲《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改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 第 4 期），页 40—44。

陶恒生《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新加坡橡胶巨子创办南洋大学及丧失公民权的种种》（台北《传记文学》，1999年3月号）

报纸：

The Straits Times 1953-1970

《南洋商报》1953—1970

《星洲日报》1953—1970

《阵线报》1964—1968

Bibliography

Aloysius C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Kuala Lumpur: Vinpress Sdn Bhd, 1995.

Andrew, W.Lind. *Nanyang Perspective: Chinese Students in Multiracial Singapore*.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55

Arthur, Mayhew. *Education In The Colonial Empir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8.

Banton, Michael. *Racial The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rackman Arnold.C. *Southeast Asia' Second Front: The Power Struggle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Singapore :D. Moore Press. 1966.

Brimmell, J.H.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Issu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Bulletin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1965-1974. Singapore: The University.

Carr-Saunders, A.M. *New Universities Oversea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1.

C.F.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 Academic Press. 1992.

Chan Heng Chee. *A Sensation of Independence :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vid Marshall*.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n Seck-fun & Lim Heong Keun. *Survey on Social-economic statu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2. (Academic exercis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1.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Govt. Print Office, 1964

Communist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 Singapore. Sessional Paper, No.Cmd.14 of 1959.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 Activities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Kuala Lumpur, 1974.

Crispin Bates. *Communalism and Identity among South Asians in Diaspora*. Heidelberg Papers in South Asi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Working paper No.2 September 2000. South Asia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Date Due. *The Colonial Revolution*. London: Fenner Brockway. 1973.

Drysdale, John. *Singapore : Struggle for Succes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4.

Fred, Dainton FRS. *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1979*. Singapore: 1979.

Fred, Dainton, FRS. *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 Press Release 00290 of MOE. 1990.

General Report of Professor D.J.E.Ingram on visits to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anyang ,Hong Kong, Chung Chi and new Asia Colleges, University of Palua and new Guinea and of the South Pacific. 1969.

Goh, Keng Swee, *Communism in non-communist Asian countries*. Singapore: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67.

Goldsworthy, David. *Colonial issues in British politics 1945-1961: from 'colonial development' to 'wind of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Han Su Yin. *My House Has Two Doors*, Triad/Granada, 1982.

Hanrahan, Gene Z.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malay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Communist Penet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 Washington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Jay Taylo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eking's Relations 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New York : Praeger Publishers, 1976.

J.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London: Macmillan. 1970

John Springhall. *Decolonization Since 1945. The Collapse of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New York: Palgrave. 2000.

Joseph Fischer. *The University Student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printed from MINERVA autumn 1963.

Josey Alex. *Trade Unionism in Malaya*. Singapore: D. Moore, 1958.

Justus M.Van Der Kroef. *Commun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 Contemporary Survey* ,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67.

Justus M.Van Der Kroe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ilemmas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 1964.

K.Mulliner and Lian The-Mullin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ingapore*. Asian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No.7. London: The Scare Crow Press Inc. 1991.

Lee Kuan Yew. *The Battle for Merger*.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62.

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6.

Lien Ying Chow. *From Chinese Villager to Singapore Tycoon, My Life Story*.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2

Lim Chong-Yah.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Pte Ltd, 1983.

Lim Joo-Jock with Vani S. edited, *Armed Communist Mov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84.

Lim Yew Hock. *Reflections* . Kuala Lumpur : Pustaka Antara. 1986.

Long, Joey Shi Ruey.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Singapore, 1953-1960*. Singapore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98.

Lucy M.Jacob. *Sri Lanka: From Dominion to Republic-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United Kingdom*. Delhi, National [Pub. House; overseas distributors: Books from India, London , 1973

Martin Loh Mun Loong. *The Lim Yew Hock Government 1956-1959*. Honours Degree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76

M.E.Chamberlain. *Decolonization. The Fall of the European Empires*. UK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Memmi Albert.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New York: The Orion Press.1965.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Nanyang University crisis/ Ngee Ann College Students' Union,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Singapore Polytechnic Political Society.1965.

Ooi Jin Bee and Chiang Hai Ding eds. *Moder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69.

Peake, Cyrus H.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Y: Columbia UP, 1932.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1965.

Report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Review Committee, Presented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y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Singapore,1960.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London in March and April 1957.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Richard L. Clutterbuck. *Riot and Revolu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945-1963*. London : Faber and Faber,1973.

Robert S. Elegant. *The Dragon's Seed: Peking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59.

Saravanan, Gopinathan. *Towards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1945-1973*.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Seah Chee Meow & Soeratno Partoatmodj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 Case Studies: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Singapore: 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9.

Short,Anthony. *In pursuit of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 Cultured Lotus, 2000.

Statement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Misc. 2 of 1963. Kuala Lumpur,1963.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Communist threat in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Singapore. Sessional Paper. No. Cmd.33 of 1957.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A Select bibliography.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1984.

The Path of Violence to Absolute Power, Kuala Lumpur,1968.

Ting-Hong W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2.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rdinance , State of Singapore. No.30 of 1961.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Secon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a*. 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Ltd, 1960.

Victor Purcell.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Gollancz,1954.

White Paper on Education Policy,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1956

Wolfgang Moese, Gottfried Reinknecht and Eva Schmitz-Seiber. *Chinese Regionalism in West-Malaysia and Singapore*. Hamburg 1979.

Yip Yat Hoong edit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Issues* . 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gapore,1973.

Thesis:

Chin Oi Ken. "Nantah: From Chinese to National University", Graduation Essay, Bachelor of Arts(Honours),Nanyang University , 1979.

Huang Kailin. "Interplay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 state and legislation in 'Nanyang' University education,1953-1991". Assignment(LLB), Faculty of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4.

Lau Teik Soon. "Majority-Minority Situation i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Seven. June 1974.

Ong Teck Hui. "Nanyang University 1956-1968: The Question of Official Recognition", Academic exercise-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4.

Peter S.J. Chen. "Elites and Nation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ugust 1975.

Tan Eng-le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1953-1956". Academic exercise-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3.

Ting-Hong Wong. "State Formation, Hegemony, and Nanyang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1953 to 1965", 见《教育与社会研究》创刊号(2000/12), pp. 59-85, 台湾: 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暨社会学研究所